

5061/5600.1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GS  
AUG 13 1959

# 中國語文

ZHONGGUO YUWEN

6  
1959

## 1959年6月号(总第84期)目录

- 十年来我国农村語言的变化和發展……………朱兴华、金連城 (251)
- 毛主席使用語言的形象性……………何 炯 (256)
- 中国最早的一部有关修辞理論的著作  
——《春秋繁露》……………譚 全 基 (258)
- 汉语动量詞的起源……………刘 世 儒 (263)
- 汉语詞汇史随笔……………郑 奠 (265)
- 概数詞“来”的出現及其由来……………胡 竹 安 (267)
- 略談双提分承……………朱 泳 燦 (268)
- 論“就、便、才”类型的詞的形态特征問題……………〔苏联〕郭 俊 儒 (269)
- 中和方言中的“坏”“骨”“圪”……………賀 巍 (272)
- 广州話补語宾語的詞序……………黃 伯 荣 (275)
- 談数理語言学……………刘 涌 泉 (277)
- 全苏数理語言学会議……………白 水 (279)
- 談意义和形式相結合的語法研究原則……………徐 思 益 (280)
- “語言学引論”課程座談会紀要……………本刊編輯部 (283)
- 語文短評
- 一个通知……………因 梦 (285)
- 談《文艺报》一篇文章的語言毛病……………斯 尔 鑫 (286)
- 用詞的分寸之間……………秋 甫 (286)
- 書刊評介
- 中国語文編輯部輯:《語文短評选輯》……………劳 宁 (287)
- 燕天展編著:《常用詞語例解》……………劳 宁 (287)
- 李永明著:《潮州方言》……………倪 寄 予 (288)
- 《格西曲札藏文辞典》評介……………格 丹 札 巴 (288)
- 讀《汉语講义》后的几点意見……………陈 克 农 (289)
- 語言学名詞解釋(九)……………北京大学語言学教研室 (293)
- 語文筆記
- “早梅詩”和拼音歌訣……………周 有 光 (255)
- 再談“討喜”……………刘 琳 (271)
- “脫盲”是标新立异的生造詞嗎?……………楊 义 春 (282)
- 比喻义和比喻……………潘 汞 (298)
- 动态
- 上海語文学会積極准备迎接国庆十周年……………秋 (266)
- 南京大学中文系举行校庆科学討論会……………黃 景 欣 (278)
-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語言教研組工作簡况……………史 錫 堯 (292)
- 法国語言学家馬·柯恩教授来我国作学术訪問……………龔 千 炎 (299)
- 安徽师范学院中文系語言学教研組工作簡况……………楊 長 礼 (300)

# 十年来我国农村語言的变化和发展

朱兴华 金連城

語言的变化和发展首先从語言最活跃的要素——詞汇开始。这一点,我們也应该記起斯大林的話:

語言,主要是它的詞汇,是处在差不多不断改变的状态中。工业和农业的不断發展,商业和运输业的不断發展,技术和科学的不断發展,就要求語言用工作需要的新的詞和新的語来充实它的詞汇。語言也就直接反映这种需要,用新的詞充实自己的詞汇…。①

农村的巨大变革,农村政治、經濟、文化的一日千里的飞速發展,加速了陈旧詞語随着旧事物死亡、新詞語随着新事物出現的新陈代谢作用。詞汇高速度的新陈代谢就是农村語言发展变化的第一个特点。

“互助組”这个詞是二十多年前随着老解放区出現了互助組而产生的,但当时沒有普遍使用。全国解放以后,农村进行了全面的土地改革,互助組象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广大农村的每一个角落。“互助組”一詞成为广大农村語言常用詞汇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可是随着农业生产的飞跃發展,互助組只不过在三、四年時間內就为农业生产合作社所代替了。特别是公社化以后,“互助組”一詞,除非在有必要叙述到农业集体化道路的历史时提到它,在日常用語中就不容易碰到了。目前,农村文教事业空前普及,广大农村的紅專学校和扫盲班的學員們,为了互相帮助共同提高,成立了許多学习互助組。“互助組”的意义在口語中已开始轉化。

又如“农会”一詞也是这样。作为广大农民群众性的革命組織——农会(农民协会的简称)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在农村中出現。到解放初期,广大农村反霸斗争以及土地改革前后,“农会”曾經是农村語言常用詞汇中使用頻率最高的詞之一。随着农民群众政治觉悟的日益提高,組織程度的不断加强,农会在完成它的历史任务后,沒有經過几年工夫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必要。因而“农会”一詞,目前在农村語言中已經成为死去的詞。

① 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人民出版社,1959年8月,46頁。

②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中譯本,2頁。

③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中譯本,8頁。

“我們的国家在今年十月一日将渡过它的光榮的周年。当我们回顧十年来的發展的时候,我們大家心里都充滿了愉快和信念。”②我們所以有无比的愉快和坚定的信念,就是因为祖国十年来的發展和巨大变化不但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而且在人类發展史上也是罕見的。十年来党所領導的社会主义各項事業建設,真是万馬奔騰爭跃进,千景万象日更新;群众一个接着一个,后浪推前浪,高潮更高潮。只有恩格斯所說的“一天等于二十年”这样絕好的詞句才深刻、最恰当地表达出那些翻天覆地的变化。

翻天覆地的变化最突出地表现在农村。十年来,五亿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打倒了压迫剝削他們的封建制度和反动富农,成为“管天、管地、管神仙”的主人,从解放了保守、自私和小生产者的状态。千百代所遺留下来的貧困、疾病、文盲这些“瘟神”已經或正在被富足、健康、有文化的新农村形成了。通过1958年大跃进的一年,尤其是人民公社化以后,农民无不意气風發,斗志昂揚。“共产主义是天堂,公社是桥梁”这句话,就表达了农民群众最深刻的理想。

农村这样巨大的变化自然会反映到农村的語言里,因为語言是交际工具,也是斗争的武器。社会进程快,直接关系到語言的發展速度。广大农民所使的語言,在这十年間發展之快,变化之大,在整个历史上是少見的。因此,研究十年来农村語言的变化和发展,寻找其發展規律和特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二

十年来,农村語言的变化和发展完全証明了斯大林的話是十分正确的:

这就是說,由于發生了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出現了新家庭、新的社会主义文化、新的社会精神、新的道德,由于技术和科学的發展,添加了一大批新的詞和語;有舊詞和語的意思改变了,获得了新的意思;有一些陈旧詞在詞汇中看不見了。③



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农民群众为了改善劳动条件,提高生产率,创造了插秧船。这个新的工具立即在广大地区农村中推广,因此“插秧船”这个词儿就被广泛使用。可是就在当年的秋季又发明了插秧机。这个更新的工具在今年又迅速地推广了。不久,插秧船将为插秧机所代替。看来“插秧机”这个新词将被普遍地运用,而“插秧船”这个词将很快地消失。

解放后短短几年内,农村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过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一切封建、落后、保守的东西受到了革命暴风雨的毁灭性的冲击。代表旧事物的陈词陈语在农村语言词汇中成批成批地死亡,这就构成了农村语言变化的第二个特点。

例如反映封建剥削制度的一套词语,象“租田、租约、收租、佃户、佣人、放债、印子钱、驴打滚”,都随着封建剥削制度的毁灭而死亡。其它如“壮丁、长工、风水”等词以及一些旧农谚,都从农村语言中逐渐消失了。在旧农谚方面,安徽省贵池地区过去有水稻播种季节的“二月清明莫抢先,三月清明不拉后”,棉花播种季节的“立夏前种早棉”,以及原来认为禾苗生长不必过密的“稀三担密六箩”等说法,这些都因为农作物茬口的新安排,播种季节的提前以及合理密植的推广而失去效用。

旧词语的死亡,新词语的大量产生,这就形成语言词汇无休止地新陈代谢。语言与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密切联系。在物质生产中,随着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断加深,新事物总是越来越多地大量出现。陈旧词语虽成批地死去,但语言中伴随新事物出现而产生的新词总是多于那些死去的词。这种新陈代谢的进程使语言的词汇日益积累而逐渐丰富起来。词汇的日益丰富是农村语言发展的第三个特点,也是最显著的特点。

农村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表现为生产技术的不断革新和推广,生产工具的改革,生产范围的扩大(工业、农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生产制度的变革,所有这一切都促进了农村语言的变化和发展。因而在农村语言中大量涌现从来没有的新词新语。例如“深耕、密植、工具改革、双轮双铧犁、绳索牵引犁、农具厂、化肥厂、肥田粉、滚珠轴承、机械化、电气化、机床、炼铁、高炉、饲养场、供销社、田间管理、评工记分、操作规程、规划、验收、合同、指标、措施、卫星田”。其中有的是伴随新工具的创造而产生的新词,在旧有词典中当然找不到,有的则是随着农作物田间管理工厂化而普及到农村的。

解放后的农村,经过历次伟大的政治运动,农民群众的觉悟程度空前提高,精神面貌起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各种会议上,在日常交谈中,你可以明显地觉察

到反映这些变化的新词新语在农村语言中广泛地流传着,而这些词语在过去的穷乡僻壤的落后农村是找不到的。象“干劲、上游、跃进、一天等于二十年、革命、文化革命、协作、政治挂帅、发扬敢想敢说的共产主义风格、大鸣大放、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这些新词新语,在农村日常语言中都是使用频率很高的。

在党的教育下,广大农民在日常生活中关心生产。这种深刻变化也给农村语言带来了大量的新词新语。不论是讨论会上的发言或是平时的聊天,都可以听到“积极、批评、表扬、红旗、立场、改造、翻身、民主、先进、启发、竞赛、高潮、出勤、成就、超额、评比”这类新词新语。随着物质生活逐步提高,教育事业的普及,也给农村语言带来了大量的新词新语。例如“红专学校、扫盲、俱乐部、球队、球场”。全民学哲学的运动开展以后,广大农民又接受了许多哲学用语,这在农村干部中表现得很明显。例如“物质、矛盾、世界观、唯物、辩证、对立统一、主观能动作用”等词语。

归根到底,语言总是与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相联系的。语言总是不断地以大量新词新语充实和丰富自己的词汇,来适应人们生活各个领域时刻发生的变化和发展。当农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获得经济、文化上的大翻身以后,过着富足、幸福、愉快的生活。农村语言也用充实词汇的办法来适应这种变化,涌现了大批新词新语。例如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缝纫组、假日……

### 三

从农民群众掌握的很多新词新语中,我们选出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抽象性强的词,或者说是抽象性高的词大量增加。我们在安徽省贵池县乌沙公社福大队进行了调查,从调查的材料中可以看出,解放后新成长的农民干部或是一般社员,在他们的语言中抽象性强的词所占比重很大。比如,这个大队党支部书记胡子孝同志(贫农出身,33岁)解放前是文盲,解放后在党的培养下已经达到初小程度(听说还不能记录);可是他已掌握了大量的新词新语。在生产队长会议上,他谈1958年的分配问题,时间四十五分钟,我们却统计出一百五十七个新词,其中抽象性强的词如“原则、典型、性质、体现、过渡、运动、总结、决议、认识”等等,就有三十二个。他讲话中的全部新词的五分之一强。再拿我们调查的一个村庄的语言变化情况来看(见本文附表),一百九十二个新词中就有四十三个是抽象性强的词,也占五分之一弱。



为什么农村語言詞汇中抽象性强的詞大量的增加农民群众为什么能够迅速地掌握并熟練地运用这呢?不消說,这就是由于党所領導的政治运动深入村,历来中央決議、指示及其他文件都能及时傳达民。同时,也应当說这是由于党所領導的文化普及在农村中得到广泛的开展。所有这些都促使农民的觉悟不断提高,認識、思維能力也进一步地增所以他們在分析、判断、处理农村复杂的事物中,的詞汇就不够用,必然要掌握而且也容易掌握大像性强的詞。

#### 四

农村語言詞汇的变化和發展除了上述的特点以外,还值得注意的是語言的漸趋规范化。

解放后,在全国範圍內,由于各級党委重視,采取运动的办法,大力推广普通話。又由于党的各項指示及其他一些文件运用各种方式迅速傳达,深入农村。这一切都促使农村語言詞汇漸趋规范。

规范了的語言以口头形式出現,也以書面形式出現,不論是规范化了的口語或是書面語,总是时刻地影响着农村語言,促使方言土語逐漸变化。

从规范化口語对农村語言的作用來說,农村中的会議,特别是規模較大的會議,报告或發言的同志可能使用普通話。农村广播網的建立,也給规范語的傳布开辟了广闊的場所。許多县或公社的广播都用普通話播音。有的广播站則一部分新聞用普通話播送,一部分新聞用方言播送,或同一条新聞既用普通話播送又用方言播送。他們在用方言播送的时候不仅是語音上与普通話有別,而且在詞汇上也用当群众所慣用的方言詞語。这样做,在今天普通話还没有广大群众充分掌握的情况下,不仅可以增强宣傳,而且也便于群众有意无意地通过方言与普通話逐漸掌握普通話。

农村語言日趋规范化的途徑可以归納为以下四点: 1)新产生的詞多是规范化了的; 2)原来代表同一的两个以上的詞(方言、土語)漸为规范化的詞所代替; 3)农村的方言土語上升为规范化的詞; 4)同一的多种讀音逐漸为标准語音所同化。

农村語言詞汇漸趋规范化的例子是很多的。如目前农村都普遍使用“肥料、积肥、施肥”这一組规范化詞。但是許多方言土語中原来并不是这样的。像江蘇地区原来把“肥料”叫做“壘本”,“积肥”叫做“聚本”,“施肥”叫做“下壘本”。解放后,人們受了語言规范化的影响,都說“肥料、积肥、施肥”。不过,还有少数老年人仍然没有什么改变。他們在談到积肥的

重要性时还是說:“沒有壘本哪里来的好庄稼啊。”

又如“小便、大便、廁所”这一組规范化的詞如今在农村已普遍运用;但以前并不是这样的。像安徽大部分农村原来把“小便、大便”叫做“解小溲、解大溲”。皖北地区的农村原来則把“廁所”叫做“毛坑”或“毛廁”。

随着广大农民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書面語对农村語言规范化的影响也愈益深远。列宁曾說过:“一个剛学会閱讀,特别是剛学会閱讀报纸的人,他就会很热心地看报,会不知不觉地吸收报上的詞汇。”<sup>①</sup>目前人民公社一般生产大队都訂閱四級报纸,即人民日报、省报、專区报、县报,一般生产小队都訂閱省、專区、县三級报纸。脫盲者可以自己閱讀,未脫盲的可以听讀报員朗讀、講解。总之,广大农民群众在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原来具有方言土語色彩的詞也逐步受書面語言的影响而规范化起来。我們以扫盲为例,許多地区在扫盲中都不是采取單純突击生字的办法。許多扫盲課本都是一个單字后面附有几个以这个字音为詞素的詞如:肥——肥皂、肥田粉。在扫盲中,为了提高学习效果,群众总是把自己新認識的詞立即同实物联系起来。他們的办法是給家里陈設的許多物件和周圍經常碰到的东西贴上标签,如桌子贴上“桌子”的字样,擺肥皂的地方贴上“肥皂”的字样。这样人們通过对规范化的詞的学习,就逐漸在日常用語中用来代替那些方言土語。如上举“肥皂”一詞,在許多方言地区原来都叫做“洋碱”,而現在大部分人改叫“肥皂”。类似这种情况的变化,同广大农民在文化学习中受書面語的影响是有密切关系的。

这里我們还必须特別指明一点:由于农村語言詞汇的發展和变化,由于农村語言詞汇的日漸规范化,农村語言在語音上的规范也加速了进程。这一条規律已为十年来农村語言發展的大量事实所証明。

我們在吳方言区就看到了这样的事实:例如“解”,在多数农村原来都讀gai,至今人們在說“把繩子解下来”的时候仍然說gai。但是他們在說“解放”时,則把“解”讀成jie,因为“解放”这个詞一开始就以规范化了的語音形式为他們所掌握。由于語言本身的类比作用,不少人,特别是年青人,他們在說一些并非新詞如“解决、了解”的“解”时也都念jie了。又如“干”也是这样,他們原来讀[kǒ],現在他們說“地里干得裂开了”的“干”仍然讀[kǒ]。但是他們說“分片包干”和关于早稻育秧新技术之一的“干壩下籽”的“干”时不讀[kǒ]而讀

<sup>①</sup> 《馬克思主义与語言》,中华書局,1958年9月。85頁。

San。再如“宿”，像“宿县”、“歇一宿”的“宿”，淮北地区原来读 xu。目前不少人民公社在新规划的居民点兴建了许多宿舍，“宿舍”一词对农村语言来说是新的词汇，人们在说“宿舍”的“宿”时都说 su。这是因为它同上半“包干、干堰”二词一样，一开始就以规范化了的语音形式为他们所掌握。因此，词汇规范直接作用于语音的规范。

## 五

上面所谈的这些特点，可以说是农村语言新发展的普遍现象。当然，这些现象并不是抽象的，而是体现在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农民所运用的具体语言中。我们在幸福大队调查了一个古老的方家庄。这个村庄五十多户人家全是姓方的。解放后，它和各地农村一样，村子里发生了巨大的、深刻的变化。因而语言的变化发展也是十分显著的。由于技术条件和篇幅的限制，我们只能把三月下旬一次漫谈农村里十年来发展变化的座谈会的情况列表介绍一下：

发言人	发言人情况	发言时间	发言中使用的词汇
方元亨	男，65岁，不识字，军属。	10分钟	贫雇农 官僚地主 压迫 自由权 <sup>3</sup> 领导 <sup>3</sup> 研究 志愿军 <sup>6</sup> 加紧生产 结合 新技术 <sup>2</sup> 干部 <sup>3</sup> 个别 <sup>4</sup> 生活水平 幸福大队 积极分子 <sup>2</sup> 统购 <sup>3</sup> 人民 <sup>10</sup> 翻身 劳动生产队 赔产 人民政府 <sup>2</sup> 余粮户 党 前方 <sup>4</sup> 后方 <sup>4</sup> 公社 埋头苦干 <sup>3</sup> 知识分子
方年宝	男，35岁，刚脱盲，生产队长。	10分钟	解放 <sup>3</sup> 解放军 <sup>3</sup> 抽水机 <sup>2</sup> 面貌 广泛 社员 <sup>6</sup> 领导 基本上 百货大楼 <sup>2</sup> 单干 合作化 大集体 小集体 苦战 党员 团员 进款户 切身利益 投资 <sup>6</sup> 生产队长 社会主义 按劳取酬 积极性 意见
方敬人	男，25岁，曾在改良学塾读三年书，统计员。	2分钟	不平衡 解放 <sup>3</sup> 互助组 合作化 土地入股 分红 社会主义 过渡 根据 漏划地主 政治运动 保卫工作 个别 提高 政治 文化

方光前	男，29岁，私塾读书十一年。	10分钟	解放 <sup>3</sup> 旧社会 <sup>3</sup> 政治权利 官僚地主 掌握 <sup>3</sup> 封建 剥削人 人压迫人 斗争 动 <sup>2</sup> 土改 <sup>3</sup> 逐步 <sup>3</sup> 互助 合作化 同志 <sup>2</sup> 按劳取酬 生产改革 开会 人民政府 婚姻法 婚姻 压迫 新面貌 <sup>2</sup> 大队 <sup>2</sup> 电影 <sup>3</sup> 扩大 图书馆 <sup>3</sup> 广播 机械化 拉机 <sup>2</sup> 收割机 <sup>2</sup> 贷款 兴水利 防汛 <sup>3</sup> 成绩 防汛 浪费资金，防汛器材 固 人民 <sup>5</sup> 人民利益 面貌 队长 副业 畜牧 托儿所 <sup>3</sup> 公社 蒙城 支持 工具改革 防疫工作 政治 <sup>3</sup> 宣传 <sup>2</sup> 生产技术 耕细作 口号 生产大跃进 跃进 <sup>4</sup> 收音机 社会主义 发展工业化 事故 <sup>2</sup> 训诫 提高 扫除文盲
方魁	男，31岁，安庆中学毕业，解放后在当地任小学教师二年，后在蕪湖工作七年，1953年因病退职回家。	12分钟	政治 解放 <sup>3</sup> 党 <sup>2</sup> 领导 各项运动 <sup>2</sup> 逐步 改革 <sup>3</sup> 体经营 逐步提高 提高 集体经营 技术 保守思想 肥料 发展 <sup>2</sup> 大力支持 作主义 <sup>2</sup> 合作化 <sup>3</sup> 旧社 建立 党的教育 浓厚 空气 <sup>3</sup> 提意见 意见 <sup>3</sup> 部 <sup>2</sup> 错误 社员 树立 主 <sup>2</sup> 包办代替 进步 水利 产量 大队 文化 文盲 思想 <sup>4</sup> 政治运动 地改革
方佩琪	男，46岁，不识字。	3分钟	召集 老农 劳动 政治 等 食堂 开会 大会 说话权 拖拉机

\* 表中词的右上方的数字表示该词在发言中出现的次数。

从这个简单的表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村里的语言发展和变化是多么惊人。这个统计的表告诉我们，不论识字的或不识字的，他们都掌握了大量新词而且运用频率很高；又告诉我们，在他们掌握大量的新词中抽象性强的词很多。这个表还告诉我们，农村语言词汇日益接受书面语的影响，在词汇方面加多规范化的成分。

当然，这个表格只表示了词彙的变化，语音



和其他方面的变化都未能反映出来。

## 六

現在再談一談农村語言發展中在語言風格上的現。

首先，农村各地，不論是在會議上的發言和報告，或是在农民的日常用語中，普遍地运用“×多”“×带头”“×算賬”“×对比”“×查”“×比”“×評”“×好”“×抓”的表达方法。如食堂人員要“五”（清潔衛生好…），秧田管理要“三抓”（抓淺水勤…）。这种表达方法很好，它的特点是生动、通俗，容易記住。

农村的干部在領會《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定》这个文件的精神时，把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条件概括成“三高五灭”来进行宣傳，社員一听都能懂，容易記住。

这种表达方法，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載《一个整社好經驗》一文的按語里曾給予極高評價：“这篇文章里所描写的‘四对比’‘五算賬’，就是向农民說明两种制度誰好誰坏、使人一听就懂的一种很好的方法。这种方法…是拿当地农民的經驗向农民作细致的分析，这就具有很强的說服力。”

我們可以把它叫做修辭上的“归結格”，它是农民群众的創造，是体现农村語言風格最新最好的表达形式之一。

式之一。

其次，語言的風格是直接同人們的精神面貌相联系的，語言風格的好坏决定于使用語言的人。由于农民群众普遍树立了共产主义的風格，精神面貌起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乐观主义和远大理想以及藐視一切困难的气概，就必然要表現在农村語言的風格中。只要我們走进农村，那东方巨龙的豪言壯語就会迴旋在我們耳边，呈現在我們眼前。例如：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端起巢湖当水瓢，哪方干旱哪方浇。

撕片白云擦擦汗，凌上太阳吸袋烟。

如今歌手人人是，唱得长江水倒流。

这些語句是多么响亮，气魄是多么雄偉。

农村語言風格的这些突出特点，对書面語也起着積極的影响。書面語吸收了这些好的东西而更接近于口語，更加生动、丰富、豪迈，因而成为广大群众所喜聞乐見的語言。

十年来，汉语不但在农村中有这样巨大的發展，在其他地方也有蓬勃的發展。擺在我們眼前的語言新現象的研究領域是非常廣闊的，我們語文工作者在偉大的人民共和国誕生十周年即將到来的时候，應該很好地總結过去十年汉语和各族人民語言的發展和变化規律，以促进語言的健康發展。这样，我国語言学必然会蓬勃地發展起来。

## “早梅詩”和拼音歌訣

周有光

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我根据普通話的声母和韵母試写歌訣两首，帮助練習拼音：

(1) 声母歌訣——(采桑歌)：春日起每早，采桑  
ch r q m z c s

啼鳥，風过扑鼻香，花开落，知多少。  
t n f g p b x h k l zh d sh

(2) 韵母歌訣——(捕魚歌)：人远江空夜，  
en üan iang ong ie

滑一舟輕。兒詠諠嘈調，櫓和爱啊  
ua i ou ing er iong ê io iao u e ai a

網罩波心月，竿穿水面云。魚虾  
uang ao o in üe an uan pei ian ün ü ia

窺內，快活四时春。  
ueng ei uai uo [i] [ü] juen

这两首歌訣是學習“早梅詩”試写的。

“早梅詩”是明代音韵学者兰茂(字廷秀，号止庵，

云南石羊人)在他的《韵略易通》(1442，明正統壬戌)中發表的。

《四庫提要》和《述古堂書目》都說，兰茂把字母[声母]二十，編成“早梅詩”：東風破早梅，向暖一枝开，  
d f p z m h n zh k

冰雪无人見，春从天上来。这大致是用詩歌形式  
b s v r g ch e t sh l

編写声母歌訣的开端。

云南从書《韵略易通》袁嘉穀跋，根据不同引証反复叙述“早梅詩”，但是韵書正文按“見初第一”到“日归  
g r

二十”排列，未見“早梅詩”，也未用它的順序。畢拱宸《韵略汇通》(1619)目录后面列“早梅詩”，正文同韵的字按声母分組，照“早梅詩”排列，各組开头用詩中一字标明。这大概倒是兰茂原稿的体例罢。



# 毛主席使用語言的形象性

何 炯

我們閱讀毛主席的著作，往往有这样的体会：当他在揭露敌人的阴谋、駁斥敌人的誹謗的时候，你会抑止不住自己的怒火，恨不得冲向前去，同敌人决斗；当他在論証事理的时候，你会觉得心悅誠服，得到極大的教育和啓發；当他在歌頌人民、歌頌胜利的时候，你会欢欣鼓舞，感到无比的兴奋。毛主席的文章，有着强烈的无产阶级思想感情，有着强大的邏輯力量，它們感染着你，把握着你。

毛主席的文章就象是优美的散文詩，讀来字句鏗鏘，令人吟咏不倦。不但如此，在我們讀毛主席的文章时，还在你面前，展現了許多具体生动的生活圖画，使人觉得象是亲临其境，经历了所描写的那种事件一样。这是因为毛主席的語言具有鮮明的形象性的原故。在毛主席的笔下，汉語的优美性、严密性和形象性得到了高度的結合，汉語的特点，得到了高度的体现。

毛主席使用語言的形象化的手法是多种多样的：有恰到好处比喻，有具体鮮明、生动活潑的描写，有富于形象性的諺語和古語的运用等，还有用一个“新鮮活潑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聞乐見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故事来闡明事理的。例如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閉幕詞“愚公移山”<sup>①</sup>就是以愚公移山的故事来比拟中国当时所經歷的革命斗争，表示了中国人民爭取革命胜利的決心。

本文只想就毛主席运用語言对事物的描写方面所体现出来的形象性簡要地談一談。

打开毛主席的著作，那种生动的描写，吸引人的場面，几乎俯拾皆是。1926年毛主席在論述当时的国际形势时这样写道：“…現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紅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階級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4頁）这是当时国际形势的一幅鮮明的圖画，仿佛就在你前面竖着两面“大旗”，两股人馬面临着战斗的局面，在你的周圍，仿佛籠罩着战斗前的緊張气氛。

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階級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文中，对小資產階級的特性及其对待革命的态度作了生动的描写和深刻的分析，他說：

“中农呢？…他們想到革命對他們没有什么好处。他們鍋里有米煮，沒有人半夜里敲門來討賬”（21頁）

“这种人發財觀念極重，对赵公元帥礼拜，虽不妄想發大財，却总想爬上中产階級地位。他們見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財东，往往垂着一尺長的涎。这种人胆子小，他們怕官，也有点怕革命。”（5頁）

就这短短的几句话，把小資產階級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刻划得如此細致深刻。通俗的語言，平實的事实，却紧紧地抓住了問題的實質和事物的矛盾。他們“鍋里有米煮，沒有人半夜里敲門來討賬”，深刻地指出了中农階級的小康經濟生活状况的基本特点，而且正是由于这种經濟生活的特点，才使他們想到革命對他們没有什么大的好处”。后一句话，同样的形象化手法，描繪了小資產階級向上爬的本性以及小資產階級的矛盾态度和二重性。

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主席这样描写当时的农民运动的：“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帽子游乡…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恐怖現象。这就是一些人的所謂‘过分’…”（18頁）这不但表现了毛主席对农民运动的深厚感情，而且讀了觉得眼前現出了波瀾壯闊的階級斗争的場面。去农民被地主压得透不过气来，今天翻了身，不但地主的罪恶，而且还捉来“戴高帽子游乡”，打掉他体面和威風，这不正是深刻地表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翻天覆地的变化嗎？这种生动具体的描写，显然比抽象的論述有力得多。这正是毛主席手法高明之

当有人指責农民运动“过火”的时候，毛主席“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画綉花，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样溫良恭儉。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階級推翻一个階級的暴烈行动。…农民若不用極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來蒂固的地主权力。”（18頁）这是多么富有說服力的。这給了我們一个啓示，既然是革命，就必然是你死

<sup>①</sup> 見《毛澤东選集》，1125—1128頁。以下引文只註頁數。

激烈斗争。

1938年，中国人民正经历着艰苦的抗战时期，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曾指出全面地、充分地发动民

主，展开全民抗战对争取抗日胜利的巨大意义和作用。说：“克服了这一缺点（指没有发动群众——引者），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使它象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474页）读这段文章，仿佛在我们面前摆开了几万万人的强大阵势，布了熊熊的火网，只等敌人一进来，就把它烧得片甲不留。毛主席在这里强调的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充分发动人民群众的重要性，“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这一形象的描写正好同文章的题旨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丰富了主题，增强了语言表达的效果。

日寇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华民族的生存带来了严重的威胁，正当中国共产党谋求全国团结、英勇抵抗侵略的时候，反动派虽然也在口头上说得天花乱坠，然而却在暗中干着反共反人民，企图投降日本的无耻勾当。毛主席当时曾这样指出：“有些人自己对自己加为‘三民主义信徒’，而且是老牌的三民主义者，可他们做了些什么呢？原来他们的民族主义，就是勾结帝国主义；他们的民权主义，就是压迫老百姓；他们民生主义呢，那就是拿老百姓身上的血来喝得越多越好。”（531页）毛主席用“勾结帝国主义”、“压迫老百姓”、“拿老百姓身上的血来喝得越多越好”几句话，把投降分子的丑恶原形彻底戳穿了。因为他们在三民主义的招牌下，卖的就是这一套货色，所以毛主席这几句话是一针见血。当时在投降活动日益猖獗的情况下，毛主席这样指出：“这一套，不但汪精卫在演出，更严重就是还有许多的张精卫、李精卫，他们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也在和汪精卫里应外合地演出，有些唱双簧，装白脸。”（536页）这里，毛主席把投降分子、汉奸、国贼的丑态揭露得淋漓尽致。毛主席之所以要用“张精卫”、“李精卫”来代表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的投降分子，乃是那些人实质上是同汪精卫一样的货色，而汪精卫又是中国人民切齿痛恨的卖国贼，因此这几句话更能够激起人民群众对那些投降分子的愤恨，从而高警惕，增强抗日力量。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文中，追述中国革命战争的发展过程时，曾这样说：“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

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1055页）读到这里，我们内心不觉深深感动。它好象是一个响导，把你引导到那革命先辈艰苦斗争以及反动派残酷镇压的岁月里去了。斗争是残酷的、艰苦的。然而，这不仅不会使你感到丝毫的绝望，而且会使你受到极大的鼓舞，因为在你面前有无数的共产党员“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的不屈不挠、前仆后继、英勇斗争的光辉形象。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曾作过这样的描写：“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唯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657页）这是一个多么形象的描写和对比！这几句话既形象地描绘了资本主义的“气息奄奄”，共产主义的无穷生命力，又深刻地概括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毛主席的文章之所以能够如此生动活泼，深入浅出，一方面是由于他具有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以及对于现实生活的敏锐观察和深刻理解；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对于我们祖国丰富而又优美的语言，有着高度的修养和深刻的认识。

我们的汉语词汇是异常丰富的，作家、理论家可以有充分的选择和多样的运用，问题在于作家和理论家对于祖国语言的词汇是否有广泛而深刻的认识，是否能恰当地掌握它们。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毛主席著作里使用语言的形象性就是我们的光辉典范。

## 啓 事

本刊固定于每月二十二日出版，每月下旬为下一期的辑稿和发稿期间，因此，凡是有时间性的来稿（特别是报道）希望于某期发表者，请在该期的前一月二十日左右寄到，编辑部才好安排。这一点特别请各高等院校的本刊通讯员同志注意。

本刊编辑部



# 中国最早的一部有关修辞理论的著作——《春秋繁露》\*

譚全基

## 一 《春秋繁露》和修辞学

我国古人留給我們的修辞学遺產很丰富，但是，由于古人沒有把修辞学作为一門独立的學問來研究，因而留下來的資料大都是零碎的、片斷的，專門討論修辞問題的專著不多。汉代以前，留下来有关修辞学的資料大部分是單句或三言兩語；在汉代董仲舒、司馬遷、楊雄、班固、王充等人的著作里，才出現了比較集中的有关資料，其中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是最早的一部有关修辞理論的著作。

董仲舒是汉武帝時一個著名的經學家。他的《春秋繁露》是根据他的看法來解釋經義的，同時也表達了他的政治哲學觀點，想借此來鞏固統治階級的地位。他雖然不是有意識地要討論修辞問題，但是由于有很多地方是，从修辞的角度來解說《春秋》的內容，因而間接地反映出他的修辞學的观点。正如唐賈公彥所說：“前汉董仲舒作《春秋繁露》，繁多露潤，为《春秋》作义，潤益处多。”（周礼，大司乐疏）所謂“潤益处多”，就是帶上自己的观点，对《春秋》加以發揮，从修辞學的角度來說，這些就是修辞學的材料。他解釋《春秋》，主要是根据《公羊傳》的見解，从各种修辞現象里歸納出一些理論性的問題，提出了一些修辞的原則。這些原則雖然比較簡單，但对后来的影响却不小。董仲舒一向很受古人的重視，刘向称他“有王佐之材，虽伊、吕无以加”。班固称他“为群儒首”。《汉書·董仲舒傳》說他的著作如《玉杯》、《蕃露》、《清明》、《竹林》等篇对后人影响很大；其中《玉杯》、《竹林》两篇里正是有很多有关修辞學的材料。

从內容說，《春秋》是一部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書，从写作手法說，它是一部富有高度的“屬辭比事”技巧的書。①所謂“屬辭比事”，就是修飾詞句和安排材料的方法，研究這些方法正是屬於修辞學研究的範圍之內。董仲舒在本書里面說到：

《春秋》之辭，內事之待外者从外言之，今万民之性待外教然后能善，善当与教，不当与性，与性则多累而不

精，自成功而无聖賢，此世長者之所誤出也。非謂之為辭之術也。不法之言，无驗之說，君子之所外，不為載！（深察名号）

“為辭之術”這句話的意思相當于我們今天所說的“修辞手法”。董仲舒把《春秋》的修辞看做一種（術）來研究，這種“術”，也就是后人所常討論的《春秋》筆法”。在《春秋繁露》里，常可看見“難者曰……”語句，可見《春秋》在当时遭到很多人的指責、批評。董仲舒在本書里對這些“難者”所提出的問題進行辯論，所以這部書里大部分是以辯論的方式來表達內容。既然要辯解，不得不提出一些運用詞句的原則，例如“《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楚生注）這就是一個原則。總括一句，《春秋》是一本“屬辭比事而不亂”的書，《春秋繁露》是一部研究“《春秋》之辭之術”的書，从这个角度來說，研究它，可以提供古代修辞學早期的一些資料。

## 二 董仲舒論“微言”与修辞

董仲舒用《春秋》的修辞現象做根據，加以解釋、分析，歸納為修辞理論。他研究《春秋》的表達方法，就是要闡明《春秋》之道。因此，他沒有把形式和內容分開，沒有把文章的用詞造句與文章的主旨分開。這里我們討論一下他的“文”和“質”、“貴志”和“好微”、“指”、“誅意”和“誅辭”等問題。一般說來，古人所說的“質”是指內容，古人所說的“文”是指形式。董仲舒對形式和內容的關係的看法是這樣的：

志為質，物為文，文著于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文兩各，然后其亂成；文質偏行，不得有尔我之名。能各而偏行之，宁有質而无文。……然則《春秋》之序，先質而后文，右志而左物。（玉杯）

这里提出了兩點：一是內容和形式必須一致，

\* 本文是在鄭奠先生指導下寫成的，特此致謝。

① 《亂記·經解》：“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于《春秋》者也。”



“文質兩備”；二是當兩者有矛盾時，就以內容為主，就“字有質而無文”。他認為《春秋》“序道”，就是根據“先質而后文”的原則。可以說，他的全部修辭觀都是以這個基本論點出發，認為內容是最主要的東西。根據這個論點，他認為《春秋》的特点是“貴志”和“好微”。他說：

《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春秋》修本末之義，達變故之應，通生死之志，達入道之極者也。是故君殺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天絕也。（玉杯）

所謂“貴志”就是每句話都要有一定的作用，有“王”、“有”、“道”；“好微”就是每句話都很精密、含蓄，每一字都用得很得道理。兩者互相結合的，“志”指內容、目的、作用方面；“微”指表達內容的方式和方法方面。前漢書·藝文志：“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大義乖”。什麼叫做“微言”？古人有兩種注解：李奇注“隱微不顯之言也”；師古注“精微要妙之言耳”。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討論董仲舒怎樣把《春秋》的“微言”闡發出來，從而研究所反映出來的董仲舒的修辭觀。

董仲舒認為“微其辭”是《春秋》修辭的基本原則。我們知道，在封建帝王統治下的社會里，著書立說的人害怕得罪了統治者，致遭殺身之禍，所以，不得不把文章寫得含蓄一些。董仲舒說：

“又下詔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世逾近而言逾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述莊王）

他這番話正是表達出那時候比較正直的士大夫階級的心情，而董仲舒本人也正是因为寫書不小心，幾乎處死，後來做了大官，又“恐久獲罪”，請求免職（詳見《史記·儒林列傳》）。可見，在那種社會底下，要寫書是危險的，不能不借助於“微其辭”的表達方式了。他還把這種表達方式看做“《春秋》之道”來發揮和研究，可他很重視這個問題。當然，修辭的表達方式是和特定的歷史環境有關，我們現在，要求文章要寫得淺顯易明，內容鮮明，同“微其辭”的方式截然相反。“微其辭”就是不能從字面上看出意思，只有深入地觀察才能發現。本來君王死了，也已經埋葬了，但是《春秋》卻不把葬這事情寫出來，“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借表示出臣子沒有盡責為君王報仇，含有貶的意思。杜預為《春秋》作序說《春秋》“以一字為褒貶”，《文心雕龍》也有相同的話（見《征聖》篇），又說“……五例微辭，微用也”（同上）。也都是說明《春秋》在“微辭”的表達方式中隱含着褒或貶的作用。既要使文章不是表面明白地說明問題，又要使文章有用，就非有高度的含蓄技巧不可。

為了使人能夠深入理解《春秋》的“微言大義”，董仲舒又提出了另外一條原則。他說：

……戰如不戰，然而有所謂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云：“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者，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竹林）

這裡指出了文章的主旨（指）和語言（辭）之間的關係。有時因為用辭不能把什麼都寫出來，所以要注意它的整個意思。比方說“春秋無義戰”，僅是一般的說法，在不義之戰里面互相比較來說，却有一些戰爭是較正義的，這就要求人們在看《春秋》時要注意整個含義，不要局限於字面的意思，不要給字面意思妨礙了對內容主旨的了解，所以他說“見其指者，不任其辭”，也就是孟子所說的“不以辭害志”。在《文心雕龍》的《宗經》篇里也指出了《春秋》的這個特點。“辭”表達“義”往往不是那麼直接的，只有深入了解這一點，才不會把修辭問題簡單化。

“指”和“辭”的關係的分析，具體地應用到修辭手法上，就是“誅意”和“誅辭”的問題。所謂“誅”，就是表達出責備、反對、貶的意思。表達“誅”的方式或者是“誅意”，或者是“誅辭”，而《春秋》却是“誅意”的。

《春秋》之義，臣不討賊，非臣子也，子不復仇，非子也。故誅趙盾，賊不討者不書葬，臣子之誅也。許世子不嘗藥而誅為弑父……桓公救中國，攘夷狄，卒服楚王為王者事，晉文再致天子，皆止不誅，善其牧諸侯，奉獻天子而復周室，《春秋》予之為伯：誅意不誅辭之謂也。（王道）

“意”就是事物的實質。《春秋》所“誅”的不是事物的表面現象，而是事物的實質：從現象說，許世子並沒有殺死自己的父親，可是，由於他沒有預先嘗藥，《春秋》根據封建的道德觀點，就說他實際相當於殺死父親，因此用“弑”這個詞。又如，晉文公再次把天子叫來而不去朝見天子，按當時的封建思想來說，是有罪的，可是《春秋》認為晉文公有“復周室”的功勞，因此不用“貶”的詞句。後人每說《春秋》“一字以褒貶”，正是這個意思。《春秋》的褒貶有兩種方式：用一個字，例如說許世子“弑”父，是很明顯的“誅”；不用某些字，例如“不書葬”，也是“誅”。要了解它的褒貶，就要深入了解事物的實質，要深入到“微”的里面，要“見其指者，不任其辭”，不要給詞句表面的現象所局限。這種原則，對我們研究修辭學有參考的作用。

### 三 修辭的準則——“真”

董仲舒又指出《春秋》作者的寫作態度是嚴肅的。《實性》篇說：“聖人于言無所苟而已”。《深察名號》篇

說：“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他指出古人确定每一个詞語都很謹慎，很妥當，很準確，這就是“《春秋》慎辭”。我們來看看他的意見：

《春秋》慎辭，謹于名倫等物者也，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戰”，大夷言“戰”不得言“荻”，中國言“荻”不得言“執”，各有辭也。有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戰”，大夷避中國而不得言“荻”，中國避天子而不得言“執”。名倫弗予，嫌于相臣之辭也，是故大小不逾等，貴賤如其倫，義之正也。（精華）

他把一些詞解釋為帶有封建等級的色彩，這是應該否定的。但是，象“戰”“伐”“荻”“執”等詞義本身，既相近而又有差別，對它們加以辨識是很有必要的，只有分辨出義近詞的差別，才能用詞準確，這是修辭學上的一個重要原則。董仲舒談到詞義辨識的地方不少。例如：“萬人者曰‘英’，千人者曰‘俊’，百人者曰‘杰’，十人者曰‘豪’。”（爵國）這是根據程度高低來區分。又如：“聖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筭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實性）他認為“性”不能用于“聖人”，也不能用于器量狹小得象“斗筭”那樣的人，只能指中等人的“性”。這種見解更集中地表現在《深察名號》篇里。

《深察名號》篇詳細地分析“名”和“號”，使人通過了解兩者的關係來了解某些詞義的範圍，從而準確地運用詞句。這篇一開始就提出“治天下之端在審辨，大辨之端在深察名號”。很顯然，作者錯誤地夸大了區分“名”和“號”的作用，以為通過這種詞句上所規定的名分就能夠維護統治階級的地位，就能“治天下”，現在看來，是非常可笑的。但是，這“名”和“號”的關係接觸到邏輯、詞義的問題，現在是從這樣的角度的來討論它。

“號”凡而略；“名”詳而目。目者，偏辨其事也；凡者，獨舉其大事也。（深察名號）

什麼叫“名”？什麼叫“號”？用邏輯的術語說，“號”是種概念，外延較廣而較抽象（“凡而略”，“獨舉其大事”）；“名”是屬概念，外延較窄而較具體（“詳而目”，“偏辨其事”）。本篇又說到“名眾于號，號其大全”。他指出，每一事物都有“凡號”，“凡號”下面有“名”，又叫“散名”，他舉了例子：

享鬼神者號：一曰祭，祭之散名：春日“祠”，夏日“禴”，秋曰“嘗”，冬曰“蒸”。獵禽獸者號：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苗”，秋：“蒐”，冬：“狩”，夏：“獮”。無有不皆中天意者。物莫不有凡號，號莫不有散名如是。（深察名號）

他把詞義按用法的差異歸納了一下，對於了解詞義又有很大的幫助，指出每一個詞有特定的用途。如果想泛指某一事件，可以用“號”，特指某一件事，可以用“名”。這種理論可以反映出當時的詞義實際情況。后

漢許慎的《說文解字》里對於豬、馬、牛等字，按照的年齡和性別的不同而有許多特殊的字：關於豬的有：“豨、豮、豨”等；關於馬的有：“駒、馱、驕”等；關於牛的有：“犢、犝、牝”等。當時，象這類義近詞是很多的。如果能夠按董仲舒的理論，把它們按照“名”和“號”的關係歸納起來，對於了解詞義有很大幫助。董仲舒認為“名”不是隨便訂出來的，“名”必須能反映出事物的實情，如果不能反映客觀實情的，就不能稱“名”。他說：“名生于真，非其真弗以為名。名者，聖人所以真物也。名之為言，真也。”（深察名號）最高標準就是“真”，而且要“不失秋毫之末”，因此，必須準確地使用每一個詞。而這個“真”的標準，推廣于造句和描寫方面。

《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隕石則后其“五”，言退鵠則先其“六”，聖人于正名也如此。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五石六鵠”辭是也。（實性）

粟之性，未能为米也，《春秋》別物之理以正其名，必各因其真，真其義也，真其情也，乃以為名。名隕石后其五，退鵠則先其六，此皆其真也。聖人于言，而已矣（同上）

這的確是修辭學上的一個重要原則。把“真”作為衡量修詞的一個重要標準，這是董仲舒當時的創見。關於“五石六鵠”的問題，古人討論得很多，是一個值得發揮的問題。《春秋》：“僖公十六年正月，隕石于五，六鵠退飞过宋都”。為什麼“五”要放在後面，却放在“鵠”的前面呢？《公羊傳》：“曷為先言隕而後言石？隕石記聞，聞之填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曷言六而後言六鵠退飞？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鵠而察之，則退飞。”《公羊傳》說得很詳細，認為“記聞”，一個是“記見”。而董仲舒卻提升為理論原則，提出了“真”。到了《文心雕龍》就發展為“審辨理，一字見義，五石六鵠，以詳略成文，① 雖門門以先后見旨”。（宗經）

總括一句，董仲舒談到了“《春秋》慎辭”的本質，提出了用辭要準確妥當的原則，認為“真”是修辭的標準之一。

#### 四 修辭的“常”和“變”

修辭沒有一成不變的公式和方法，要根據客觀的需要而靈活運用。董仲舒提出了“《春秋》無常”的見解，認為應該“有常”、“有變”。從《春秋繁露》可以看到，有些人批評《春秋》用辭，認為《春秋》用詞矛盾的地方，沒有一定的標準。董仲舒就提出他的

① 王粲：《荊州文學志》“略”字作“備”。



《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為禮，至邲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為夷狄，楚變而為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竹林）

難者曰：《春秋》事同則辭同，此四者俱為變禮，而或達于經，或不達于經，何也？曰：《春秋》理百物，辨品類，別嫌微，修本末者也。是故星墜謂之“隕”，螽蟴謂之“雨”，其所發之處不同，或降于天，或發于地，其辭不可同也。今四者俱為變禮也同，而其所發亦不同，或發于男，或發于女，其辭不同也，是或達于常，或達于變也。（玉英）

董仲舒提出了“常”和“變”的問題。星是從天上降下來的，應該叫做“隕”，螽蟴是從地面“發”起來之後才掉下來的，應該叫做“雨”。不能籠統地叫做“墮”，有時應該叫“隕”，有時應該叫“雨”，看具體情況而定。對“夷狄”和對“君子”應用不同的語句，對“男”和對“女”應用不同的語句，主要是根據內容，做到恰如其分，要“移其辭以從其事”。正如《精華》篇所說：“得其處則皆是也，失其處則皆非也。《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董仲舒論這個“有常”“有變”的原則相當明確，他指出“常”和“變”並不是矛盾的，各有作用。他說：

春秋之道，固有常有變，變用于變，常用于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竹林）

還進一步指出這個原則不但應用於《春秋》，也可推及到《詩》、《易》：

難者事者曰：《春秋》之法：未逾年之君稱子，益人心之正也，至里克殺奚齊，避此正諱，而稱君之子，何也？曰：所聞《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仁人，錄其同姓之禍，固宜異操。（精華）

所謂“《詩》無達詁”，就是對《詩》沒有一成不變的解釋，各人的角度不同，因而解釋也不同；所謂“《易》無達占”，就是說易卦沒有固定的意思，要根據占卦的人的情況而定；所謂“《春秋》無達辭”，就是《春秋》所用辭沒有不變的方式。這種見解，常為後人所引用，影響很大。<sup>①</sup>

董仲舒這個原則指出運用修辭手法時，要注意它的不變性與變化性，要看具體的條件。我們認為，能這樣做，就不會把修辭學簡單地局限於一個很狹窄的範圍，只注意某些固定的修辭手段，而忽略了修辭手段的發展變化。

## 五 提到的幾種修辭手法

《春秋繁露》在闡述“《春秋》筆法”時，接觸到有關修辭手法的理論。儘管這些手法沒有成為完整的系統，不是有意識地作為修辭理論來討論，但是可以從這些材料中看出當時已有一些修辭手法理論的觀念，出現了關於修辭手法理論的萌芽。例如董仲舒在《山川》篇里就提到了“君子取譬”的問題，這就是今天所說

的“比喻手法”。《山川頌》大量描寫了山川景物，指出它們各種不同的形狀與特性可以作出各種各樣的比喻。他拿水做比喻：

水則源泉，混混沄沄，晝夜不竭，既似力者；

盈科后行，既似持平者；

循微赴下，不遺小問，既似察者；

循谿谷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既似知者；

鄣防山而能清淨，既似知命者；

不清而入，潔清而出，既似善化者；

赴千仞之壑，入而不疑，既似勇者；

物皆因于火，而水獨勝之，既似武者；

咸得之而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

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之謂也。

從這一段可以看到，水的性態能供人們作多種比喻。可以從各個角度來下比喻：從水能滅火這個關係上說，把水比做勇武的人；從人對水的依存關係上說，把水比做有德行的人；從水往低流，無孔不入的特性來說，把水比做善于觀察的人。水又象大力士，又象很公正的人，又象知路的人……幾個“似”字，把水各種各樣的情態人格化了，造成了許多恰切的比喻。最後還引了孔子的話做實例，使人更容易領會這句話的意思，也教人怎樣做比喻。很明顯，這就是比喻法。<sup>②</sup>《山川頌》里又談到山，山的特性也有很多可做比喻的，他指出山的各種譬喻後，指出這是“君子取譬”。這一篇里，董仲舒是有意識地討論修辭手法的，可以推而廣之，別的事物也可以拿來打比方。因此可以說，《山川頌》實際上就是教人如何打比方。

其次，關於誇張手法。有人批評《春秋》的“春秋無義戰”的說法，認為春秋時代也有一些戰爭是正義的，為什麼《春秋》卻說“無義戰”呢？董仲舒提出他的見解：

曰：凡《春秋》之記災異也，雖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仇者有二三焉，是何以異于無麥苗之有數莖哉！不足以難之，故謂之無義戰也。以無義戰為不可，則無麥苗亦不可也；以無麥苗為可，則無義戰亦可矣。……由是觀之，見其指

① 《詩緯·汎曆樞》：“《詩》無達詁，《易》無達言，《春秋》無達辭。”劉向《說苑》：“《詩》無通故，《易》無通占，《春秋》無通義。”《困學紀聞》：“《易》無達占，《詩》無達詁，《春秋》無達例。”

② 這種比喻法，不是董仲舒首創的，《荀子》里有相似的一段。《荀子·宥坐篇》：“孔子觀于東流之水。子貢問于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大遍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其流也，埶下裾拘，必循其理，似義。其洗洗乎不涸盡，似道。若有決行之，其應伏若聲響，其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約微達，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鮮絮，似善化。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



者不任其辞，不任其辞，然后可与适道矣。（竹林）

董仲舒认为要看事物的总方面，不必机械地了解字面的意思。比方在大灾荒的年头里，虽然有些田里还有少数麦苗，但总的来说，可称做“无麦苗”。从“无麦苗”的论断出发，说明“无义战”的说法也能成立。换句话说，适当的夸张是容许的。当然，严格说来，这种手法还不算夸张手法，因为它仅仅是着眼于总的趋向、总的方面，而不管其中和事实有微少不符的地方。这个原则也是修辞学重要原则，如果死扣字眼，死扣数目，就容易产生误会，也为修辞带来了困难。

其次，《春秋繁露》还谈到了别的修辞手法。如“重辞”“婉辞”“微辞”“温辞”等等问题。<sup>①</sup>这些都可以看做修辞手法。“重辞”就是重复，而“温辞”就是表达得比较温和，“婉辞”就是表达得比较婉转，“微辞”就是表达得比较含蓄、隐讳。关于这些，书里仅仅涉及，不能进一步讨论，只能使我们略知有这类的材料。

## 六 简单的结论

修辞学在我国成为一门独立研究的科学还是近代的事情。现在我们只能从汉代著作的《春秋繁露》里面看到一些修辞学早期的材料。它并不是直接地、正面地论述修辞问题，而是夹杂在经学里讲的，因此我们就要撇开那些直接论到经学的材料，只选取有关修辞学的部分。由于时代久远，这部书有些词句不容易解得通，有些内容也不容易了解；并且这部书所谈的有些问题已不适用于今天。例如，按人的才能等级分为“英”“俊”“杰”“豪”，在今天早没有这种必要，而是组成了复音词：“英俊”“俊杰”“豪杰”。我们研究《春秋繁露》必须摒弃里面过时的见解，而且不必研究里面谈到的个别具体的修辞现象，而是，注意他所提出的一些原则性的问题，把它作为汉语修辞学史的材料运用，作为了解古修辞学早期的情况的资料。

董仲舒提出了不少有关修辞学的理论问题。如“为辞之术”，“慎辞”，“文”和“质”，“好微”和“贵志”，“辞”和“指”，“诛意”和“诛辞”，“名”和“号”（“凡号”和“散名”），“真其义”和“真其情”，“名物如其真”，“有常”和“有变”，“婉辞”“微辞”“温辞”和“重辞”，“取譬”的

问题，“无麦苗”的问题。这些都值得我们去研究，尽管有些谈得较简单，但有些对后来的影响很大。提出的原则，大概可归纳为下列各点：

1) 把修辞问题作为一种方法来研究，所以提出了《春秋》的“为辞之术”。这种修辞法就是后人的“《春秋》笔法”或“《春秋》书法”。

2) 修辞并不是单纯的技巧问题，它与内容主不开，应该“文质两备”，要是两者不能兼顾，就“宁而无文”。形式方面的修辞技巧只是次要的东西。

3) 每一个词有它的独特的作用，不能随便因此必须把一些近义词详细地区别，才能用词准确。如“伐”“战”“获”“执”，“英”“俊”“杰”“豪”，“苗”“狩”“獮”，“祠”“酌”“尝”“蒸”，“隕”和“雨”。

4) 从逻辑学的角度说，概念有種概念和屬概念分別。“名”和“号”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可以帮助詞义的辨識，所以提出要“深察名号”。

5) 修辞手法是多种多样的，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要看具体的情况而定，既有变化的一面，又有常的一面，这就是“有常”和“有变”。

6) 修辞的最重要的标准就是要如实地反映情况，描写事物也该这样，他以“五石六鹖”为论，提出了这个标准就是“真”。

7) 表达内容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不能光看的意思，要深入到“微”的一面去了解文章的内容，这就是“见其指者不任其辞”。

8) 提出了个别的修辞手法，例如：夸张手法，婉辞手法，“微辞”手法等。

由这些原则看来，今天修辞学方面所讨论的问题，在汉初已具有雏形。董仲舒的修辞理论是解释《春秋》这个实践中来的，把《春秋》的一些修辞现象归纳并提升为理论。所以，我们可以说《春秋繁露》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有关修辞理论著作。汉以后，多年以来，象这样的修辞学材料是非常丰富的，它作为今天修辞学研究的可贵的借鉴。

<sup>①</sup> 分別見于《祭義》、《楚莊王》等篇。

# 汉语动量词的起源

刘世儒

汉语中动量词是起源于什么时代的？这是个尚待探讨、研究、解决的问题。据王力先生的意见：“在唐代以前，除了‘两次’的意义用‘再’之外，关于行为的称数，一律用数目字加在动词的前面。”<sup>①</sup>这是说，汉语动量词在唐代以前还没有产生。那么在什么时代才产生的呢？王先生说：“唐代以后，表示行为单位的单位词（即动量词）如‘回’、‘次’等逐渐出现了。”这是说，汉语动量词在唐代以后才产生的。我们认为这种意见和汉语动量词的发展历史是不相符合的。就现在所已看到的材料看，我们完全可以断言：汉语动量词至迟在晋六朝时代就已经产生了，或者说就已经“逐渐出现”了。<sup>②</sup>

下边我们就来谈谈动量词在魏晋六朝时代的情况。

从种类方面看，我们首先可以看到“专用的动量词”在这个时代就已经大批地产生了。例如：

下——表示动作向下进行的次数。

搏之著树，鞭杖百余下。（《三国志·蜀志·先主纪》，注引《典略》）

我共前人同买于汝，云何独尔？即鞭十余下，如是五人各打十下。（《百喻经》）

母乃杖祥背及两脚百余下。（《魏书·北海王传》）

昔在蜀中，闻长老言：寿曾为诸葛亮门下书佐，被鞭百下。（同上，《毛脩之传》）

奇不受鞭，叩头千下。（《三国志·吴志·孙奋传》，注引《江表传》）

遍（遍）——表示诵读完毕的次数。王力先生曾举《文选》中的例子，证明“遍”字在唐代才用作动量，<sup>③</sup>而在六朝（包括魏晋说的，全文同）就已经屡见不鲜。

人有从学者，遇不肯教，而云：必当先读百遍，言读书百遍而义自见。（《三国志·魏志·王肃传》注引《魏略》）

但读千遍，自得其意。（抱朴子，祛惑篇）

初玄谶始将见杀，梦人告曰：诵观音经千遍则免。既觉，诵之得千遍。（宋书·王玄谶传）

吾竟读一遍，便即别构尸解。（魏书·张猛传）

番——表示动作多回的次数。王力先生又举《万叶集》的例子，证明“番”等作动量已“见于唐宋的史料”，<sup>④</sup>实则它在六朝就已经很通行。

一微空中无众微，众微空中无一微，往复数番，罗什固测。（高僧传）

初文郡使与南阳宗少文谈系象，往复数番，少文每欲屈。（宋书·张邵传）

弱自为客主数番。（世说新语，文学篇）

因示语攻难数十番。（世说新语，文学篇）

过——表示一般动作的次数。

吾久磨不复省之，今欲思论一过，数日当以相与。（三国志·吴志·赵达传）

香汤洗数十过。（高僧传，译经篇）

元因徐徐以腹揩屋栋数十过。（神仙传）

清晨建齿三百过者，永不摇动。（抱朴子，杂应篇）

龟中路左顾者数过。（《世说新语·方正篇》，注引《孔愉别传》）

通——表示击鼓的次数。

傅吏疑其伪，乃椎鼓数十通。（后汉书·光武帝纪）

“专用的动量词”而外还有“借用的动量词”，在这个时代也同样地产生了。例如：

文襄使季舒攻帝三季。（魏书·李静纪）

公教人嗽一口也。（世说新语·捷悟篇）

兴祖家餽饌中下菜，食两口，便觉。（南齐书·王奂传）

得石象芝，搏之三万六千杵。（抱朴子，仙药篇）

子颢亦醉，…呼鼙为别驾数十声。（宋书·范晔传）

“借用的动量词”的兴起，是动量词更向前发展一步的标志。因为这是在专用的动量词造句法的系统影响下才产生的，没有专用的动量词，汉语句法就不会产生临时调用名词来充当动量的需要，就不会产生“借用的动量词”这种语法范畴。

① 参看《汉语史稿》中册，244—245页；以下所引同。

② 在这个时代以前，我们也曾注意到这些事实：

以铁锤锻其头数十“下”乃死。（海内十洲记）

使者乃指兽命唤一“声”。（海内十洲记）

是夕帝棺自动，…如此数“遍”（汉武帝内传）

酒酣数“遍”。（汉武帝内传）

臣已见此枝三“过”。（别国洞冥记）

看来在汉代动量词就已经产生了；然而这是靠不住的。因为《海内十洲记》、《汉武帝内传》、《别国洞冥记》这类的书，前人早已确凿地证明它们是伪书，是后代人的伪托。拿它们来论证汉代的语言，那当然是不足为据的。

③④ 同注①，246页。

六朝的動量詞從種類方面看是如此：從功能方面看又是怎樣的呢？可以說也和現代語動量詞的句法功能沒有什麼差別了。我們熟知：現代語的動量詞，从句法功能上看，它除了經常可以作補語外，還可以作狀語，①六朝語的動量詞也就正是這樣的。關於作補語的例，我們在上邊已經列舉了很多，可以復看，不必再重舉了；現在只舉幾個作狀語的例：

羅什與賢數番往復。（高僧傳，譯經篇）

夜有盜之者，數過提舉，竟不能動。（高僧傳，譯經篇）

小餅黃金法：煉金內清酒中，約二百過出入即沸矣。

（抱朴子，金丹篇）

奉不食他物，唯啖脯棗，飲少酒。變一日三度設之。

（神仙傳）

然而大同之中也有小異，那就是六朝動量詞作狀語還只以專用的動量詞為限，象現代語中的“一拳打死一個敵人”“一口咬住它不放”一類的用法在六朝時代卻還是沒有發展出來的。

由此看來，漢語動量詞在六朝時代就已經產生了，形成了，這個歷史實事是不能不承認的。然而產生和形成並不等於已完全成熟。事實上六朝動量詞還有很多有待於繼續發展，不斷充實的地方。如上所說借用的動量詞還沒有充當狀語的能力就是一個適例。此外如“頓”“回”“面”等一類的在現代語中極為習見的動量詞，在六朝時代也還沒有從名量中或一般的動詞中分化出來，也是一個比較明顯的事實。例如：

聞卿祠，欲乞一頓食耳。（世說新語，任誕篇）

今日有一頓飽食，便欲殘害我兒子！（宋書，徐湛之傳）

仇池……地方二十余里，羊腸蟠道三十六回。（宋書，氏胡傳）

這“頓”還只是名量用法；②這“回”雖然已經很接近動量用法，但還不是。“頓”“回”等發展為動量是六朝以後的事。

凡與一面，莫不敬而愛之。（《世說新語，賞譽篇》，注引《王濛別傳》）

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世說新語，賢媛篇）

這“面”也還不是動量用法（如“見她一面”之類）而仍是動詞用法（如《史記，項羽紀》“馬童面之”之類）。後來由此發展才虛化成動量詞的。（只須在它前邊另用個動詞就行了，如“凡與見一面”“山公與嵇阮

見一面”之類）

又如“同源動量”（如“看一看”，“拜了秦老兩拜”之類）在現代語也是極常見的；然而在六朝時代這種動量卻也還看不到。有人說象下列的例子，其中的“看”是可以作為同源動量的老娘家的，然而這是靠不住的，因為它和中心動詞並非同源：

誦經五十余萬言，常日“禮”五百拜佛。（高僧傳，解篇）

民有罪，使“禮”佛動至數千拜。（宋書，張暢傳）

據我所想，同源動量的興起當在動詞的選動體產生以後；六朝時代動詞的選動體既然還沒有產生，怎能說產生了同源動量呢？

總括起來說，我的意見可歸納為下列幾點：1) 漢語動量詞不是晚到“唐代以後”才產生的，而是早在晉六朝時代就已經產生了，並且已經大大向前發展了；2) 若同現代語比較，它當然在某些方面還發展得不充分、不夠完備（如詞量還不夠紛繁、同源動量還未產生，等等），但是若就整個體系上看，這時的動量詞和現代漢語比較起來可以說基本上已經沒有什麼不同了；3) 由於出現了這樣一種新的語法範疇，就使漢語語法體系起了一個新的變化：不但稱量名物須用動量詞（這在先秦就已經漸次形成，中經兩漢的發展，到了晉六朝時代就已經開始邁入完全成熟的時期），就是量行為也須用動量詞了；4) 因此，我們可以說，漢語動量詞的完整體系是在這一個時代形成的；在此以前動量詞偶已出現，但那畢竟都還是零星的、偶見的、不定的，還不能就形成一種範疇、一種體系。

①、王力先生認為只能作補語不能作狀語。他說：“行為單位詞發展出來以後，行為單位詞和事物單位詞有一個共同之點：事物單位詞一般是在名詞的前面，行為單位詞一般在動詞的後面；到了現代漢語里，行為單位詞就只能放在動詞的後面了。”（見前頁注①，247頁）這也不合事實。

“幾次請都請不來”“他一回也沒有去過”，這些動量詞的例子真是俯拾即是，怎能說現代漢語的動量詞只放在動詞的後面呢？

② 王力先生舉杜甫“頓頓食黃魚”句作為“頓”等一類來表示事物單位（名量）的例，既不典型，也嫌太晚，是不對的。參看前頁注①，247頁。



# 汉语词汇史随笔

郑 冀

## 汉语

什么叫“汉语”？这个名称是怎样来的呢？

“汉语”这个词的意义，最初指的是汉朝人的语言，后来发展成为汉民族语言的名词。

也有称为“汉言”的，如《广韵》（模韵）苦下云：“梵言菩提，汉言王道。”

以朝代的名称称它一代的语言，不止“汉语”，在“汉语”以前，有称“秦语”的。例如：

其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觴为行酒，相呼为徒，有似秦语。（后汉书，东夷传）

晋语里也有称“秦言”的，“言”字可作动词解，义微别：经称有余涅槃无余涅槃者，秦言无为，亦名灭度。（晋书，卷下）

“和波陀，秦言语言”，“波陀秦言句，句谓句逗。”（宋，翻释名义集，十三）

晋代之后，有称“晋语”的：

“高坐道人作汉语”。注作“不学晋语，诸公与之言，皆因传译。”（世说新语，言语）

唐征晋语，近慧方等之录。（史通，杂说中）

宋语“宋言”的（南朝刘宋）：

楼喜拜曰：“处可寒。”房言处可寒，宋言尔官家也。遂立子祝连为世子，委之事，号曰莫贺郎。莫贺宋言父也。（宋书，鲜卑吐谷浑传）

唐语“唐语”的：

南毗国都城号阿抹，唐语曰礼司。占城国唐人被土人杀害，追杀偿死。（宋，赵汝适：诸蕃志）

宋语“宋语”的（赵宋）：

诗不取改，贵乎精也。唐人改之，自是唐语；宋人改唐之，自是宋语。格调不同故尔。（明，谢榛：四溟诗话，二）

怎奈向，宋人语，向作一匙二字解，今语向也。（清，宋四家词选，周济评注）

从“秦语”到“宋语”，大都以朝代的名称称它的语言。其中有当代人称当代的，有后代人称前代的，又有个人称中国语的。独有“汉语”①既可指称汉朝时人语言，如：

其于文也，大率所谓宋头巾气习，求一秦字汉语，了不可得。（明，唐顺之：答皇甫百泉书）

以校猎说猎者，以汉语释古语也。（清，王筠：说文句读，猎字下）

同时又是指的由来已久的汉族语言，“唐语”“秦语”也用得比较广泛，这里不谈。

但言万象既生，假名遂立，梵言菩提，汉语曰道。（梁，刘勰：灭惑论）

高祖十有九年诏始为汉语，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违者免官。（太平御览，引后魏书）：

其妻皆人，能汉语。（欧阳修：五代史附录）

黎人半能汉语。（宋，周去非：岭外代答）

成宗十一年（按为明成化十六年，公元1480年）九月御晝講，侍讀官李昌臣啓曰：前者承命質正汉语于头目戴敬，敬見《老乞大》《朴通事》，曰：此乃元朝时语也。与今华语顿异，多有未解处。（朝鲜，李朝实录）

其实，唐代以下，称“华语”“华言”的都有：

收弘撰魏周二书，必諱彼夷音，变成华语（唐，史通，言语）

以华语唐文译刻释氏经典（唐，白居易：苏州重玄寺法华院石壁经之碑）

白狼王唐丛等歌诗三章——东观记载其歌，并载夷人本语，并重译训诂为华语，今范史所載者是也。今录东观夷言以为此注也。（后汉书，西南夷传，注）

尔国人能习华语者来习肄。（明，张燮：东西洋考）

渤泥国其字细小，横读之，译以华语云渤泥国王向打稽首拜皇命，万岁万岁万万岁。（宋，诸蕃志）

至于把记录汉语的文字叫做“汉文”“汉字”的，如：或善梵义而不了汉音，或明汉文而不晓梵意。（梁，僧祐：梵汉译经音义同异记）

十八年封金源郡王，始习本朝语言文字及汉字经书。（金史，章宗纪）

还有：

惟中原汉音，四方可以通行，四方之人皆喜于习说。

① 按《后汉书·荀爽传》：“又集汉事成败可为鑒成者谓之汉语。”集解云：“其书晋时尚完。”这里同现在通称的“汉语”名同而实异，不能并为一谈。此外，也有称“汉人语”的，如清《说文解字》段注：“枪唐也，枪唐盖汉人语。”元陈秀明编《东坡文谈录》：“东坡岭外归，与人啓云：‘七年远谪，不意自全，万里生还，适有天幸’。所记字皆汉人语也。”宋陈师道《后山诗话》：“前汉书项羽意乌猝嗟，李奇注猝嗟犹咄嗟也。后汉何休注公羊曰：噫咄嗟也。此咄嗟已明验汉人语矣。”宋叶少蘊《石林诗话》：“荆公诗尤精于对偶，尝云：用汉人语止可以汉人语对，若参以异代语，便不相类。”唐《周礼疏》：“放想，可畏怖之貌，汉时有此语。”

(元,水天禁語)

从前称中国为汉,宋代馬永卿《懶真子》引《西域傳》載:“汉武帝輪台詔曰:‘匈奴縛馬前后足,言秦人,我丐若馬。’”注謂:“中國人為秦人,習故言也。今謂中國為漢亦猶是耳。”這也可作為參考。

這里附帶談一下,漢語中的“吳語”的“吳”,既是指分立的朝代(三國吳)名稱,又兼有地方的意義,而且同“漢語”相類,是古今通用的,例如:

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裏彈棋局曰:“何乃澗”(吳人以冷為澗)。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世說新語)

桓玄問羊孚何以共重吳聲?羊曰:“當以其妖而浮。”(同上)

俱兄且以我吳人而吳語也。(明,唐順之,答茅鹿門書)

方言入詩多吳語。(宋,梁溪漫志)

但是這同單純的以某一個時期地方名的“齊言”“楚語”是有區別的:

是夜也,趙孟及子晰盟以齊言。(左傳,襄二十七日)

猶生長于楚,不能無楚語。(賈誼新書,意林引)

### 語法

現在一提起“語法”,有人就以為是屬於口語的,是同文言的“文法”相對的。其實,從歷代文獻來看,“文法”“語法”散稱時可以相通。“文法”一般地也使用為作文法的同義詞,這里不去談它。“語法”不限于口語,作為文理、文脈、語勢、語脈等近義詞的用法,似乎其來已久了。我們先看:

魏崔浩曰:“輕騎南下,布濩林薄之間。”辨誤曰:“余謂崔浩言……正祖司馬相如上林賦‘布濩太原’語法。”(元,胡三省:通鑑釋文辨誤,117)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也。”或訓焉為何字而屬之下句。“庶焚,子退朝,曰人乎?不問焉。”或讀不為否,而屬之上句。又豈是非姑置不論,且道世之為文者有如此語法乎?凡解經,其論雖高,而于文勢語法不順者,亦未可從,況未高乎?(金,王若虛:論語辨惑)

始吾于人,此一章而稱子曰,胡氏疑其衍文,或謂之長。子謂以語法視之,只是一章。(同上)

學則不固,旧說以固為蔽,而新說曰固堅也,不能重,則學亦不能堅,以語法律之,旧說為長。(同上)

要是上推至宋代,則有如:“作文語法渾渾正正,怪奇,前輩評之詳矣。”“又語法之清空精到。”(穎川語)不過,這兩處所指的“語法”實同修辭相近。此外,還

此八用且字,而上下呼應,則用兩乎字,語法(宋,陳叔方:穎川語小)

“式微、中露、泥中”言行役冒犯之苦。語法如此,是地名也。(宋,王質:詩總聞)

汾沮洳,班氏魏在晉南河曲,故曰彼汾一曲,覽語側,不必如此,水豈有無曲,莫不在側,特語法爾。(宋,王質:詩總聞)

天保,郊氏輟傳神辭,上不稱人,以先字貫于中,長上下稱事,以否字貫于中,其語法正同。(同上)

如果再上推至唐代,我們還可以從孔氏《左傳》里見到:

《左傳,昭公二十年》:“尔其勉之,相从為愈。”“愈差也”。《正義》曰:“勉謂努力。尔其勉之,力報仇,比于相从俱死為愈也。病差謂之愈,言共死也。服虔云相从愈于共死,則服虔相从使員言也。語法兩人交互乃得稱‘相’,獨使員从已不得為相从也。”

這里所稱的“語法”不一定是最早的出處,因為唐以上還應該可以推証,現在姑志于此。

## 上海語文學會積極準備迎接國慶十周年

上海語文學會是上海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的組成部分,1958年6月成立。大多數會員是上海復旦大學、東師範大學、上海師範學院、上海中學教師進修學院和一部分中小學的語文教師,另外也有機關、工廠、研究單位以及社會上的一些語文工作者。

學會成立以來,已經舉行過多次學術活動。最近為了積極準備迎接國慶十周年,他們決定編寫毛澤東研究論文集和語文基本知識叢書。編寫計劃大致如下:

毛澤東語言研究論文集由復旦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上海師範學院、上海市中學教師進修學院以及上海教育局語文研究室等單位共同負責供稿,七月底以前交稿。語文基本知識叢書分漢語、漢字改革、普通話語音、和寫作、語法和寫作、修辭、怎樣使用標點符號、文章結構、文風、民歌民謠的語言,共十小冊。每冊均有專人負責。以上兩部書,爭取在國慶十周年以前出版。(秋)



# 概数詞“来”的出現及其由来

胡竹安

“来”的起源，吕叔湘先生在《再说“来”，以及“多”“半”》④一文中说：“‘来’的最初的形式可能是‘以’。”这种假设颇为可信。现在先将唐五代出现的“以（日来）”的例子分两类抄录如下：

(一)“以来”前边是数量词或者数词加名词的:

- 1) 五台山北台下有青龍池，約二亩已來。(大唐傳載：22)
- 2) 卽提一水瓶，可受二斗以來。(仙傳拾遺：張定)
- 3) 俄尔中間，擊一大鉢，可受三升已來。(游仙窟：11)
- 4) 須臾間，肉塊破，有小蛇一條突出在地，約長五寸，五色爛然，漸漸長及一丈以來。(大唐奇事：王守一。商務版國學基本叢書，《舊小說》，乙集六，第2頁)。
- 5) 擊一小兒，年十歲已來，有刀截下頭，臥于地上，以頭安置之，遂乞錢，云：“活此兒子。”(中朝故事，中華版《大唐傳載、幽閑鼓吹、中朝故事》合輯本，第46頁)。
- 6) 其夜，西楚霸王四更已來，身穿金鈿，揭上(去)頭牟，反衙(牙)床如坐，詔鐘馗末附近帳前。(敦煌變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版，40)
- 7) 去寺百步已來，遠公重啓將軍曰…(同上：172)
- 8) 臣啓大王：莫道三日，請假一月已來慙得。(同上：200)
- 9) 行經數日，大羅王化作一河水，其河闊五里已來…(同上：217)

(二)“以来”前边是数词的:

- 10) 其夕，夢一少年可二十已來。(瀟湘錄：牟穎。商務版《旧小說》，乙集六，第53頁)。
- 11) 見前一人纖腰身修，眸容，甚閑暇，衣黃衣，冠王冠，年三十以來。(牛僧孺：周秦行記。文學古籍刊行社版，《唐宋傳奇集》卷四，第137頁)。

在这些例子中值得注意的是：a) “以来”前边都是带节的词或者词组；b) “以来”后边没有出现名词、量词或者形容词，都是以“以来”煞尾；c) 用“以来”不一定“数值是往小里去”。②例2、例3、例4、例8四例中“××以来”，从上文来看，无疑是“××左右”的意思。即以吕叔湘先生所引的《葆光录》中的一例而论，其谷柳三二合来”的“来”，何尝不可以认为是“左右”呢？吕先生在《再说“来”以及“多”和“半”》中认为“来”之所以有时使人意识“数值是向两边活动”，可来自“来往”“来去”。其实在《水滸傳》以及同时期的作品中（有的可能比《水滸傳》早些），“来”字表示向两边活动的数值已经很明确。例如：

- 12)詞狀人拋箱，大尹看到第十來紙狀…(古今小說：  
80•543)

錢。(警世通言：37·557)

14) 那人生得八尺來長，淡黃骨查驗…(水滸全傳：35·550)

为了証明“来”表示“左右”并非源自“来去”，这里还可以提供一个旁証。在宋元作品中，“来”还能在名詞之后形容詞之前用来表示“象…那样”；这个“来”显然也不是表示“数值往小里去”。例如：

…騎一匹駱駝來高慣戰馬。(七国春秋平話: 26)

…書着簸箕來大四個金字…(三國志平話:8)

自古妻賢夫禍少，做出事比天來大。（清平山堂話本：  
03）

我想《水滸傳》中的“來去”，只是跟“左右”“上下”一等的格式，很難說它就是現代漢語中概數詞“來”的一個來源。

“以来”前边都是双音节的詞或者詞組，这一个現象非常重要，因为繼“以来”而出現的“来”，就是在这一点上获得立足点的。当双音数詞帶有單音量詞（或名詞）的时候，“以来”和量詞势必配成奇数音节，这样口讀就觉得别扭，为了使音节匀称，把“以”省掉了。單音数詞和單音量詞后边如果有單音名詞（或形容詞），与上述同一原因，“以来”的“以”也脫落了。至于“来”这形式完全替代“以来”以后，特别是“来”的位置还没有固定下来的一段时期中，例外的情形也是有的，例如：

此去山中十里来，有一甍融。（景德傳灯录，四部丛刊本4.4）③

宋元白話作品中，“來”的位置已基本上固定下來。明代起，“來”的位置和現代漢語已完全一樣：數目不滿“十”的，“來”放在量詞之後；數目大於“十”的，“來”放在量詞之前；數目是“十”的，“來”的位置可以在量詞之前或者之後。這樣的位置，一般說來，同“以來”之所以讓位給“來”的原則是是一致的。試看：

(一) 項:

格式：数|量|以来→数|量|来|{名形}

音节: 1 2 3 4 1 2 3 4

例：五里以来 五里来闊

三 亩 以 来      三 亩 来 地

只有單音节数詞后边的某些名詞(如“岁”“月”),因为一般不能轉为量詞,所以不适用这一項原則。

① 見《中國語文》1957年9月号，24頁。

② 見呂叔湘：《再說“來”以及“多”和“半”》。

③ 轉引自《再說“來”，以及“多”和“半”》。

## 略談双提分承

朱係燚

双提分承，是造句的一种方法。就是在同一句或同一段中，前面提起两件事，后面按照前面提起的次序，分别深入说明或加以补充；双管齐下，次序一致。这种手法运用得好，能够在简短的文字中表达比较复杂的意思，使文章结构更加严谨。

在論說文、通訊报导、記叙文等文体中，运用双提分承比較多。例如：

- 1) 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前，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着这种性质。（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論）
- 2) 大、小神座的上下四周，雕刻着以牡丹花、荷花、菊花等组成的八个大花圈，这些花朵象征着品质“高貴”、“純潔”和“堅忍”，表示全国人民对英雄們的久遠怀念和敬仰。（1958年4月23日人民日报，周定舫：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瞻仰首都人民英雄紀念碑）

两个例句中，單綫上的詞語彼此呼应，双綫上的詞語也彼此呼应；条理清楚，簡潔精煉。

在小說中也会用到这种笔法。例如：

- 3) 我在娘家这几天，就有人到賀家壩去，回来說看見他們姪兒，母亲也胖，兒子也胖；……（魯迅：祝福）

运用双提分承的笔法，最需要注意的是邏輯性，前后要呼应；否則，容易引起誤会。如在这一句中：

- 4) 我們历来就主張，在人民民主專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間和人民內部这两类性質不同的矛盾，采用專政和民主这两种不同的方法。（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如把“敌我之間”和“人民內部”的位置前后掉換，或把“專政”和“民主”的位置前后掉換，就会造成意义上的

錯誤，变成用專政的方法解决人民內部矛盾，用民主的方法解决敌我矛盾了。在口头上和書面上，常会“双提不承”的語句。例如：

- 5) 姊姊和妹妹，一个十七岁，一个二十岁。
- 6) 我們要在自己學習或工作的机关、学校里起带头作用。（以上口头）
- 7) 这个決議系統地总结了人民公社發展的經驗，論上和政策上对于人民公社發展中的各个基本問題，作了詳細的規定和深刻的說明。（紅旗1960年第1期：有历史意义的綱領性文件）

在这些例句中，應該进行适当的詞語調整，使句子严密，前后意义承接。如例7，可把“政策上”与“論上”掉換位置。在“政策上”作了“詳細的規定”，在“論上”作了“深刻的說明”，这才講得通。

但不能一概而論。有一些詞語，在某种情況下，法再把位置前后掉換，也不能硬性規定，强要拆換。例如：

- 8) 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存在着剝削和壓迫的矛盾……（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这一句中，运用了双提分承的笔法，看起来好像“不承”，應該改动，其实不然。因为用“和”連結詞語照習慣，总是把主要的放在前面，所以“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存在矛盾，不能改为“民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存在矛盾。同时，“剝削与被剝削”成为固定的短語，改成“被剝削与剝削”就十分别扭。所以例8的写法是非常妥当的，不能片面地强調逻辑性而进行修改。照原句这样讀起来，也不会产生誤会。

### （二）項：

格式： 数詞 | 以来 → 数詞 | 来 | {量名}

音节： 1 2 3 4      1 2 3 4

例： 二十 以来      二十 来 岁

九十 以来      九十 来 尺

“十”之所以有两个可以安放的位置，那是因“十”在唐宋时常写成“一十”，“十”是單数音节，“一十”是双

数音节。因此它既适用于（一）項，又适用于（二）項。

总之，“来”的最早形式确是“以来”，現代汉语“来”之所以有两种位置是有其历史淵源的。

現代汉语中概数詞“来”的語源，以前語法學家談到的很少。我在这兒只能說是供一些資料，作一大胆的試尝，很可能有不少不正确或者不周密的地方，望大家来討論。



# 論“就、便、才”类型的詞的形态特征問題

〔苏联〕 郭 俊 儒

在現代漢語里，并列复合句和主从复合句是借助連詞来組成的，除此以外，常常还出現借助于“就、才、还、也”等詞把若干个句子組合成一个复合整体情况。

这一組詞在复合句範圍內占的比重很大。它們用書面語里，同样也用在口語里。特别是这些詞无疑可以用来組成主从句，这些詞的句法功能就是組合的手段，这已由許多漢語語法研究者所証明。

例如，王力教授称“又”“也”这些詞为“关系末”，并且指出，它們“又是表示两个句子形式之間的关系”。① 高名凱教授在研究了这些詞以后写道：“……它們（指“就”“則”等其他“聯絡虛字”——郭注）的担負有聯絡前后命題的責任。”② 雅洪托夫（C. E. 雅洪托夫）关于这些詞的类似的功能的說法是跟隨中國學者走的。③ 当时我們也曾談到并列复合句和主从句这类虛詞的用法。④

“就、便、才”这类型的詞的形态学特征情况有些不同。对于这类詞的形态学性質，無論是中国學者，或其他各国的學者都持有不同的見解，并把它們归入不同的詞匯-語法范疇。正是这种情况才促使我們專門研究這個問題。

下面我們簡略地敘述一下現在存在的一些观点。王力教授不同意把这些詞当作連詞，从而他認為要把它們归入副詞。誠然，他一方面把这些詞归入副詞，一方面又給它們一个特殊的名称——“关系副詞”。⑤ 呂叔湘教授把“也、又、就、还”等詞列为意义到限制的“限制詞”，但是他又在同一个地方加上括弧称它們为副詞。⑥ 黎錦熙教授詳盡地研究了簡單句复合句里的这些詞的功能。他把上述諸詞列入“承連詞”。⑦

高名凱教授則認為，漢語是无形态的。因此他沒提出虛詞的形态学特征，而只是依据这些詞在句中表示的关系，确定了它們的功能。高名凱認為，不能研究的这些詞称为从屬連詞，他把这些詞叫做“聯絡虛字”。同时高名凱照顧到这些詞跟其他一些可以归入“聯絡虛字”的詞的區別，他又用了專門的術語——“副詞”来指称它們。这个術語的涵义應該这样理解：这

一类型的詞确定一个句子的前后部分之間的关系。⑧（高先生的原文是“即承上接下之意”——譯者）廖庶謙在他的《口語文法》一書中把帶有上述类型的詞的句子划入无連詞句子。可見廖庶謙並不認為这些詞是連詞，但是他指出，它們是用来作为一种联系句子各个部分的手段。他在專門研究并列复合句的一章里指出，这些詞是動詞的修飾語，因而称它們为副詞。⑨

从上文所引述的文獻中可以看出，中国學者在这个問題上持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在苏联的語言學家中間，对这些詞的形态学本質的理解，同样也是不一致的。

龙果夫教授指出这些詞具有双重作用——意义的和語法的作用，并称它們为半实詞性的語气副詞。⑩ 鄂山蔭教授給了这一类型的詞以不同的称谓。他在《華語課本》里把“就、便、才”这些詞称为謂語的特殊的輔助性時間修飾語。⑪ 但是在《漢語》一文中，他却把其

\* 本文是作者（上期本刊把作者名字音譯为高列洛夫，后来發現作者本人取名为郭俊儒，特此更正）于1956年在《軍事外語學院論文集》第十期上發表过的。由于本刊曾發表过这类文章，作者特将原文投寄本刊，参加討論——編者。

① 王了一：《漢語語法綱要》，新知識出版社，1957年，146頁。

② 高名凱：《漢語語法論》，開明書店，1948年，265頁。

③ 雅洪托夫：《現代漢語中借助于虛副詞构成的主从复合句》，苏联科学院东方學研究所學術報告，1952年，莫斯科，第四冊，374—409頁。

④ 郭俊儒：《漢語語法（复合句）》，《軍事外語學院論文集》，莫斯科，1—4頁，108頁。

⑤ 王力：《中國語法理論》（上冊），商務印書館，1951年，353頁。

⑥ 呂叔湘：《中國文法要略》（上卷），商務印書館，1954年，26頁。

⑦ 黎錦熙：《新著國語文法》，商務印書館，1933年，223、276、293頁。

⑧ 高名凱：《漢語語法論》，開明書店，1948年，265頁。

⑨ 廖庶謙：《口語文法》，三聯書店，1950年，62、117頁。

⑩ 龙果夫：《現代漢語語法研究》，中譯本，科學出版社，1958年，123頁。

⑪ 鄂山蔭：《華語課本》，1946年，莫斯科，188頁。

中一个詞，亦即使用于复合句中的“就”这个詞称为連詞。<sup>①</sup>雅洪托夫管我們所研究的这些詞叫做輔助副詞，并且認為它們在复合句中用作从屬連詞。<sup>②</sup>《華語課本》（1954年出版）的作者也管“就”这个詞叫做連詞。<sup>③</sup>

穆勒（Jos. Mullie）把“也、又、就”这些詞划入了連詞。然而，他在估計这些詞的特征时順便指出“也”这个詞并不完全对应于英語里的連詞and。<sup>④</sup>

可見，假如把具有狹小的術語意义的个别細節放在一边，那么我們就能談到两个基本的、非常明确地被下了定义的观点：一些語言学家認為这些詞是連詞；而另一些語言学家（他們占大多数）則認為这些詞是副詞。虽然这些人通常管它們叫做虛詞、半实詞、語气詞，但是又称它們为副詞。

我們認為，这些詞不同于副詞。同时这些詞所固有的許多特征，也使它們有別于連詞。至于談到高名凱教授的观点，我們覺得，如果放弃了那种对詞形和整个形态学（語法的一个部門）的問題的狹隘观点，那么無論是漢語或所有其他語言中的詞都能够划入一定的詞匯—語法的类别或范疇，換句話說，語言中不可能有不具形态特征的詞。

什么是使上述諸詞一方面區別于副詞，另一方面又區別于連詞的特征呢？應該把它們归入哪类虛詞呢？

在現代漢語里，跟“就、便、才、还、也”等副詞并存的还有在物質上与它們相同的派生虛詞\*。后者之所以不同于副詞在于，它們已經在頗大程度上丧失了它原来的实体意义，因而获得了虛詞类的意义。

副詞是一个实詞类，它可以作为句子的一个独立的成分，可是上述諸詞在复合句里不起独立的句法作用，就是說，它們不是句子的成分。而这正是能够精确地划分实詞和虛詞界綫的最基本的标准。<sup>⑤</sup>

从这个观点上来看，“虛副詞”这个術語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因为只要承認詞的虛詞功能，就排除了把这些詞归入实詞类的可能性。我們認為，能把諸詞归入各种不同語义—結構类型的实詞功能和虛詞功能，对一个詞來說，在原則上是不能兼备的。

根据同一見解，把術語“半实体副詞”和“語气副詞”也应用于“就、便、才”类型的詞的身上，是不妥当的。

上述諸詞，虽然具有虛詞类的意义，并且在現代漢語中具有一定的句法功能，特別是，它們是句子的从屬关系的一种手段，但不能归入連詞。現在，我們来比較細致地研究这种情况。

王力教授指出，“倒、又、就、也、却”等虛詞与連詞是有很大的区别的。<sup>⑥</sup>高名凱教授在研究另一种

“聯絡虛字”（这里指的是“不是被引导詞”的“聯絡字”——譯者）“則、就”时着重指出，它們完全不西歐語中的从屬連詞。<sup>⑦</sup>因而，这些詞同連詞有区别，不同。

首先應該指出，我們現在研究的那些虛詞，語法的程度要比連詞小。被它們所引入到句子中去的附加的詞匯意义，有时是很明显的。

在这方面，王力教授的論点是有很大的意义的。他說：“即”（虛詞“就”的書面变体）除了表示一个复体几部分之間的意义的关系以外，例如，時間的連續性，因果的連續性，还表示時間距离之短，由此可見起經常用作連詞功能的虛詞“則”來說，‘它的意义’得較少。<sup>⑧</sup>

“就、便、才、还、也”等虛詞，一方面担负的句法功能，同时，在很多場合里，还表达附加的意义。例如：

他来，我就去。 他来，我才去。

應該指出，虛詞“才”比“就”保存原来的意义多些。

因此，不能同意雅洪托夫的那种論断，即这些“获得純粹語法功能——从屬連詞的功能”。<sup>⑨</sup>

研究这些詞的这样一种特点也是比較重要的，在复合句中，它們只能位于主句中謂語的前面，然而于主句中的連詞，照例位于主語之前。連詞只有在主句中缺主語的情况下，才出現在謂語的前面。王力也注意到了这个特征。王力在探索虛詞“則”和“即”的發展过程时順便談到，这些詞因在句中所占的位置同而彼此不同。<sup>⑩</sup>讓我們来举些例子：

① 鄂山陸：《漢語》，苏联大百科全書，21卷，320頁。

② 雅洪托夫：《現代漢語中借助于虛副詞构成的主从复合句》，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学术报告，1952年，莫斯科第四册，374—375頁。

③ 伊三克、郭路特、苏維托夫·陈：《華語課本》，1954年，莫斯科，306頁。

④ 穆勒：《漢語的結構原則》，1937年，北平，582頁。

\*按原文所說：“在物質上”与“就、便、才、还、也”等词的派生詞，我們的体会是指跟汉字“就、便、才、还、也”等词壳相同的詞，也即本文所討論的这些詞。——譯者

⑤ 参看巴尔呼达洛夫（Л. С. Бархударов）《虛詞及其功能》，《軍事外語学院論文集》，1952年，第一期，13頁。

⑥ 王力：《中國語法理論》（上册），商务印書館，1955年，355頁。

⑦ 見高名凱同書，255頁。

⑧ 王力：《中國語法理論》（上册），商务印書館，1955年，358頁。

⑨ 見雅洪托夫同書，302頁。

⑩ 王力：《中國語法理論》（上册），商务印書館，1955年，357頁。



“如果你们的工作出了毛病，那你就该负责。”（張天翼：華威先生）（着重号是譯者所加的，下同）  
五妹虽然只有五六岁，但这消息也很使在病中的爹伤心。（巴金：家）

日俱结蒂，还是不能把“就、才”等虛詞跟連詞混談，因为后者是句子的从屬关系的更完善的手段。在特殊情况下，用“就、才”及这类詞中其他詞作手段所构成的从屬关系，特别是脱离开上下文，而要确切地确定副句的意义，是很困难的。关于这点，雅洪托夫在自己的論文中指出，“就、便、才”等詞本身并未能判断，前一个句子究竟是指主要动作完成的时间还是指該动作借以完成的原因或条件？<sup>①</sup>

在这种情况下，副句的意义通常由語調或作謂語的詞的語法形态手段来确定。至于在借連詞所构成的从屬关系中，存在于复合句各部分之間的意义的关系是准确而又明了的。

例如，在“他来，我就去”这样的复合句里，从屬关系是借虛詞“就”而实现的，但是后者（即“就”——譯者）不能准确地确定副句的意义。因此，整个复合句可被理解成两种意思：1)他来的时候，我就去；2)如果来，我就去。但是，我們認為，只要在这个句子里加一个連詞“如果”，那时副句的意义就完全清楚了：如果他来，我就去。

上述这类虛詞不限于用在主从复合句范围之內。連詞还能作为联結句子的手段，用于并列复合句。

風息了，雨也住了。（廖應謙：口語文法）  
法庭宣告他无罪，他就出了監獄。（黎錦熙：新著國語文法）

复合句中假如沒有連詞，“就、便、才”等詞的詞性便表現得不够明确，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們是唯一作为組合句子的手段而發生作用的虛詞，如果分析得不深入，的确也容易把它們当作是連詞。至于在帶有連詞的复合句里，决定这些詞不同于連詞的特征表現得較為明显。事实上未必就能說：“就”和其他这类虛詞在帶成对的連詞“如果——那么”“虽然——但是”等主从复合句中是連詞，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們不可避免地要承認，在这里涉及的已不是成对的連詞，而是“三重”連詞了。

維諾格拉多夫院士在給語氣詞概念下定义时写道，它們乃是“由混合类型的（半語法的、半詞汇的）共同特性以及处于中間位置（一方面介于副詞和語氣詞之間，另一方面又介于副詞和連詞之間）这一特点所联合起来的詞群”。<sup>②</sup>

現代漢語“就、便、才、还、也”等虛詞，是把句子組成一个复合整体的手段，并使句子获得了附加的詞汇意义。它們处于副詞和連詞之間。

这类詞按其起源和附加意义來說，它們傾向于副詞，而按其作为一种句法关系的手段的功能來說，則傾向于連詞。这些詞已經（着重号是原有的，下同——譯者）不可能成为副詞，然而也还没有轉变为連詞一类。

綜上所述，我們可作出如下的結論：“就、便、才、还、也”等虛詞是連詞型語氣詞。（龙魯揚譯，刘舜校）

① 見雅洪托夫同書，239頁。

② B. B. 維諾格拉多夫：《俄語》，莫斯科，1947年，664頁。

## 再談“討喜”

刘 琳

看到《中國語文》1958年11月号刘培倫同志的《揚州話里有“討喜”》一文，我想說几句话。

刘培倫同志这篇短文主要是說，“討喜”在揚州話里普遍使用着，笔者在《要对汉语规范化負責》一文中所說的“討喜”“沒有被大家采用”，是“主觀臆斷”，“沒有更多的进行調查研究”。因而認為：“既然‘討喜’这个詞兒在揚州話里用得很普遍，将来又有誰能限制它不被吸收到普通話里去呢。”其实，我写的那篇短文的中心意义是說，造新詞或給旧詞以新的意义，必須根据需，不要乱造、乱用，防止語言产生混乱現象。我不同意比照現有詞乱造相“詞”，文中除拿克萊同志所举的例子說明道理外，还举了几个例子。應該說这才是討論的關鍵問題。

我对全国各地的方言的确很生疏，看了刘培倫同志的文章才知道“討喜”一詞在揚州話里普遍使用着。但是，我認為，問題并不在于某个地区普遍使用与否，而在于我的短文中所說的“沒有被大家所采用”的“大家”应当怎样理解。我想怎么也不应当被理解为只是指某一个地方的人。“沒有被大家所采用”这句话的时间意义，也只是到写哪篇文章时为止，它不包括今后。既然如此，說“討喜”一詞“沒有被大家所采用”又有什么可以責难的呢？

在方言里普遍使用着而沒有被普通話吸收的詞是成千上万的，究竟哪些将被普通話所吸收，这需要今后的事实来証明。“討喜”一詞虽然在揚州話里普遍使用着，但是至今总还没有被普通話吸收，今后是否能被普通話吸收，也只有讓今后的事实告訴我們。因此，我認為刘培倫同志文章的結論跟我提出的問題根本没有对上口徑。

# 中和方言中的“坏”“骨”“圪”

賀 巍

中和在河南省北部，方言屬“官話”系統。就語音語法上說都和普通話有一些差別。本文僅談一談中和方言中“坏”“骨”“圪”的一些語法現象。

“坏”“骨”“圪”①都讀入聲。“坏”讀[pəʔ³]，“骨”讀[kuəʔ³]，“圪”讀[kəʔ³]。它們本身沒有什麼意義。

“坏”“骨”“圪”只能構成名詞、動詞、形容詞、量詞，它們各有不同，分述於下：

## 一 名 詞

1) “坏”“骨”“圪”構成的名詞，只能表示實物。“坏”作詞头的多表示小的、碎的、片狀的或穗狀的東西。例如：

玻璃坏渣 (碎玻璃片)  
瓦坏渣 (碎瓦片)  
鍋坏殘 (殘破的鍋)  
碗坏殘 (打破的碗)  
玉蜀黍坏絮 (玉米穗子)  
谷坏絮 (谷穗子)

玻璃、陶器、瓷器打破了以後的碎片，都可以叫“坏渣”。金屬、陶土等作成的容器打破了以後片較大的都可以叫“坏殘”，無論什麼穗子都可以叫“坏絮”。

“骨”作詞头的多表示粗短的或半圓形的物體。例如：

柳木骨轆 (鋸成段的柳木)  
楊樹骨樁 (楊樹把枝去後剩下的樹干)  
打珂拉骨度 (砸土塊的錘頭)  
掃帚骨度 (磨壞了的掃帚頭)  
柴火骨堆 (柴火梁子)

無論什麼木頭，只要鋸成段都可以叫“骨轆”。無論什麼樹，把枝去後所剩的樹干都可以叫“骨樁”。無論什麼工具，把上安的如果是圓形的頭，都可以叫“骨度”。無論什麼堆起來的，只要是圓形，都可以叫“骨堆”。

“圪”作詞头的，多表示叉形的、針狀的、碎粒狀的、絲狀等的東西。例如：

榆樹圪嵌 (榆樹砍了以後留的叉形杈子)  
槐樹圪杈 (槐樹的枝杈)  
棗樹圪針 (棗樹上的刺)  
玉蜀黍圪星 (玉米穗子)  
蘿卜圪絲 (細蘿卜絲兒)

無論什麼樹或什麼東西，砍了以後留的叉形杈子都可以叫“圪嵌”。無論什麼樹的枝杈都可以叫“圪杈”。樹上的刺或草上的刺都可以叫“圪針”。碎粒狀的都可以叫“圪星”。

2) “坏”“骨”“圪”構成名詞，只能作詞头，不能省略。表示較大的東西，不能兒化，表示較小的東西必須兒化。如果強調某種東西特別大或特別小，前面必須附加單音節的形容詞。例如：

大木頭骨轆  
大打珂拉骨度  
小木頭骨轆兒  
小打珂拉骨度兒

“大大”木頭骨轆或“小小”木頭骨轆等都不能說。

3) “坏”“骨”“圪”構成的名詞，不能跟“头”“員”等類的詞尾。後邊可以跟“子”尾，但必須子化(元音變化表示)，例如：

坏渣(tsa³³)子→poʔ³ tso³³  
坏絮(ɕy²¹³)子→poʔ³ ɕy²¹³  
骨樁(tʂuaŋ³³)子→kuəʔ³ tʂuā³³  
骨度(tuaʔ³)子→kuəʔ³ tuə³³  
骨堆(tuei²³)子→kuəʔ³ tyŋ³³  
圪嵌(tɕʰian³¹)子→kəʔ³ tɕʰiā³¹  
圪杈(tsʰa²¹³)子→kəʔ³ tsʰa²¹³  
圪絲(sɿ³³)子→kəʔ³ sɿ:ou³³

4) “坏”“骨”“圪”構成的名詞，前邊必須加形容詞，例如“木頭骨轆”，“榆樹圪嵌”，“玉蜀黍坏絮”等。但在特定的環境里，前邊可以加形容詞。例如：

這是粗圪絲，還是細圪絲。  
這是粗骨轆，還是細骨轆。

上述都是指具體的東西說的，如果沒有這種環境，這類名詞前邊，一律不能加形容詞。

5) “坏”“骨”“圪”構成的名詞，可以作主語、賓語，但不能作定語。例如：

蘿卜圪絲太細。  
木頭骨轆太粗。  
土圪星刮到我眼里了。

① “坏”“骨”“圪”都是借來表音的字。“坏”和“不”同，特加“口”字傍，表示區別。



上述都是主語。作賓語時，前面必須加數量詞。例

他拿一個鍋坯殘兒。  
他搯一個打坷垃骨度。  
他推一車樹杈杈。  
他瓦①一碗玉蜀黍圪星。

如果不加數量詞，句子必須是連動式。例如：

他搯打坷垃骨度打坷垃。  
他瓦玉蜀黍圪星做飯。  
他拿打把骨度打把。  
他栽木頭骨樁拴牲口。  
他拿玻璃坯刮筷子。

6) “坯”“骨”“圪”構成的名詞，多是雙音節的。但有極少數的詞是三音節的。例如：

圪老枝兒 (肘肢窩)  
坯老蓋兒 (膝蓋)  
圪夾道 (不能行人的夾道)  
骨節棒兒 (一種草的名字)

## 二 動 詞

動詞只能表示具體的動作或具體的行為。

1) “坯”“骨”“圪”構成的動詞，多表示動作的繼續。有兩種方式：

a) 來回式。表示動作來回反復進行。例如：

你把身上的油坯擰 [lye<sup>23</sup>] 淨。  
張老三氣的坯煎 [i<sup>3</sup>çian<sup>33</sup>] 起來了。  
飯做好了，他坯嘔起來了。  
他躺到床上來回坯郎 [lan<sup>53</sup>]。  
你把飯圪攪涼了。  
他把鳥窩圪搗掉了。  
他骨戳人，真不害臊。

用手來回揉擦東西叫“坯擰”，人上下地跳叫“坯”，嘴一張一合地吃東西叫“坯嘔”，來回地翻滾叫“坯”，用筷子、棍子攪東西叫“圪攪”，用棍子搗東西叫“圪搗”，用手指點人叫“骨戳”。

b) 前進式或後退式，表示動作一直前進或一直後退。例如：

小蟲從土里圪拱出來了。  
小孩子會圪蹬了。  
你躺的太靠下往上骨窸骨窸。  
你躺的太靠上往下骨搖骨搖。

由里向外鑽叫“圪拱”。一只腿向前跳叫“圪蹬”，躺著向上窸叫“骨窸”，向下縮叫“骨搖”。

2) “坯”“骨”“圪”構成的動詞都能重迭。來回式有兩種重迭方式。

a) ABAB 式。這種重迭方式，不能改變詞性，多

命令或強調動作的來回進行。例如：

你坯擰坯擰身上的油。  
你在地上海煎海煎。  
你在床上坯郎坯郎。  
你把飯圪攪圪攪。  
你圪搗圪搗鳥窩。  
他骨戳骨戳你，跑了。

這類動詞重迭時，當中可以加“了”表示動作完成。

例如：

他坯郎了坯郎。  
他圪攪了圪攪。

b) AABB 式。這類重迭方式，使動詞一律變成形容詞。例如：

他坯坯捏捏的吃了五個饅頭。  
他坯坯煎煎的進來了。  
他坯坯嘔嘔的喝了一碗米湯。  
他骨骨戳戳的做好了。

前進式或後退式只有 ABAB 一種重迭方式，這種重迭方式，不能改變詞性，多命令或強調動作的前進或後退。例如：

你圪拱圪拱就出來了。  
你骨窸骨窸就上來了。  
你骨搖骨搖就到底了。  
你在地上海蹬海蹬。

從上述看來，“坯”“骨”“圪”構成的動詞，可以是來回式，也可以是前進式或後退式。但是這些動詞如果有兩種重迭方式的，多屬來回式。如果只有一種重迭方式的，多屬前進式或後退式。

3) 來回式能跟賓語。例如：

他坯擰胡子。  
他圪攪飯，

也可以跟“起來、下來”之類的補語。例如：

他躺在床上海郎起來了。  
他把老鴿窩圪搗下來了。

但是這類動詞重迭之後，一律不能跟補語。例如：

你在床上海郎海郎(後邊不能加“起來”)  
你把老鴿窩圪搗圪搗(後邊不能跟“下來”)

前進式或後退式只能跟“起來、下來”之類的補語，不能跟賓語。例如：

他圪拱出來了。  
他圪蹬起來了。

這類動詞重迭之後前面必須有表示地點的狀語。例如：

他在土里圪拱圪拱。  
你在地上海蹬海蹬。

4) “坯”“骨”“圪”構成的動詞，有極少數的詞能表

① 以容器取物謂“瓦”，如瓦米，瓦面等。

示人的心理活动。例如：

圪思：

叫他上街他圪思起来了。（犹豫不定）

圪意：

这东西不好，我圪意它。（討厭）

### 三 形容詞

“坏”“骨”“圪”构成的形容詞，必須重迭。重迭的方式有下列几种：

a) ABB 式，表示“很”的意思。例如：

（热）坏腾腾的馒头。（很热很热的馒头）

（光）坏年年兒的石板。（很光很光的石板）

圪湛湛的衣服。（很新很新的衣服）

圪软软兒的草地。（很软很软的草地）

骨龙龙的眼睛。（很活很灵的眼睛）

这类詞随着环境的不同，可以表示各种不同的詞意。例如：

这小孩吃得光坏年年兒年兒的。（很胖很胖）

他把飯吃得光坏年年兒年兒的。（很净很净）

圪湛湛的树叶。（很嫩很嫩的树叶）

圪湛湛的水。（很清很清的水）

b) ABAB 式，表示“一”的意思，例如：

楊柳枝圪软圪軟的。（一软一軟）

天空的星星圪閃圪閃的。（一閃一閃）

山上的灯火圪明圪明的。（一明一明）

他骨松骨松的来了。（一松一松，表示没精神）

他骨宣骨宣的来了。（一宣一宣，表示走路有勁）

这类詞的詞意比較固定。

c) AABB 式“坏”“骨”“圪”重迭含有討厭之意。

例如：

他坏坏摆摆的进来了。（大搖大摆）

树枝坏坏来来的挂人。（来回的挂人）

圪圪弯弯的小路真不好走。（弯弯曲曲）

他說話圪圪夹夹的。（話說的不清楚）

他骨骨戳戳的把飯作好了。（馬馬虎虎）

上述的几种重迭詞，可以修飾名詞和動詞；但是，動詞重迭后轉为形容詞的，必須修飾動詞。例如：

他骨骨戳戳的作了一件衣服。

他圪圪攪攪的吃了一碗飯。

其他可以修飾動詞，也可以修飾名詞。例如：

光坏年年兒的石板。

这小孩吃得光坏年年兒的。

d) XABB 式，表示东西的顏色气味，多含討厭之意。①例如：

黄坏嘴嘴的布。（說黃不黃）

灰坏答答的綫。（說灰不灰）

白坏擦擦的头巾。（說白不白）

綠圪纏纏的裙子。（說綠不綠）

黑骨出出的衣服。（說黑不黑）

甜坏嘴嘴的飯。（說甜不甜）

酸圪溜溜的醋。（說酸不酸）

这类重迭詞只能修飾名詞。

### 四 量 詞

“坏”“骨”“圪”构成的名詞，多能作量詞，但前边須有数詞。例如：

一坏紫麦子（一穗麦子）

一骨罐白薯（一塊白薯）

一骨棒粮食（一布袋粮食）

一圪星兒土（一粒土）

中和方言以“坏”“骨”“圪”构成的詞相当丰富。通話里也有这类的詞。比如：“圪瘩”“坏[pu]拉”“朵”等。但这些詞在普通話里只是少数的几个詞的問題，在中和方言里，它不仅是詞的問題，而且也是語法的問題。因为它这种大量的特殊的构詞，在語法上成了一种特殊的功能。比如：“圪”“坏”“骨”构成的詞不能作定語，“圪”“坏”“骨”构成的動詞，可以表現回式和前进式或后退式的不同，“圪”“坏”“骨”构成形容詞必須重迭，由于重迭方式的不同，又可以区分义和功能的不同。諸如此类，都同普通話有显著的區別。本文所談的仅是一些現象，詳細的分析还有待更多人的研究。

① X 必須是單音节的形容詞。



# 廣州話補語賓語的詞序

黃伯榮

本文不打算全面地詳細說明廣州話補語和賓語的各種類型和規律，只是找出它們跟普通話不同的格式和規律，提供給方言研究者和學習普通話語法的廣州人作為參考。

廣州話補語和賓語跟普通話補語賓語不同的地方主要表現在詞序方面，如可能補語的幾種格式，數量補語、程度補語兩者跟賓語的詞序。雙賓語的詞序都有它的特点，現在依次來說明。

## 可能補語

1、廣州話用“得”字單獨作可能補語的情形很常見。肯定式和否定式不一樣，先談肯定式：

- 1) 呢啲嘢佢食得嗎？(這些東西他能吃嗎？)
- 2) 食得。(能吃。)
- 3) 今日佢去得嗎？(今天他能去嗎？)
- 4) 去得。(能去。)

普通話一般不用這種格式，而用“動詞前面加‘能’字”的格式表示，不過在魯迅的小說中也可以找到極少數類似的格式，如：“他家的東西，偷得的嗎？”下面是肯定式：

- 5) 佢發燒，唔食得辣椒。(他發燒，不能吃辣椒，或佢發燒，辣椒吃不得。)
- 6) 我頭暈，唔去得街。(我頭暈，不能上街去。或我頭暈，上不了街。)

這種否定式把否定詞移到動詞前面，而普通話用兩種格式表示，一種是在動詞前加“能”之後再加上否定詞，一種是把否定詞放在動詞後面，這兩點都跟廣州話不相同。

2、廣州話由結果補語轉成的可能補語跟普通話有同有異(結果補語指“吃完”的“完”，由結果補語轉成的可能補語指“吃得完，吃不完”中的“完，不完”。上一條所談的可能補語本身只有一個“得”字，不是由結果補語轉成的)。兩種話相同的是肯定式，如：

- 7) 呢件衫佢一定做得好。(這件衣服他一定(能)做得好。)

不同的是否定式，如：

- 8) 呢碗飯我唔食得。(這碗飯我吃不完。)
- 9) 呢件嘢唔賣得去。(這件東西賣不出去。)

這種格式普通話是絕不能說的，它跟上一段的否定式有共同之點，即否定詞緊緊地放在動詞前面，不過廣州話由結果補語轉成的可能補語否定式，也可以採取跟普通話相同的格式。如：

10) 三斤沙梨我就食唔嚟。(三斤梨子我就吃不完。)

至於單獨用“得”作補語的否定式就不能像普通話那樣，把否定詞放在動詞後面，如例2、4就絕不能說成“食唔得”、“去唔得”。

3、有可能補語的“正反問”是普通話所沒有的。如：

- 11) 佢嘅病啱好，去唔去得呀？(他的病剛好，能不能去呀？)
- 12) 你今日睇唔睇得完呢本書呀？(你今天能不能看完這本書？)
- 13) 佢担唔担得起呢兩桶油呀？(他挑得起這兩桶油嗎？)

在普通話里正反問後半不能共同帶一個可能補語。普通話有“看完看不完”或“听得懂听不懂”這些格式，廣州話不能這樣說。廣州話例11)還可以用另一格式表示，即：

- 14) 佢嘅病啱好，去得唔去得呀？

這種重迭兩個動補結構，中間插否定詞(唔)的格式也是普通話所沒有的。它比較長，囉嗦一些，廣州人一般少用它。

4、可能補語和賓語的詞序跟普通話不同。現在也分肯定式和否定式來談談。

a) 肯定式：動詞後的肯定式可能補語和賓語的詞序要視賓語的詞性而定，如果賓語是代詞的話，賓語一般放在補語前頭，即插在“得”字和補語之間。如：

- 15) 你睇得佢過？(你睇得過他？)
- 16) 我一定食得佢嚟。(我一定吃得完它。)

如果賓語是名詞，它就放在可能補語的後面。這點跟普通話相同。如：

- 17) 你一定跳得過呢條坑渠。(你一定跳得過這條小溝。)
- 18) 佢飲得嚟呢杯酒。(他喝得完這杯酒。)

b) 否定式：廣州話代詞賓語一般放在否定的可能補語之前。但也可以放在可能補語之後。如：

19)你打佢唔过嘅。(你打不过他。)

20)你考佢唔过。(你考不过他。)

(以上賓語在否定的補語之前)

21)我打唔过佢。(我打不过他。)

(賓語在否定的補語之后)

普通話代詞賓語一般放在可能補語(肯定式或否定式的)之后,但也可以放在可能補語的前面。像魯迅的作品就有跟廣州話相同的下面的說法。如:

22)老头子眼看着他。豈能瞞得我过。(形式上是肯定式)

23)我不信你这么大的力气,真会拗他不过。(否定式)①

### 数量補語和賓語

廣州話如果動詞后同时有代詞賓語和数量補語的話,則代詞賓語可以放在数量補語的后面,也可以放在数量補語的前面。如:(下面有·的是賓語)

1)我 叫 咗三次你,你都有听见。(我叫了你三次,你也听不见。)

2)你鬧过两次佢。(你罵过他两次。)

3)我睇咗佢一次。(我看了他一次。)

在普通話里,代詞賓語必須放在数量補語之前,即跟廣州話上例3相同,不能有廣州話的例1、2的格式。

廣州話賓語如果是名詞,还要看是什么名詞。如果是指人的專名或稱謂名詞,則它的詞序跟代詞賓語相同,即可以放在数量補語的前面或后面。如果賓語是普通名詞,則它只能放在数量補語之后,后一点跟普通話相同。如:

4)佢睇咗李民两次。(他看了李民两次。)

5)党委表揚我姐姐三次。(党委表揚我姐姐三次。)

6)佢今年住过三次医院。(他今年住过三次医院。)

7)張三貼咗五張大字报。(張三昨天貼过五張大字报。)

例4的“李民”是專名,例5的“姐姐”是稱謂名詞,都放在数量補語的前面,也都常常放在数量補語的后面。例6、7的“医院、大字报”这些普通名詞賓語,就只能放在数量補語之后。这些跟普通話没什么不同。

### 程度補語和賓語

廣州話程度補語的“得”字和補語之間可以插進賓語。如:

佢食得肥猪肉多,所以肚痛。

这里“肥猪肉”是賓語,插在“得”和“多”之間。這句話用普通話翻譯應該是:“他吃肥猪肉吃得多,所以拉肚子。”普通話“吃得”的動詞(吃)和程度補語(多)之間不能插賓語。再如:

佢行得黑路多,終為撞緊鬼。(他黑夜走路走得

多,終會碰上鬼——比喻多做坏事,必定有不好的結果。)

### 双賓語

廣州話動詞后双賓語的詞序跟普通話有異有同,視動詞的性質和意義的要求而定。从前很多人指出廣州話直接賓語(一般指物)放在間接賓語(一般指人)之前。这种說法是片面的。③

1.在“畀、送、問、擰”等動詞后面,則直接賓語通常擺在間接賓語的前面,普通話則剛相反。如:

1)佢畀三部書我。(他給我三本書。)(字下有一的是間接賓語,有~的是間接賓語。下同。)

2)你送枝筆佢。(你送他一杆筆。)

3)我問句話你。(我問你一句話。)

4)快啲擰杯茶我。(快点兒拿給我茶。)

上例1也可以說成“佢畀我三部書。”廣州人听起来并不覺得别扭。如果直接賓語不帶定語(三部),說成“佢畀我書”,就很不順耳,有的就不成話。

2.在“欠、賺、搶”等動詞后面,則間接賓語放在直接賓語的前面。倒過來就不成話。這點跟普通話相同。如:

5)呢个老板重欠顆記三个月工錢。(这个老板还欠我計三个月工資。)

6)佢前年賺咗合作社五百个工分。(他前年賺了合作社五百个工分。)

7)佢夾硬搶咗我三粒夹心糖。(他硬搶了我三顆夾心糖。)

3.在“借、賒”等動詞后面,則直接賓語和間接賓語的位置可以互為先后。這完全視意義而定,不能隨便擺。如:

甲式:你借五本書我。(你借我五本書。或你借五本書給我。)

乙式:你借我五本書。(你借我五本書。或我借五本書給你。)

甲式和乙式意思不同。從主語看,甲式主語“你”是“借出者”,乙式主語“你”是“借入者”。從双賓語之間的关系看,甲式的書不是“我”所領有;乙式的“書”原來是“我”所領有的。

① 以上兩例引自《中國語文》1953年2月号刊登的《語法講話》。這兩種格式是普通話吸收方言的,是否規範,應進一步研究。現在還沒有人主張不應該吸收這兩種格式。

② 本文都採用漢語課本暫擬語法體系及其術語。這里不採用“近賓語”“遠賓語”這兩個術語,這是因為它在說閩、粵、客家諸方言與普通話双賓語的異同時,很不方便。其實改為間接賓語和直接賓語好得多。

③ 如王力先生在《廣東人怎樣學習普通話》等幾本書中,以及我在已發表的一些文章和書中,也有類似的說法。



# 談 数 理 語 言 学

刘 涌 泉

語言學史上曾經有過語言邏輯化、生物化、心理化、未完成的物理化等時期。現在，已經到了語言數學化時期。

## 一 数理語言学产生的原因

隨着文化(科学技术)的發展，一切事物也都向前發展。語言學當然也不例外。語言學在其發展過程中，由于受当代思潮的影响，与其他部門的接触，以及應用範圍的擴展，曾产生了多种多样的方法和丰富的結果。近年來科学技术的發展，向語言學提出了一系列新問題，要求語言學研究精確化。同时，科学技术的發展也給語言研究精密化提供了条件——这就是各种声学仪器和电子計算机的出現。

古典的語言學主要是跟人打交道，而現代的語言學除了跟人打交道之外，還要跟机器打交道。过去那些对付人的不严格的方法和結果，今天用来对付机器，显然是困难的和不可能的。举例來說，現有的詞典和語法就不能滿足机器翻譯的需要；为了使机器进行翻譯，就应当編出邏輯严格的、形式化的詞典和語法。因此，有必要用一种新的、精确的方法来研究語言。这就是数理語言学产生的原因。

## 二 数理語言学及其意义

数理語言学是語言學的一个新的分支；它的特点是应用数学方法研究語言；它的主要内容是語言統計学(包括概率研究)，机器翻譯(包括媒介語問題)，情报語言(包括論文摘要工作自动化，檢索机內的語言代碼系統的研究)和数理的語言模型研究，等等。

1) 語言統計学——語言統計，这不是一个新問題。語言學家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都或多或少地应用了統計方法。專門的統計研究也不少。<sup>①</sup>但是統計的範圍不够广(有时只限于統計詞的頻率，或語音的頻率)；方法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一般都是手工业式的方法。近年來，結合着教學的需要<sup>②</sup>和技术应用，<sup>③</sup>統計範圍日益扩大，統計对象不仅限于詞、語音，而且也包括了詞組、句子長短及各种語法範疇，等等。同时，还出現了新的統計方法——概率論方法。利用这种方法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从大量的材料中統計出所需的数据来。当然，这些数据只是概率性質的。<sup>④</sup>

2) 机器翻譯(包括媒介語問題)——关于机器翻譯的一般情况和問題，可參看 1958 年 12 月号《中國語文》和 1959 年 5 月出版的《語言學譯丛》第 2 期(机器翻譯問題專輯)，这里就不准备多談了。

这里只想強調指出，机器翻譯是語言學和数学相結合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看出：a) 制定机器翻譯規則系統时，要時刻考虑到程序設計方面的要求，即考慮如何将现实語言变成数学語言的問題。否則，机器将无法辨認，从而也无法进行翻譯。b) 机器翻譯研究工作中出現了一系列新問題，解决这些問題也要借助数学方法。例如，为了照顧机器翻譯中的一項基本原則——“經濟和足够”原則，各种語法範疇和語法形式方面的数据，都是非常必要的。

3) 情报語言——科学技术發展很快，文献資料与日俱增，資料內容也日益复杂，因此要从数以万計的資料中找到所需要的关于某一指定問題的資料，是一天比一天困难了。檢索机的出現解决了一些問題。但最

<sup>①</sup>參看 Pierre Guiraud «Bibliographie Critique de la statistique linguistique»。作者將書目分成为以下十个方面排列：1) (統計)原則和方法，2) 語音，3) 詩律，4) 索引，5) 詞的出現頻率，6) 語義，7) 形态，8) 句法，9) 兒語，10) 語文學和历史文獻學問題。該書收集的材料非常丰富，但还不够完全。例如，有关漢語的統計材料就只提到了两种。一些新的材料也沒有，因它是 1954 年出版的。

<sup>②</sup>教材(这里只就外語教科書來談)編的好坏，这对教學效果很有影响。編輯教材一般应注意結合实际，循序漸進及与教授時間的配合，等等。學生學習外語時間不多(这对非語言學系的學生說，更是如此)，要使他們能在很少時間內初步掌握一門外國語，這是一個很困難的事。因此必須要求教材編者選擇最必需的詞和最必需的語法格式作为教材組成部分，这也就是說，要求他在編教材前作一番調查統計工作。

<sup>③</sup>例如电声方面的应用：1) 解决電訊上的語言清晰度問題；2) 使用消除多余信息的方法，提高電訊線路的通过能力；3) 語音打字机、語音翻譯机和答問机內所要使用的各种数据，等等。

<sup>④</sup>參看华罗庚《大数数学之为用》一文(人民日报 5 月 28 日第 7 版)：“…处理大数現象的数学工具是概率論与数理統計，通过这样的分析便可以看出大势所趋，各种情况出現的比例規律。”

好的办法是应用电子检索机。这种机器效率惊人，如果将化学文摘(Chemical Abstracts)的索引标题化成符号，则三十年的索引可以在十五分钟内检完。<sup>①</sup>但是为这样的机器创制代码系统，即情报语言，这又是数理语言学的任务了。

论文摘要工作自动化问题也是同样：目前论文摘要的工作占去了专家们很多时间，如何想办法让机器代替这些专家劳动，这也是数理语言学的课题(这里指语言分析方面的任务)。

4)数理的语言模型研究——研究如何应用数学方法模拟现实语言以得到一种近似的语言模型。这项研究的目的在于给语言创立严格的形式系统和制定一套精密的语言学概念。苏联数学家库拉吉娜(Кулагина)同志在这方面进行了不少工作，她会利用数学中的集合论来描写语言系统和确定语法概念。<sup>②</sup>

### 三 数理语言学的发展情况

到目前为止，数理语言学可以说还处在形成阶段。它的应用范围仍在逐渐扩大，内容在不断充实，方法在日益完善。上面谈的只不过是当前比较显著的几个方面。

数理语言学越来越引人注意。不仅如此，它已经被列入国际语言学会的日程，成为一些会议和国际会议的专门议题。例如，1957年第八届国际语言学会会议和1956年第四届国际斯拉夫学会上都讨论了有关数理语言学的课题，1959年6月将在巴黎召开的“国际情报会议”也要讨论它。又例如，苏联曾举行过一系列专门会议讨论这方面的课题：1)“关于设计和制造信息机器的会议”(1957年5月)；2)“言语统计学会会议”(1957年10月)；3)“机器翻译会议”(1958年5月)；4)“数理语言学会会议”(1959年4月)，等等。1959

年9月将在美国克利夫兰(Cleveland)召开的“机器语言会议”也要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 四 培养这方面的干部，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为了使科学情报工作自动化(包括翻译资料)，及时供给科学情报，为了满足工业技术方面提出的要求，为了使语言学成为一种半精密科学或精密科学，有必要从现在起，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并着手培养这方面的干部。由于任务的特殊性，干部需兼备语言学和数学两方面的学识，因此，培养干部的问题就更显得重要了。<sup>③</sup>

数理语言学主要是近些年来形成的一门新学科，它在国外正在迅速地发展着。但就我国来说，它还是一个非常薄弱的部门，因此，及时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对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当然也是迫不及待的。

科学发展到今天，大有不使用数学方法就不行的趋势。这个趋势，马克思早预见到了，他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sup>④</sup>

① 参看1959年3月24日《光明日报》第4版，《巧妙的记忆机》。

② Кулагина:《谈谈如何根据集合论确定语法概念》，见《控制论问题(Проблемы кибернетики)》第一辑，1958年莫斯科版。

③ 苏联在这方面已经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详见本刊本期《全苏数理语言学会会议》一文。

④ 见拉法格：《忆马克思》，引自《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版，1957年，73页。

## 南京大学中文系举行校庆科学讨论会

南京大学中文系于5月15日至24日举行了“五·二〇”校庆科学讨论会。会上提出的语言学方面的论文有：《解放十年来文字改革工作的成就》(徐家焯)、《解放十年来音韵学研究的进展》(黄淬伯)、《言语有阶级性吗》(方光蕙、施文涛合作)、《论“二”与“两”》(方光蕙)、《关于现代汉语语法定义的讨论》(周钟灵)、《江苏省、上海市方言的语音特点》(施文涛和江苏省教育厅《江苏方言概况》编写组张喆生、叶祥苓、许夕粘等合作)，以及《评管燮离氏“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论汉语史建立的材料问题》、《论地方戏曲音韵研究的重要性》(侯镜昶)等。

这是该系1958年大跃进以来举行的第一次科学讨论会。会上提出的论文不仅在数量上比过去几次讨论会多，而且内容方面也更为丰富多采，充分体现了“百家争鸣、各抒己见”的精神。

这次参加讨论会的，除了本校有关的师生之外，还有南京师范学院以及其他兄弟单位的同志。最近应邀来校讲学的北京大学岑麒祥教授也出席了讨论会。参加会议的同志对上述各篇论文都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讨论情况很是热烈。(黄景欣)



# 全苏数理語言学會議

1959年4月15日—21日，列宁格勒举行了全苏数理語言学會議。这次會議是由列宁格勒大学和苏联科学院声学委员会語言組所屬的应用語言学委员会联合召开的。参加會議的有四百八十六人，代表六十八个單位。出席會議的除苏联的科学家(語言学家、数学家、工程师等)之外，还有捷克、波兰、羅馬尼亚和我国的科学工作者。會議上听取和討論了五十七个报告。报告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基本問題：

- 1) 数理的語言模型；
- 2) 应用統計学方法研究語言；
- 3) 机器翻譯的媒介語，符号語言和情报語言；
- 4) 如何設計适合語言信息加工的技术裝置和程序。

會議指出，制定描写語言的数学方法有巨大的科学意义和国民經济意义。在語言学中应用精密方法，这对提高有线和无线电路的通过能力，制造自动閱讀和自动记录的裝置，实现自动翻譯和作科技論文摘要，改造信息机器中的信息，用言語控制机器等工作來說，是非常必要的。

为了實現这些重要的任务，必須进行下列工作：

- 1) 对語言的各方面(語音、形态、詞汇等)进行大规模的統計調查工作，以确定基本的統計学特性和計算語言及言語的剩余性和其他信息論参数。
- 2) 通过建立模型的方法近似地描写語言。
- 3) 应用記号学和邏輯語义学研究語言，为有限的語义範圍建立形式化的語言。
- 4) 应用数理邏輯方法(把語言当作运算描写；对现实語言和数理邏輯語言；从形式上描写句法)。
- 5) 編制机器翻譯規則系統：尽快地在机器上进行广泛实验；研究編制翻譯規則系統和媒介語的理論；进一步改进翻譯規則系統的程序設計方法。
- 6) 制定書面語和口語的語言学分析規則系統，以使語言学研究方法精确化。

會議并且指出，为了在語言学中应用数学方法，完成上列各項工作，必須先要根据結構主义方法进行广泛的語言学研究。因为現在只有結構主义語言学可以提供相对精确的語言分析方法，而利用这些方法所得的結果便于进一步进行数学加工。在这方面首先可以列出下面一些語言研究題目：

- 1) 研究音位学模型和它們与語音的对比規律；
- 2) 研究形态学模型和它們与語言的形态單位的对比規律；
- 3) 找出句法結構和它們与现实的語言片段的对比規律；
- 4) 將結構方法灌輸到語义学中去；
- 5) 从类型学上对比各种語言系統及其分类；
- 6) 建立翻譯理論，使其成为一种專門的語言学科目，但这門科目应以結構地和数理地描写語言的方法为基础。

今后如何更好地开展数理語言学研究，这是一个重要問題。會議在这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議：(1) 积极开展使用結構方法的語言研究，使結構語言学的研究成为主要的研究項目之一，成立記号学研究所；(2) 請高教部規定在高等学校开展数理語言学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3) 改建和建立一些机器翻譯實驗室和語音實驗室；(4) 在培养方面：a) 在語言学系中开数学課；b) 在某些高等学校里成立数理語言学专业，在有条件的高等学校里开“机器翻譯”“应用語言学”和“数理語言学”等課程；c) 招收研究生，規定研究生科目；d) 开办短期訓練班，培养师资；e) 出版机器翻譯和結構語言学的教科書；(5) 改目前出版的《机器翻譯和应用語言学》杂志为定期刊物，加速出版會議材料，以促进經驗交流；(6) 加强与外国(首先是人民民主国家)交换科学情报和研究成果的工作。

會議結束之后，还組織了一个小型座談会，交流数理語言学专业教学計劃的制定經驗。\*(白水)

\* 在这次座談会上，参加會議的各高等学校的代表听取了列宁格勒大学(从去年秋季开始，在这个大学設立了数理語言学专业)和莫斯科国立外国語师范学院(准备開設这个专业)拟定数理語言学专业教学計劃的情况。教学計劃的特点是将語言学系原来的課程縮减(主要是大大縮减或完全取消文学課程)，增設数学課。語言方面的課程有：俄語(包括方言、历史等)、語言学概論，普通語音学(包括实验語音学和音位学)、类型学、机器翻譯、数理語言学、外国語，等等。数学方面的課程有：解析几何、高等代数、程序設計、集合論、概率論、信息論、数理邏輯，等等。除了这些課程之外，还有生产实践課(到机器翻譯實驗室和語音實驗室参加一部分工作)。

# 談意義和形式相結合的語法研究原則

徐 思 益

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現代漢語小組（以下簡稱小組）因為要寫一部《現代漢語語法》，最近提出一些問題，要求大家在語法研究上加強協作。<sup>①</sup>我們對“小組”在現代漢語語法研究和編寫上這種走群眾路線的作法，是非常歡迎的；希望全國語言學者，特別是語法研究者，在黨的領導下，以“小組”為中心，團結一致，通力合作，使這部科學的《現代漢語語法》能夠早日寫成。

我因為一向關心語法規範，所以願意響應這個號召，首先來討論一下“小組”所提出的編寫原則，亦即遵守意義和形式相結合的理論問題。

大家都知道，斯大林曾說過，語法是把詞和語加以抽象化，而不管它的具體內容，那末，研究語法是不是只研究它的形式呢？或者進而說，語法學就是一門形式科學呢？關於這個問題，在中國語法學界曾經有人指責：只管結構或形式，不管詞義和內容，將會走向形式主義的道路。因此，闡明語法是不是只研究它的形式這個問題，是非常必要的。

要研究這個問題，必須首先解決形式和內容的相互關係問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說教導我們，一切存在的東西，都有形式和內容，這兩個範疇是處在辯證的統一和相互制約的關係中的。內容總不能離開一定的表現形式，而形式也不能離開內容而獨立存在。雖然起決定作用的是屬於內容，但是天地間沒有無內容的形式，也沒有無形式的內容。在語言本身之中，也存在形式和內容的辯證的統一。加爾基納-非多盧克說：“語言的內容不能作為語言學者的研究對象，因為那就要使語言學者走到研究語言之外的題材了；這就象哲學-邏輯學者不研究思維的內容，他們只研究它的反映着現實現象的形式那樣。在語言中思想的表現手段、形式，即語言形式的研究，才是語言學者的任務。”<sup>②</sup>語法構造也同樣存在着形式和內容的辯證的統一。加爾基納-非多盧克同樣告訴我們：“語言的語法構造也有內容和形式。一切語法意義的總和，或者通常叫做‘語法範疇’，就是語法構造的內容；而語法意義的表現手段的總和，就是語法構造的形式。”<sup>③</sup>因此我們在研究語法的時候，不能把語法構造的形式（語法意義的表現手段）和語法構造的內容（語法意義）混為一談；也不能認為語法形式可以脫離語法意義而獨立存在，或者語法意義可以沒有它的表現手段而獨立存在。

一種語言所以不同於另一種語言，主要在於表現語法意義的語法形式不同。語法的研究，重要的不在於語法意義，而在於用什麼語法形式來表現這種語法意義。並且，語法形式是語法意義的外部表現，是語法意義存在的物質憑借。如果沒有語法形式，即使認為有某種意義存在的話，那就不是語法意義，而是邏輯概念了。可是，中國的一些語法學者，過去從意義或概念範疇出發去區分漢語的詞類，結果以概念範疇代替了語法範疇。這正是沒有認清語法的特点，忽視語法形式所招致的結果。

總之，語法構造是語法意義和語法形式的統一，兩者相互依存的。可是作為研究語法的出發點，應當從語法意義的物質憑借，亦即從語法形式入手。我們只要記着形式和內容的相互關係，不要忘記語法形式是表現語法意義的話（不像外國的某些語法學者純粹為形式而分析形式的話），那末，我們就簡單地說，語法是着重在研究它的表現形式。

但是，語法的表現形式，可能是詞的變化，或者是詞的結合。必須把詞的變化和詞的結合綜合起來，組成語法規則、語法定律，才能建立語法體系。所以斯大林說：“語法（詞形變化法，詞的結合法）是詞的變化規則及詞在句中的結合的規則的綜合。”“語法把詞的變化和詞在句中的結合的基本共同之點綜合起來，并用這些共同之點，組成語法規則、語法定律。”<sup>④</sup>可是，詞的變化和詞的結合在外表上是那樣的不同，而斯大林把它們綜合起來作為語言的語法構造，顯然，它們在實質上是有某種基本共同之點。那末，這些基本共同之點又是什么呢？這就必須進一步說明詞和詞之間的關係。

語言的詞匯，一方面，具有基本語義；另一方面，又具有關係語義。基本語義就是詞的詞匯意義；關係語

① 《中國語文》1959年3月號，142頁。

② 加爾基納-非多盧克（Е. М. Галкина-Федорук）《論語言中的形式和內容》，載《思維和語言》，1957年，莫斯科，355頁。着重號是原有的。

③ 同上，375頁。着重號是原有的。按我們對於“語法範疇”的理解，應當是一個概括意義和它的表現形式的統一。

④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中文本，21-22頁。這裡的引文是參照原文略加改動的。



义就是詞的語法意义。一切作为語言單位的詞，都具有这两个方面的特征。忽視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面，都不能研究詞，也不能研究語法。語法的語法构造——詞的变化和詞的結合——都是同詞的这两个方面的特征密切联系着的。

詞的变化大概可分为詞汇上的变化和語法上的变化两种。詞汇上的变化表现在：或者是音讀的变化，如俄語的(стихотворенье/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е(詩)，лиса/лисаца(狐)，漢語的“哆嗦”(duq-suo)/“嚕嚕”(luosuo)，“哎呀”(aiya)/“哎哟”(aiyao)；或者是次序的变化，例如漢語的“熱鬧”/“鬧熱”，“緩和”/“和緩”，“暢通”/“通暢”。这种变化是在詞汇本身之內，并不涉及詞和詞之間的关系。并且这种变化的外表的区分很少表現意义的差別。这通常叫做詞的(詞汇的)变体。詞在語法上的变化，是取决于一詞和他詞的关系。凡是在具有詞形变化的語言里，詞总是与其他的詞發生了关系才产生变化。可是中国某些語法学者，却認為詞的本身有各种詞形的变化。我們認為这是值得商榷的。如果說，詞的本身的形式变化是指詞的(詞汇的)变体，那与語法研究是无关的；如果說到詞的語法变化，那就必須考虑到詞与詞的关系，不能孤立地說詞本身有各种变化。如果把每一个詞孤立起来，它實質上不可能有任何变化来表示語法意义。

語法构造——無論是詞的变化，抑或是詞的結合——总是把詞和詞的关系，表现在一定的“言語的貫串性”(линейность речи)里，而不是詞的本身能表現某种語法构造。这就是詞的变化和詞的結合的基本共同之点。这种基本共同之点，是作为交际工具的一切語言(無論是所謂屈折語、胶着語或孤立語等等，它們彼此之間有多大的不同)所共同具有的。从語法学的原理出發，研究任何語言的語法都应当从这个基本共同之点着手。

由此可見，我們可以得出兩点結論：1)任何語言的語法形式都是表现在一定的“言語的貫串性”里，語法形式不存在于各个孤立的詞的本身之中；2)語法形式是表現語法意义的，我們研究語法不可把意义和它的表現形式分割开来；但是，也不可把研究語法的出發点放在意义上，再去寻找与意义相照应的表現形式。这就是語法研究所应遵守的基本原則。

上面这个原則，又如何能具体地运用在漢語語法研究方面呢？我們先举例說吧，比如“工人、农民、先生、学生”等詞，前面都能与“一个”結合，后面又都能与“們”結合，这些詞就表現出了“名称”的类的意义。“發展、研究、做、写”等詞，后面都能与“了、着、起来”結合，这些詞就表現出了“动作”的类的意义。“漂亮、干淨、

多、快”等詞，本身能以“迭字的方式”重迭，它們的后面又能与一定的名詞結合，构成規定关系，这就表現出了“性状”的类的意义。再以“小組”提出的从動詞中分出副動詞(介詞)和助動詞(能願動詞)为例，譬如：“(a)發展、研究、看、走，(b)應該、可以、能、敢”等詞，它們共同的特点是：可以用肯定、否定相迭的方式构成選擇問句。如“發展不發展”“應該不應該”等。它們不同的特点是：(a)組詞的后面可以与“了、着、起来”結合，构成動詞体的語法范疇；而(b)組詞却没有这种結合功能。由于(a)、(b)兩組詞的共同特点，就可以把它們归屬動詞这个大类；由于(a)、(b)兩組詞的不同特点，又可以把(b)組詞从動詞这个大类中分出助動詞这个小类来。人們也許會問：(c)“漂亮、干淨、多、快”等詞也可以用肯定、否定相迭的方式构成選擇問句(如：漂亮不漂亮)，为什么不把(c)組詞也归入動詞这个大类呢？問題在于(a)、(b)、(c)这几組詞的共同特点仅仅表現在这里，从此它們之間便开始了严重的差別。助動詞不象形容詞那样，能与名詞結合构成規定关系(請比較：我們可以說“干淨衣服”，不能說“應該衣服”)；也不象動詞那样，能与名詞結合构成支配关系(請比較：我們可以說“發展工业”，不能說“可以工业”)。助動詞与動詞結合，中間不能嵌“de”，助動詞本身不能重迭；形容詞与動詞結合，中間可以嵌“de”，形容詞本身能重迭(請比較：“可以研究”，“應該研究”；“多研究”，“多多地研究”)。所以名为助動詞，因它与動詞結合，是說明“动作”的状况。它与動詞結合，构成合成謂語，就使叙述句型变成状况句型。至于副動詞(介詞)，是否可以作为動詞一个小类呢？由于沒有仔細研究，我們還不敢妄下断語。不过，作为動詞的大类來說(其中包括助動詞，假如也包括副動詞)，它总應該是句子的主要成分或独立作謂語。可是，副動詞(如果同意这个名称的話)，如“对于，至于、向、从”等等似乎不具有这些作用；并且它还不能与動詞直接結合，它的后面总是先与一定的名詞或代詞組成某种結構，再与動詞(或形容詞)結合。如“从学校里回来”，“对于我很好”。

这以上只是一种举例性質，可能很不全面。但是，从这些事例中，我們可以看出：这些詞与詞或詞素与詞素的相互結合关系，是取决于它們的語法基础的。沒有这种語法基础，它們之間就不可能結合，也就不能构成种种語法关系。可見，詞与詞或詞素与詞素相互結合的本身，已經包括了意义。这种意义，当然不是指詞或句子的个别的、具体的意义，而是指一般的意义，如“名称、动作、性状”等类的意义。但是，我們研究語法的出發点，不是先認清“名称、动作、性状”等类的意义，再去寻找这类意义的表現形式。

“小組”研究語法以意义和形式相結合为原則是正

确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使意义和形式相结合，怎样理解形式。譬如，过去在讨论汉语词类区分时，我国有不少学者都主张把意义和形式结合起来，或统一起来，或着重形式，兼顾意义等等拿来作为汉语词类区分的标准；可是，结果都没有使问题得到圆满的解决。究其原因，就是对意义和形式相结合这个原则理解和应用不当。他们一方面，把汉语的“了、着、们、子、兒”等等当作“形式”（大部分人当作“形态”），另一方面，又把这种“形式”和意义半斤八两地对立起来，分别应用。因此他们在具体处理意义和形式相结合这个原则的时候，有的主张，要先认清词的意义，再去寻找这种意义的表现形式。如“走、看”等词有“动作”的意义，就确定它们是动词；然后又说动词的语法特征，后面可以接“了、着”等等。有的认为，形式标志明显的词，可以凭形式标志分类，如“桌子”“花儿”等词，可以凭“子、兒”等形式标志分成名词；形式标志不明显的词，就凭意义分类。这种看法，是把词的某一部分孤立地理解成为“形式”或“形态”了，而且又把这种“形式”和意义分别地、并行地应用了。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既没有正确地理解形式问题，也没有正确地解决意义和形式相结合的问题。现在的的问题是：“小组”打算怎样应用意义和形式相结合这个原则呢？

我们认为，词与词、或者词素与词素相结合的整体构造才是形式。从词与词、或者词素与词素相结合

的功能来看，它就有某种意义潜在其中；从词与词、或者词素与词素相结合的整体构造来看，它又是以某种形式显现出来。这种形式，既包括了意义，又显示了意义的表现手段。可见，词与词、或者词素与词素相结合的整体构造本身，已经使意义和形式结合起来了。这种词与词相互结合的整体构造，方光蕙先生叫做形态。方先生还在1939年讨论文法革新问题的时候就說：“我认为词与词的互相关系，词与词的結合，也不外是一种广义的形态。……我以为语法学是以形态为对象的，是要从形态中发见含义。”<sup>①</sup>方先生这种主张，是从词的全面结合关系着眼，正确地解释了形态问题。不管人们是否同意这种形态（我是同意的，惟恐引起术语的纠缠，本文暂时避用“形态”一词），或者人们把这叫做形式也好，但是，绝不能把孤立的词素当作形式或形态。如果把孤立的“了、着、们、子、兒”等当作“形式”或“形态”，那就是没有认清语法的特点，而且也不能正确地解决意义和形式相结合的问题。而词与词的关系，词与词的結合，又都是表现在“言语的貫串性”里，只有根据“言语貫串性”的原则，才不至于孤立地把词来当作形式或形态。只有根据“言语貫串性”的原则，才能认清词的全面结合关系，才能正确地理解形式或形态，从而才能把意义和形式正确地结合起来。

<sup>①</sup> 方光蕙：《体系与方法》，见《中国文法革新论丛》，中华书局，50页。

## “脱盲”是标新立异的生造词吗，

楊义春

1959年3月13日《光明日报》第二版“读者评报栏”内发表了楊耐思同志写的《編輯工作应注意语言的规范》一文。文章引用很多事实，证明《光明日报》的編者对语言的规范化注意得不够。楊同志的意见绝大部分是中肯的，但是，也有些看法值得商榷。例如，楊同志把“脱盲”“不同程度地”“睡得厚一些”都看做是标新立异、令人费解的生造词语，这就值得考虑。

首先，我认为“脱盲”这个词既不费解，也不是生造，而是语言中新产生的一个词语。理由如下：

语言是发展的，是“约定俗成”的，构成语言的词当然也是发展的，“约定俗成”的。我们研究语言（哪怕是一个词）必须重视语言事实，必须用发展的观点去分析一切错综复杂的语言现象。随着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飞速发展，随着各种新事物、新概念的不断出现，新的词语在大量地产生。大跃进以来，单就文教事业方面說，就有“业中”（业余中学，见《上海工农教育》22页）“农中”“普中”“教改”“双改”“复盲”等新的词语出

现。“脱盲”当然也是大跃进以来新产生的词语之一。

我们只要稍微注意一下语言事实，就能得出“脱盲”的产生是符合上述条件的肯定答案。我们从人民群众的口语中固然能够经常听到“脱盲”这个词，就是在报刊杂志上也是屡见不鲜的。例如《光明日报》1959年2月21日第二版中，就有好几篇报道用了这个词；《上海工农教育》1959年第5期上也有好几篇文章用到了这个词。这就是說，大家都已接受这个词，并且用得相当普遍了。

至于这个词是否费解，我想这更是不成问题的。谁都知道“脱盲”就是刚刚摆脱文盲状态的意思，也就是刚摘去文盲帽子的意思。如果說“脱盲”费解，那么“脱产”（如：“脱产干部”）也该算费解的词语了。同时，我们能說“扫盲”“复盲”，为什么不能說“脱盲”呢？因此，我认为楊同志没有从语言事实出发，更没有从语言的发展事实出发，而是用固定不变的观点研究问题，自然就会得出“脱盲”这个词生硬、费解的结论。



# “語言學引論”課程座談會紀要

本刊編輯部

“語言學引論”課程的改革，在各高等院校語言學課程整改中是比較突出的問題，本刊展開討論以後，陸續收到不少有關這一問題意見的來稿，已發表了一些。根據討論情況看，還有幾個主要問題需要進一步討論。為了求得比較集中的意見，本社於1959年5月28日舉行了“語言學引論”課程座談會。應邀出席的有北京大學高名凱、石安石、賈彥德、陳松岑、徐通鏞（以上教師）、趙世開、叶蜚聲（以上研究生）、周希叔、畢文波（以上同學）；北京師範大學李桐華、黃智顯、史朝亮、劉民芝、（以上教師）、柴春華、鄭月蓉（以上研究生）；中央民族學院馬學良、楊甲榮（以上教師）、卓格圖、王望（以上同學）；河北北京師範學院朱星、郭明玖、常玉中；北京師範學院徐仲華、魯允中；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石明遠，以及外地高等學校在北京大學進修的教師劉叔新（南開大學）、喬魁生（遼寧大學）、李世龍（延邊大學）等二十多人。

座談會由本社章慈社長和本刊常務編輯委員高名凱先生主持。由於各單位對這次座談會很重視，會前大都作了認真的準備，會上發言十分踊躍。

下面是座談會發言的摘要報道。

一 “語言學引論”到底有無開設的必要？哪年級開設合適？講授期是一學期好，還是一年好？

會上無論是代表集體或個人的發言，都一致認為，在高等師範院校、綜合大學中文系，“語言學引論”不僅應該繼續開設，而且應該加強，應該充分發揮“引論”對語言教學、語言研究和語言實踐的指導作用。“語言學引論”是一門黨性很強的馬克思主義語言學基本理論課程，任何企圖取消或削弱這門課程的想法或做法，都是不正確的。

黃智顯、賈彥德、郭明玖都說，過去各校的“語言學引論”課是存在問題的，是有缺點，但是，這只是如何改進的問題，絕不應該成為取消或削弱這門課的理由。魯允中說，北京師範學院在教學改革後“語言學引論”課停開了。但是，他仍然認為停開是不對的。理由是，沒有這門課講授語言學的某些基本問題不好辦；如果“漢語”課加一些“引論”的內容，不僅會打亂“漢語”課的系統，而且有的道理也不容易講得透徹。楊甲榮說，中央民族學院根本不存在要不要這門課的問題。

他們學校不僅語文系有這門課，歷史系也有這門課。

從實際需要看，從學生的反應看，這門課的開設是不容置疑的。她舉了許多事實說明了“引論”在指導實踐中的重大作用：馬克思主義語言學基本理論，語言學一般的基本知識的介紹，黨的民族語文政策的闡述，都得通過這門課來講。民族語文工作中兩條道路的鬥爭，就得運用這門課的理論知識來解決。其他如在民族語言中劃分方言的問題，民族語文教學中語音對應規律的問題，等等，都跟“引論”有關。她認為，雖然中央民族學院的情況跟其他高等院校的具体情况不同，但是，象上述這些涉及到理論方面的問題，大多數應該是共同的。

此外，北京大學中文系一年級同學畢文波、研究生趙世開等都認為，“引論”課的開設很必要。趙世開特別強調外國語學院和綜合大學的外語系都應該有這門課。

關於開設年級，一般認為還是在一年級比較合適。中央民族學院一直在試行“雙軌制”：一個系里同時有一年級開設的，也有二年級開設的；他們認為在一年級或二年級開設各有利弊，他們還是傾向於在一年級開設較好的看法。

講授時間，大多同意一學期講完；但是認為，必須詳細了解同學的接受能力、思想情況，改進教學方法，才能保證教學質量的提高。

二 “語言學引論”應當包括哪些內容，才符合教學改革的精神？

北京師範大學的同志認為，“引論”內容應包括：敘論、語言的本質起源和發展、語音、詞匯、語法、文字、語言的分類方法、黨的語言文字方針政策、語言學簡史。資產階級語言學說結合相應的問題介紹和批判，不另設專章。黨的語言文字政策的理論基礎在有關部分講；政策本身、實施步驟及其意義等，則專列一章講敘。

北京大學的同志大体上跟師範大學同志們的看法一致，他們把“引論”應包括的內容總括為三部分：1) 語言的本質、起源和發展；2) 語音、詞匯、語法、文字；3, 黨的語言政策。因為他們學校開有“語言學史”課，所以“語言學簡史”沒有列入。

河北北京師範學院的同志主張，還應該着重講語言與思維、語言的要素、語言有沒有階級性、語言的落

合等問題。

中央民族學院“引論”課的內容略有不同，“語音”課另外開設，以適應大多數同學要擔任語言調查工作的需要。

朱星和馬學良都認為，這門課基本上應包括上述各校所談的內容，但是各校可以根據培養目標的不同而有所差異。馬學良希望有關方面合力協作，編出一個能夠包括“引論”必需講授的內容的“基本本子”來，然後再按各專業去補充，搞個資料本（如語言研究所有不少漢語方言資料，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所許多語言資料，最好盡量選印出來給“引論”參考）。

### 三 講述中怎樣避免同其他語言課重複？

大家對“重複”的看法做了分析。

多數同志認為，從課程的內容、要求和目的上看，“引論”同別的語言課如“現代漢語”等本不應該有重複的現象。“引論”是講一般語言學的基本知識，是理論性的；“現代漢語”只限於漢語，主要是漢語普通話的內容，不存在什麼重複的問題。比方講語音的音位，“引論”里所講的並不限於漢語的音位，雖然講述時可以引漢語的音位為例，但是漢語的音位現象不一定就能說明“引論”中所應解釋清楚的內容。當然，“引論”主要應結合漢語，解決漢語中某些理論上的問題來講，結合漢語並不排斥引用外國語為例，關鍵在於只要例子能說明問題；同學們即使對有的外國語例句不一定能懂，但是如果漢語例句不能說明問題，那末，只要解說得清楚，同學明白，也絕不是說一定得引用漢語不可。

至於是不是因為同漢語結合才產生重複的呢？有的認為是，有的認為不是。前者認為舉漢語為例，勢必要談到漢語的一些實際現象，談話中必然要用一些語音、詞匯、語法等術語，在解釋這些術語中就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要有些重複。後者認為，講“引論”以漢語的某些現象為例，只是借以闡述“引論”的某些理論，漢語的某些現象只是可以作為例證的許多語言的一種。詞匯、語法也是如此。

史錫堯、李桐華、陳松岑等同志指出，造成“重複”的情況，可能有以下一些原因：

a) 講“漢語”課過多，不恰當地涉及“引論”的內容，或者講“引論”過多地引用了“漢語”課的內容；

b) 兩門課同在一學期開始，因而講“漢語”課時，某些本來是“引論”中的內容就不得不在“漢語”課中先提到，而“引論”課又非講不可；

c) 教“漢語”課和“引論”的教師之間或教研組之間不通聲氣，彼此不了解所講的內容；或者不了解應該在哪些內容上注意適當地分工。

因此，大家提出了以下一些建議：

a) “引論”只講一般語言學的基本知識，不系統地講具體的某一種語言；

b) 先講“引論”後講“漢語”，避免同時並進；

c) 還須進一步深入研究應如何聯繫漢語實際；

d) 有關課程的教師或教學組織應加強聯繫。

### 四 “語言學引論”中究應如何安排黨的語言政策和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觀點問題？

這個問題，大家的看法比較紛歧。

關於黨的語言政策，各校講授的辦法不尽相同，有的是結合在各部分講，有的專設一章，有的是結合一些重大問題來講。在看法上，有的認為具體的方針政策是屬於漢語課的範圍，“引論”只宜講政策中有關語言學的理論部分；有的認為可以在“引論”里講；也有人認為可以貫穿在整個語言課里面。

關於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語言學觀點，大多數認為應該貫穿在內容的各部分，應該加強戰鬥性，但面不宜鋪得太廣，占的時間也不宜過多。這項內容應當指導同學懂得哪些是語言學中兩條道路鬥爭的問題，應該着重批判反馬克思主義的語言學觀點。石安石指出，批判必須有說服力才能收到良好效果，必須避免簡單化的批判方法。

一般說，大家認為中央民族學院把黨的語言政策結合到一些重大問題上來講，是比較好的辦法，也能起到理論指導實踐的作用。一致提議請中央民族學院把經驗通過刊物報道出來。

### 五 教學方法和教學時間的討論。

北京師範大學對教學時間的安排是，講課占全部時間的二分之一，討論、練習、自學的時間共占二分之一，每周六節課。河北北京師範學院的意見是，每周不少於四節課，但討論的時間應占全部學時的四分之一。

時間安排上照顧到多討論這一點，意見比較一致。實際上有的學校，討論時間的比重相當大。同學們也認為，討論中可以充分發表個人意見，可以理解得深透；教師可以通過同學的討論了解講課中哪些是不夠的，哪些應該鞏固、發揚。

北京大學的同學還提出了以下的一些建議：

a) 希望教師對介紹學術上爭論未決的問題時態度明確，各方面的意見都可以讓同學知道，但教師應有一定的看法；不能牽強附會。

b) 希望能適當地增加一些圖表，便於同學對課文內容的理解。

c) 講“引論”，引例可以不以漢語為出發點，但應照顧到。

d) 內容各部分的篇章比例應適當調整，哪些部分



# 语文短评

## 一个通知

因 夢

底下是一个中学的班主任印發給学生家長的信里一段:

X同志:

您好!

自从上学期我校学习跃进大会之后,我們班的学习的确大的跃进,学习成绩由原来属于中下游的班级,期終总分、4分共达91.1%。

本学期开学后絕大多数同学干劲很足,都决心把学习成绩进一步提高,但开学以来我們的成绩还不够理想,每一周有2分;5分,4分只达到80—90%,因此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他們的情绪和信心,甚至影响了干劲。造成这种现象根本原因是由于学习目的不明确,似乎是为分数而奋斗,对学习目的不明确,没能認識要想使学习质量能得到真正提高,必須經常反复不断的复习和巩固。因此产生了忙于平时考試而忽略了对各科的全面照顧,只忙于完成書面而忽略了复习和經常性的系統复习,只注意課前复习而忽视課后及时复习的情况。

除了上述情况之外,尚有部分学生存在驕傲自滿情绪或干劲不足的現象,他們上課还不能專心听講,自習也不能充分利用,甚至存在不求有功(得5分),但求无过(得2分)的思想情绪,这是極有害于提高学习质量的。

看了这封信,总觉得語言的表达方面不很对头,一下子摸不清楚“成绩还不够理想”的原因是什么。仔細分析一下,这段話的毛病大約有下列几点:

1) 測驗学习成绩好坏的标准通常是分数的高低,里也說“自从上学期我校学习大跃进之后”,一直到

發出这个通知之前,班里得分的情况如何如何,那末,就不能怪学生們“为分数而奋斗”。这里所否定的“为分数而奋斗”正是前面所肯定的“同学干劲很足,都决心把学习成绩提高一步”。

2) “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学习目的不明确,似乎是为分数而奋斗。”从这两句話看来,学习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分数,而是另有所指。可是,什么才是“学习的目的”?从前面看,只能是“分数”,这已經是个矛盾;从后面看,在句法关系上和“由于学习目的不明确”平行的是“没能認識…必須經常反复不断的复习和巩固”,这是否就是“学习的目的”呢?也不是,因为从意义上看,这只是学习的方式,方法。說了許多,最关重要的“学习的目的”仍然沒有說到。

3) “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他們的情绪和信心,甚至影响了干劲。”这句話里的“甚至”用得很奇特。“情绪和信心”受到影响,当然就“影响了干劲”。这两个成分在意义上只能起互相說明,互相补充的作用,后者并不比前者更深一層,“甚至”在这里用不上。

上面这些毛病都是关乎邏輯方面的,詞句标点也有許多值得商酌的地方,然而这和邏輯毛病比較起来,在这里倒是次要的,就不仔細去談它了。

我們生活在这么一个“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里,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非常密切,因此每个人都常常要看通知,写通知,各式各样的大大小小的通知。我們却常常碰到一些写得叫人看了不得要领的通知,或者囉囉嗦嗦,重三复四;或者前后矛盾;或者詞句欠通,有許多多思路方面的和語文方面的毛病。因为一般的

多講,哪些可以少講,值得考虑。

教师們对教学方法有这样一些看法:

a) 了解同学的接受能力,思想情况很重要。有的志認為,了解情况后还得依靠党团組織,通过领导核心深入到同学中去,否則工作只是做到了一半。

b) 有的同志認為,講学术上爭論未決的問題,可采用两个标准:一般公認的說法;科学性比較强的。介紹合于这两个标准的,其他不講。

c) 一般不宜講得太深、太多、太繁瑣,比方講語音,有不屬於語言範圍內的,如生理基础、物理基础等宜少講或不講;有参考資料可查的,尽可能少講;加同学学习的主动性。

d) 組織优秀同学搞一些科学活动。

e) 多啓發同学思考。

还有人建議,各高等学校中文系語言学教师应經常有机会交流經驗,互相学习,共同提高,及时改进工作。

最后高名凱先生代表本刊編委会向出席座談会的全体同志致謝。高先生說:这次会开得很好,不仅談得很热烈,而且內容很丰富,也充分發揮了各抒己見、百家爭鳴的精神。大家提出的建議和要求,我們一定尽力去做,需要同有关部門談的,我們也一定轉达。相信这次座談,对全国各高等院校如何教好“語言学引論”这门課程是有帮助的。

通知只在一定范围的集体生活中起作用，不会公布在报刊上，也不会一讀再讀，所以写的人也就容易馬虎，看的人也就輕輕放过。其实通知也是我們社会生活中一項要事，假若馬馬虎虎对付，非但不容易叫人看得懂，而且难免引起誤会，造成損失。怎样把通知写得簡要、准确、条理清楚，也应当是属于我們的文風問題以內的事。

## 談《文艺报》一篇文章的 語言毛病

斯尔鑫

現在有些論說文，洋洋洒洒，篇幅冗長，語言欧化，意义晦澀，讀了一大段，还不知道作者論点在哪里，讀了两三遍，还看不出中心思想来，真使讀者大伤脑筋，徒耗精力和时间。刊載在1958年第23期《文艺报》上的《关于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結合》一文，就有这个毛病。文章內容是否正确，这里不研究，光从語言角度来看，缺点是相当多的。請看下面的一些例子。

### 一、属于語言重复和煩冗的：

1) 这样的时代特点，对于文学就有了新的需要，那就是一方面，必須充分反映出这个现实的真实，另一方面，必須不仅是以社会主义精神，而必須进一步用共产主义精神鼓舞、教育人民向共产主义迈进。(15頁)

一个句子連用三个“必須”，其中第三个“必須”完全是多余的。因为第一、第二个“必須”还可以說是并列結構，而第二个“必須”的后面是一个用“不仅”和“而”互相呼应的进層复句，既然在“不仅”的前面用了“必須”，那么“而”的前面就不必再用“必須”了。可以改为“必須不仅是以……，而且进一步用……”。

2) 其次……用文学艺术来促进人們向共产主义前进。(16頁)

“促进……前进”，两个“进”的詞义重复，可以把“促进”改为“促使”。

3) 第一，就思想方法說，两者都奠基在现实基础上。(16頁)

“奠基”是“奠定基础”的意思，跟后面的“基础”意义重复，倒不如說成“两者都以现实为基础”。

4) 但是無論如何，历来的古人，誰也沒有如今的人民偉大。(16頁)

“历来”是“从来”的意思，凡是“古人”，都是“历来”的，不会是“将来”的，拟改“历来的古人”为“历代古人”。

5) 我們目前在为建設社会主义而苦战，这是艰苦的。

(17頁)

前面既說是“苦战”，后面又何必重复說“这是艰苦的”！

6) 他不再进一步去刻划这现实中的人的具体方面……。(16頁)

在一个分句里連用三个“的”字，讀起来煩冗，如改为“他不再进一步去刻划现实人物的具体方面”，以省掉两个“的”。

### 二、属于意义晦澀的：

7) 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結合，吸收了现实主义、积极浪漫主义的哪些优点呢？这二者共同的特点，那就是：……(16頁)

前面說到了四种主义，因而使“这二者”的指代不明。

8) 武松、張飞等結合得較好，但結局仍是缺乏連貫。(17頁)

“武松、張飞”，在原文中是突如其來的，令人容怀疑怎么“武松”会和“張飞”結合得較好呢。意义晦澀，其中有漏說的話。

### 三、属于用詞不当的：

9) 从而，要从将来的眼光(也就是共产主义的高度)看目前的现实。(16頁)

沒有“从将来的眼光”这种說法，“从”应改为“用”。当然，一篇文章主要的是思想內容，但由于語言組織得不严密，势必削弱思想內容的表达。希望作者重視。

## 用詞的分寸之間 秋甫

1959年5月25日《光明日报》有这样两个标题：a)“班禪向毛主席等辞行”，b)“杜勒斯病逝”。同一的《人民日报》也有报道內容相同的两个标题：c)“班禪向党和国家领导人辞行”，d)“杜勒斯病死”。

这四个标题放在一起相較，a)里用的“等”字和里用的“逝”字是值得斟酌的。

“等”字的范围可大可小，不仅不能确切概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含义，而且可能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外的人。因此，可以說“等”字用得不够准确。

“逝”字也是“死”的意思。但是，習慣上一般对較亲近、崇敬的人，大都諱言“死”，一直沿用了这个文言遺留下来的“逝”字。这个“逝”字也就或多或少些追念、伤悼的感情色彩。杜勒斯是帝国主义的号战争狂人，一貫同中国人民为敌。象这样一个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死敌，病死了也少作些孽。报道的死用“逝”字，这就不單純是不“准确”的問題，而說明我們的观点意識还不够鮮明。



# 书刊评论

《语文短評选輯》 中国語文編輯部輯，中華書局出版，1959年4月，25开，115頁，定价0.46元。

《中国語文》編輯部为满足讀者的要求，从該刊1956年8月号到1958年6月号已發表过的“語文短評”和《語文知識》的“不規範的詞和句子”里选輯一些材料編成單行本，作为中国語文叢書之一出版。这本书的輯印的确是有意義的。

这本书的“前言”里說，在編选过程中曾花过相当多的工夫，把有些不必作为問題的、重复的、特别是得不恰当的都加以删除；这样，就使所評的語文問題为突出，使讀者一看就可以知道哪些問題是應該注意的。第一部分归纳出十六类，可以說都是人們运用文字时最常見最易疏忽的現象，这不止是語法上的問題，还牵涉到邏輯、修辭問題，比如“結構混亂”、“話有說清楚”、“事理不通”等項所指的。第二部分选輯三十四条，主要是虛詞的使用問題，这部分最关乎汉语规范化工作。我們常常会碰到这类問題，即某个虛詞究竟在什么情况下使用最恰当。这部分所选輯的虽不能概括有关虛詞用法的所有現象，可是在这个問題上也足可給我們不少帮助。

一句话，一段話應該怎么說法，怎么用詞，怎么搭，不能沒有个規範，問題在于这个規範的标准。这就既要达意，又要从众。本書在归纳各种病句的現象，告訴我們这个道理，这就是对語文教学工作者和語文學習者的帮助。不过，語言的运用不是用几条現成法則能够說清楚的，在用詞和造句时，不單要注意語法和詞义，还要注意邏輯关系和修辭手法以至篇章結構，等等，何况还牵涉到个人語言風格問題。所以學習語言非下苦工不可”。要是對这本小書提出这样全面要求，它当然是办不到的。从这本《选輯》所評的来看，自然也有評得不恰当的。比如說：“調動”不能配賓語“積極性”，一定要用“積極因素”(27頁)；把人們所陌生的“認”为不通，認为“为”后面一定要和詞連用(99頁)；等等。这些說法都还可以商討。

語言的發展都說是突出表現于詞汇上，其实，語法不是發展得那么迟緩，只要稍稍留心这些年的書面語的变化，便不难碰到許多这样的情况：从前不能这样說的，現在能够这样說了；某个詞不能这样用的，现在有人这样用了；某个詞的詞类轉變了；等等。面对这种情况，我們能不能就說不必學習規範的用法呢？当然不能。學習語言是沒有止境的，無論怎么說，已有

修養的名家都免不了出病句，何況是初學。

这本小書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由于編者把从群众中来的評者許多例子归纳起来，成为集体的意見，不是一个人的看法，这也就是它能体现出“从众”的規範意义所在。(劳宁)

《常用詞語例解》 燕天展編著，中華書局出版，1959年5月，25开，176頁，定价0.65元。

我們看到語文學習杂志社編輯的《詞义辨析》第一輯出版以后，除了感到它对語文工作者和學習者有很大的帮助以外，还覺得它在将来編纂較完备的同义詞詞典的工作上作出了一定的貢獻。現在我們又看到中華書局出版了《常用詞語例解》，从如飢如渴的語文學習者的要求上說，这类語文參考書的相繼出版，确是值得我們欢迎的。

这部書同《詞义辨析》大体上性質相同，所选的370条詞語都是中学語文課本里常見的，其中一部分属于同义詞的用法。每条詞語先提出示范的例句，再举出比較典型的用詞錯誤的例句，然后加以解釋。全部詞条按拼音方案音序排列，大多数示范例句都是从典范文献中摘录下来的。这部書的材料安排显然是近于辞書的形式，从“前言”里看，可知編著者原就有編这样的詞典的企圖。因此，我們也可以說，这部《例解》实际上也为辞典編纂，特别是同义詞詞典的編纂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編著者在“注釋”里特別注意到詞的語义色彩，說明哪个詞用于褒义，哪个詞用于貶义。这对學習者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可是对詞的褒貶色彩的体会最容易發生爭論。最近我們常常看到《中国語文》上有人提出这个問題，認为目前詞語用法發展变化很快，同一詞語随着客觀事物的变化而在語义上起了变化的情况是屡見不鮮的。对待語义發展变化的現象和用例，不能一概拿固有的規範苛求。如果从这一点来看《例解》里的注釋，那就有很可以推敲的地方了。

詞义的解釋和如何示例，在技巧和原則上本都有一定的理論指導；怎样能恰如其分地概括詞义，怎样提示合乎运用分寸的例句，决不是單憑个人的体会所能作到的。特别是用例，因为它可以帮助讀者对詞义理解得深透，所以必須考虑到上下文。这部書里摘引的例句有的就忽略了这一点，沒有上下文，有时很不易完全襯托出所指詞的意义。所謂上下文，或者說文脉，对

某一詞的用法有絕對的規定性；這既要看“句法性上下文”，又要看“語義性上下文”，必須兩者結合起來琢磨，那才能看出一個詞怎樣算是用得恰到好處。

這部書的示范例句還有一個值得考慮的地方，就是因為有一部分是從報刊上摘下來的，其中用詞並不見得是規範的，這就難免減低了它對學習者的指導性。至於所舉“典型”的錯誤例句有些顯然是編著者有意編造出來的，我們認為不如也都找出實在有過的例子，注上出處，那就指導性更強了。可是這步工夫編著者沒有作到，希望再版時能有所修訂。（勞寧）

《潮州方言》，李永明著，中華書局出版，1959年4月，25開，285頁，定價，1.40元。

解放以來，還不曾見到過象《潮州方言》這樣的對某一地點方言作全面描寫的著作。本書的著者是從大學剛畢業的青年。這本新書的出版，正如著者自己所說，完全“體現着黨對科學工作的重視和對青年的培養與關懷”，所以我們願及時地把它推薦給語文工作者。

這本書所描寫的潮州話是以潮安縣城的話為標準的。著者在本書一開頭就有了明白的交代，他說：“潮州市（潮安縣城）舊為潮州府所在地，潮州人也一向公

認府城話為標準的潮州話”。按潮州話在漢語諸方中是比較特殊的一支，是流行於廣東省潮汕地區的一種方言，屬於閩方言中的閩南系。過去的方言工作多只着重在它的語音描寫，很少注意到它的詞匯、語法方面。1956年全國展開方言普查工作以後，著者結合這一任務並為推廣普通話工作有所貢獻，便在調查中積累了關於潮州方言的各方面調查研究材料，寫成本書。全書分五章：第一章緒論，第二章講語音，第三章介紹潮州本地字，第四章講詞匯，第五章講語法。

本書雖然在語音方面的描寫占去大半篇幅，可詞匯、語法方面的材料也相當豐富，並且列舉了故鄉傳說、民歌、民謠、民諺、謎語、對話各種形式的口語材料，作為附錄，分別加以注音；特別是在第四章講詞匯部分，收錄一千多條詞語，按詞義分為二十二類，分拿普通話加以對比，這對外地人了解潮州話和潮汕區人學習普通話都有很大幫助。

本書不僅全面地描寫了潮州話，而且對於材料處理方法也比較符合當前方言工作的新方向。這就它在語音的描寫中只同目前普通話作比較，而不籠罩過去繁瑣的古今音比較，當然，這樣平面的描寫並等於否認了歷史比較的价值。（倪寄予）

## 《格西曲札藏文辭典》評介

格西曲札著，法尊、張克強等譯，中央民族出版社，1957年12月出版，8開本，971頁，布面道林紙12元，布面報紙10元，布脊報紙8元。

格丹札巴

格西曲札（Dbe-b'ses chos-grags）原著的這部《藏文辭典》（Brda-dag miñ-tshig gsal-ba）漢藏對照本，收詞二萬六千多條，連同藏漢文注釋，全書將近五十萬字，這是目前國內出版的第一部較為大型的藏文辭書。

這部辭曲的原著者曲吉札巴（Chos-kyi grags-pa，舊稱曲札）生于布利雅特蒙古地區。十八歲到拉薩色拉寺學法，曾獲“格西”學位。解放以後，被政府聘任為西藏軍區編審委員會委員。他現已六十二歲，除了這部辭典以外，還在繼續編寫一些藏文教材等讀物。這部辭典編成於1946年，1949年始刻成木版，初次在拉薩印行；但是因為當時印刷質量低劣，定價昂貴，又只有一種文字（藏文）注解，所以購讀者有限。解放以後，黨和人民政府關懷少數民族學術文化的發展，除了

成立專門機構從事編輯翻譯並大量印行少數民族語言書刊、畫報和工具書以外，在藏文辭書方面，還選擇這部藏文辭典，重新加以整理，並將全部藏文詞目和解譯成漢文鉛印出來，這不僅對於廣大的藏、漢族讀者及民族語文工作者有了極大的幫助，並且對於民族文化的交流發展和漢藏民族的團結，也會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這部辭典曾得到許多讀者的好評，總起來說，一認為有下列一些優點：

（1）每個詞後都有藏漢兩種文字的注解，不論藏人和漢族都可以使用，同時由於有原文注解，更容易使讀者了解本詞的原意。

（2）詞典的編輯方法採取了現代辭書的形式，全按藏文拼音次序排列，每個詞目都另起行，眉目分明。



便于检查，较过去传统的藏文辞书编辑法大大前进了一步。传统的编法都写成偈颂体，只便于小量的词的记诵，不便于检查。

(3)选词范围广，内容比较丰富。全书二万六千多词，包括了西藏的日常生活用语、文学语言、词典典故和一些常见佛学术语，对研究现代藏语或藏文古典文学、哲学及佛学作品等来说，这是一部比较完备的工具书。

(4)译语比较通俗确切。除了一些佛学名词沿用了过去传统的译法，似乎无法更通俗化以外，其余都采用了口语译词。这当然是同译者法尊法师(中国佛学院副院长)和张克强(建木)先生对藏、汉语文和佛学造诣很有关系的。

(5)译本对原著的注释方面作了一些补充修订。原著的藏文注解有的过于简略，有少数词后缺少注解，或者个别词的注释有时不恰当，或者因原版校勘不精而有显然的错误。译者在翻译和整理过程中，一般都引用达氏(Das)等藏文辞典的注解在汉文中作了补充；另外还对已发现的错误作了修订，这就把原著的质

量提高了一步。

(6)汉文译语还一律采用了国务院公布的简化字，对藏族学习汉文也比较便利。

在肯定这些优点的同时，我们还不能不指出这部辞典存在的这样一些缺点：

(1)限于著作年代，没有收进新词术语。

(2)如上所说，有的藏文注解过于简略，有些同义词或近义词，原著者简单地用了一个注解，未加详细的分析。还发现有些动词的时态变化上前后有矛盾；对有些异体字的处理也是兼收并蓄，没有肯定哪一个对，似乎原著者对这些分歧没有自己的主见；因此也造成了一些词的形态上的混乱。

(3)原著所收词汇都未注明出处和材料来源，因之，读者一遇到缺漏原注的词，便无从查考。

总之，这部藏文辞书，在目前还是一个较为完备的藏文辞典，至于新词术语，在解放后发展极快且多，民族出版社已在专门编辑中，不久就可以同读者见面；其他缺点，也可望在再版或重新编辑更加完备的藏文辞典时补足。

## 读《汉语讲义》后的几点意见

陈克农

编者按：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集体编写的《汉语讲义》出版以后，本刊陆续收到一些评介该书的文章。1959年4月号本刊已发表过一篇，为了便使用这本讲义的人多所参考，这里再转载一篇，同时还在本期发表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史锡堯同志关于该系语言教研组最近讨论处理这门课的通讯。

我们教研组(四川南充师范学院语文系)的几位同志，读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集体编写的《汉语讲义(初稿)》(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958年)以后，都感到它的内容确实有很多值得欢迎的改革。它做到了在“前言”中所说的，要体现党在文字改革方面的方针政策，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和厚今薄古的精神；对材料的组织和问题的阐述，都力求简要，避免繁琐，尽量做到既有系统又有重点。这些显著的优点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可以肯定，这本讲义代表了目前语言教学的一种正确方向。

现在只把我们认为还须进一步讨论的一些具体问题谈一谈。

一、理论和实际 对师范大学学生的培养，固然要照顾到他们将来要担任中学的语文教师，但同时也要注意他们还需要向科学进军。本书编者认为许多

材料对中学教师用处不大，于是“大力削减”，他们说：“这样就可以避免脱离实际”(见“前言”)。这种说法，如果没有问题，那末，中文系的学生将来到中学决不会作外语教师，是否就可以不学外语呢？学校开设了这一学科是否就是脱离实际呢？资产阶级的语言学家也讲“实用”，所以有“实用语音学”和“实用语法学”的建立；但他们的“实用”正是从理论脱离实际这一思想基础出发。他们把“实用语音学”“实用语法学”同“理论语音学”“理论语法学”对立起来，显然是十分错误的。编者由于只考虑到对中学教师有没有用处，因而把许多问题——涉及到一些理论的问题，如语法部分谓语和主语的关系，谓语和宾语的关系等都一概“削减”了。本书对过去教材中的繁琐作了一些精简，这是对的，但在提高质量方面就作得不够。这里的关键在于我们应该怎样理解理论和实际的辩证关系。

二、避免重复 把“现代汉语”“古汉语”“语言学概论”合并为“汉语讲义”，以避免三者之间的重复，编者在这方面的努力是有收获的；不过，也有两点值得考虑：

第一，有些语言学知识——也可说是基本理论知识，是高等师范学校应该讲授的，如语音中的音变问题、音位问题，词汇中的词和概念的问题、词义和语音的问题，语法中的语法体系问题、语法范畴和语法形式问题。这不是一些没有实用价值的理论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学者和资产阶级语言学者在语言学各部门中具体表现出的是非问题。本书在“语言学基本理论知识”中不讲这些，在汉语各部门中也不讲这些。从前在这两处都讲固然是重复，可是现在两处都不讲，就不是避免而是取消，这就需要考虑了。至于放在哪里讲好，“语言学基本理论知识”单开一科好还是合并到汉语中好，这些问题，我们准备在这里提出意见。

第二，在组织材料方面，本书对旧教材作了一些变动。有些变动，我们很同意，如：把介词“把、被”，助词“的、地、得、啊、吧、吗、呢”等都结合在句法中讲，不放在词法中讲，这对教与学都有很多方便。但有些变动，又造成了重复，如：在讲词组时讲了“同位结构”，讲句子的“复说”时又要讲；在讲词汇时讲了“成语”，讲词组时又拿它作为固定词组来讲；在词法中讲了副词的六类，讲句子成分后附副词的用法仍然是六种，实际上六类就是根据这六种用法而分的。类似这样的重复，我们认为不是不能避免的。编者一方面避免重复，一方面又造成重复，或许也是始料所不及的（“成语”作为汉语词汇构成的一种来源是比较适宜些，编者把它放在词汇第三章词义中讲，不知用意何在）。

三、修辞的地位 全国已有一部分高等学校不把修辞分开作为语言学的一个部门，而把它结合在词汇、语法中讲授，这样做的结果怎样，还没有介绍经验的报导。我们并非有意为修辞争一个什么地位，我们只不过要求考虑：到底怎样结合？能够结合多少？就本书来看，结合是有问题的。如：把比喻放在讲表语时讲，把对偶、排比、重复分别放在讲对立复句、并列复句时讲，已经有点勉强，似乎是为结合而结合；而且，就是这样结合也还有限得很，不能不在第九章专讲其他几种辞格（计十一种）；修辞应涉及的，除了辞格以外，还有篇章结构和文风一系列的问题，于是又再写第十章专讲篇章结构和文风。这样一来，结合的少，不结合的多，那末，把修辞作为语言学的一个部门——与语言学中其他部门有关系而又有区别的一个部门，我们认为还是有它的必要性。

四、次序的安排 双部句是基本句型，单部句是

对双部句而言的，必须在双部句的基础上讲单部句。双部句是一般的句子结构，单部句同倒装句、省略句一样，是一种特殊的句子结构。本书先讲单部句，后讲双部句，或许是因为结构简单；我们则认为正因为结构简单才不同于一般句型，因而需要一定的条件才能成立。这不只是一个次序问题，也是一个体系问题。

“划分词类的标准”，本书把它放在句法中来讲，在词类早已划分之后再谈划分词类的标准问题，有点近乎马后炮；在讲述句法中忽然又回到划分词类的标准问题，又有点夹杂不清。编者似乎也知道这样做不大好，所以把它作为附页放在句子成分的后面。事实上在未讲词的分类以前，不能不涉及到怎样分类这一问题。编者也会在词法开始时就说：“词的分类，也是词法里要研究的问题之一，这种分类是把大批的词拿来按照语法特点和意义来分类……”（202页）。这里就把划分词类的标准提出来了。下面又说：“譬如我们‘人民’是个名词，它可以作主语，可以和形容词、数量词等等相结合，但是它的前边不能跟副词，不能跟‘很人民’‘不人民’等，所以说这些语法特点是通过词类的功能和特征反映出来的”（202页）。这是语法特点之一，也是划分词类的标准之一，其他两个标准——意义和形态，也在这节前面有所说明。我们觉得只要在这里多讲几句，后面的附页就可以不要。还有，词的分类问题是一般性的，词的跨类、转类问题是比较特殊的。编者结合跨类、转类来讲划分词类的标准，好像不是为了划分词类而讲划分词类的标准，倒是为了讲跨类、转类才讲划分词类的标准。我们有这种感觉，当然不一定就是编者的用意。

五、界限怎样划 一词多义和词义演变有联系又有区别，本书把它们分开来讲而又把它们当成一个东西。说明多义现象产生的原因是：“由于历史的演变，历史的发展，汉语的词义也随着事物的发展而演变。这样一个词就不可能在任何历史时期中，都绝对地只有一个意义。同时，经过演变，有的词旧义仍未消失，而新义又产生了，新旧义并存，与引申义同用，就产生了一词多义的现象”（157页）。如果在这段话末尾再添上一句“有的词旧义逐渐消失，新义就成为它的主要意义”，用来说明词义演变的原因，倒很恰当。至于多义现象产生的原因，我们认为刘镜芙先生的说法比较正确。他说：“词的多义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人们用词来标志客观事物和现象。但与客观现实无止境的多变性比较起来，语言（包括词）毕竟还是一个有限的系统。用有限的系统去表示无止境的客观现实，就必然会产生词的多义现象。从另外一个方面看，词的声音和词的意义之间并没有必然的有机的联系，因此可以用同一声音去称呼有联系但又不相同的事物，从



而产生了同一語音形式下詞的轉义”。①一句話，一詞多义是从橫的方面看，詞义演变是从縱的方面看，必須把它們的界限划清（划清界限不等于它們不發生关系）。編者混淆了这一界限，于是多义詞的“詞义引申”和詞义演变的“詞义扩大”就沒有区别，而“航行”“运动”“进军”“迷信”等詞有了几个意义就都算作詞义的扩大(193頁)，这是值得考虑的。我們認為孙良明先生的《詞的多义性跟詞义演变的关系和区别》一文，②对这一点还有一些参考价值。

在語法部分也有些界限不明的地方。如：能願動詞作謂語，举例是“織女会織布”，“同學們应该互相帮助”等，都属于合成謂語，而这种合成謂語与能願動詞作謂語是不是沒有分別或不須分別，編者沒有交待。如編者不認為这是合成謂語，而以“織布”为“会”的宾語，“互相帮助”为“应该”的宾語，也可以，但編者又采用了合成謂語这一說法(223頁)，于是体系就有点混乱。

又如：講介詞結構时，認為用“把”組成的介詞結構，同其他介詞結構一样，是用来修飾動詞的，举例“把書拿走”，以“把書”为状語(225頁)。在講宾語提前时，說“把”是表示前置宾語的特殊介詞(235頁)。“你把功課又溫習了一遍”(原例)，這句話中的“把各門功課”应该算作介詞結構作状語呢，还是“各門功課”是動詞“溫習”的宾語？前后对証，就会使讀者感到无所适从。

再如：助詞只分两类，不列时态助詞一类，当然是不將“着、了、过”等作助詞看，只作为構詞的輔助成分，就是說，它們都是虛詞素。这样处理也不无道理。在講“動詞的变化”时又說：“加‘着、了、过’等。動詞加上这些时态助詞表示一些附加意义”(206頁)。这混淆了詞和詞素的界限。原来編者早在詞汇第一章講詞素时就这样說了：“虛詞就都是虛詞素。比如‘我’和‘你’的‘和’，‘从哪里来’的‘从’，‘桌子、石头、老虎’等詞里的‘子、头、老’等等，都是起語法作用、意义微空虛的虛詞素”(146頁)；但在語法中又把“他从哪里来”里的“从”作为介詞举例(216頁)，把“工人和农民”里的“和”作为連詞举例(217頁)。既然定为介詞和連詞，当然“从”和“和”都是詞而不是詞素了。虛詞尽管意义空虛，畢竟是詞，怎么能和虛詞素等同起見呢？

① 《語言學論丛》第二輯，新知識出版社，102頁。

② 《中國語文》1958年5月号。

除了上面談的一些問題以外，还有一些关系不大但我們認為是可以考虑的地方。比如：

1) 248頁“詞性的誤用”，以“右派分子想复辟資本主义”为例，認為“复辟”是自動詞不应用作他動詞。其实，刘少奇主席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工作报告中就这样用过：“至于以破坏社会主义、复辟資本主义为目的的人們的言論行动，我們从来没有給以合法存在的权利，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所不許可的……”可見“复辟”是可以作他動詞用的。

2) 191頁談到新詞的产生时，認為“馬列主义、共产党、紅軍、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解放、阶级、地主、斗争、批評、合作社、总路綫等等”，都是开国以后为了反映这时代的变化而产生的新詞，可是这些詞开国以前早就有了。即如編者最后举的“总路綫”那個詞，在三十年以前(1928)中共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決議案”中就用过了，“政治決議案”的第四項是：“革命运动的現時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綫”。

总之，这本《講义》由于編写時間短促，审訂工作必然就作得不够，草率之处在所难免。可是仅就南充这样一个中等城市而言，这本《講义》到后一两天就卖光了，可見这本《講义》的影响是不小的。这反映出語言學習者迫切希望教材革新的心理，同时也說明了大家又是怎样殷殷期望于北京师范大学語言教研組的同志們。我們相信編者为了满足大家的需要，为了促进語言教学的改革，在本書再版时，一定会通过充分討論而加以仔細审訂的。

勘誤表

月号	面	栏	行	誤	正
2	64	左	9	它可以們	他們
2	65	右	倒10	讀过注音	讀注音
3	128	左	15	只,条	只
3	128	左	18	只,个	个
3	128	左	19	(未了的)个	只
3	128	左	20	只	个
3	129	左	23	ka	kwa
3	129	右	25	也不表示	有些也不表示
3	135	左	6		“革”移第八行首

##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語言教研組工作簡况

去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語言教学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在这一改革的基础上师生合作制訂了新的教学大綱，把“現代漢語”“古代漢語”“語言学概論”合并成一門“漢語”課；同时苦战了一个多月写出了《漢語講義》。这本《講義》现在看来是比较粗糙的。

經過了一学期来的教学实践和教研組同志們的反复考虑，大家越来越感觉到虽然教学改革的成績是巨大的，但是有許多具体問題还是处理得不够妥当。

首先，把上述三門課合并成一門課当时是为了避免課程內容上的某些重复，并使三門課組成一个有机整体：先講“現代漢語”，后講“古代漢語”；最后講“語言学概論”作为整个“漢語”課的总结。现在看来，三門課之間的重复問題，并不是只有合并才能够解决。目前“漢語”課的三部分也沒有能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仍然是各自独立的三部分。“現代漢語”和“古代漢語”若不是講成“漢語史”或“古、今漢語比較”的話，是不可能揉在一起的。由“語言学概論”变成的“語言学基本理論知識”事实上也起不了总结“現代漢語”“古代漢語”的作用。因此，以前考虑的三門課合并的积极理由事实上是不存在的；相反，三門課合并却帶來了一些消极的东西——內容大大压缩并使某些部分不够完整、不够系統，对“古代漢語”“語言学概論”課的处理情况就正是这样。

“古代漢語”課的內容的安排問題，当时大家对党提出的反对“厚古薄今”，提倡“厚今薄古”这一口号的精神認識，体会不够，把这門課的內容削減得太厉害了。以前“古代漢語”課存在的厚古薄今、脱离实际的問題是需要深入檢查和大力改进的，但是解决問題的办法不能是簡單地大刀闊斧地砍削。“古代漢語”的詞汇不講授，語法也不作系統講授而只講十几个虛詞和实詞的兼类等問題，显然是很不够的。

“語言学概論”課以前講的也比较琐碎、脱离漢語实际。当时曾經考虑到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将来做中学教师，有很多东西可能用不上，所以教学改革后只保留了語言的本質、起源、發展等几个基本問題，并改名为“語言学基本理論知識”。实际上就这等于取消了“語言学概論”。現在回顧一下，这样处理也不合适。作为一个中学教师还是应该掌握語言学的一般的理論知

識的，况且它对學習别的語言課也有一定的帮助。

“現代漢語”部分增加了修辞、篇章結構、文風等章节，以及在語法講授方面注意到了病例的分析研究，这一些都是联系实际的好的改进；但是就整个內容来说还是比较單薄，急需加深和丰富。語法方面完全采用“初中漢語課本”的体系而很少变动，今天看来也值得很好地考虑。

由于教改時間紧，考虑問題倉促，加上大家思想認識水平的限制，上述那些問題的产生自然是难以完全避免的。經過長时期的考虑，經過了几次討論，教研組同志都一致認為“現代漢語”“古代漢語”“語言学概論”仍應該成为三門独立的課程，以使學生掌握系統的專門知識。

为了更好地改进教学，提高教学質量，教研組已在今年四月份着手修訂教学大綱。首先修訂“古代漢語”教学大綱。四月下旬“古代漢語”教学大綱的修訂初稿出来后，曾請語言研究所、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河北北京师范学院的一些先生們来校一塊討論。大家就“古代漢語”的教学目的是什么，要不要單設，包括哪些內容，開設多少時間，需要多少課時等問題交換了意見。

目前“古代漢語”的教学大綱仍在繼續討論和修改中。教研組同志們的意見一致傾向于古代漢語應該包括音韵、詞汇、語法、修辞和旧体詩詞語言分析等部分，教学時間为一年，每周講授和自修共六小时；我們認為“古代漢語”的教学目的應該是：使學生掌握古代漢語的基本知識，依靠工具書的帮助，在閱讀一般古典文学作品時能比較确切地理解其詞义，并能分析其語法結構。“古代漢語”教学大綱修訂完畢后，將接着修訂“語言学引論”教学大綱。“現代漢語”也要进行修訂。訂出的大綱經領導上批准后就执行。

### 二

因为教研組忙于修訂教学大綱，并且又分出了相当多的時間为語言研究所审查中型“現代漢語詞典”，所以原訂的科学研究計劃有了些变动。

原訂的“解放十年来漢語詞汇的發展变化”仍在进行研究，脱稿時間將延長。“毛主席著作的語法修辞研究”这一題目改小了，只研究毛主席語言的修辞运用，选了三个小題：排比手法、映襯手法和毛主席語言的修辞手法的运用。預計七月底可以正式脱稿。（史錫堯）



# 语言学名词解释 (九)

北京大学语言学教研室編

**109 双唇音** 上下唇相接触以节制气流而發出的音,叫做双唇音,又叫重唇音。閉塞音[p][p'][b][b']、鼻音[m]、摩擦音[ɸ][β]、颤音[ʋ]及半元音[w][ɥ]等都是双唇音。在各語言中以及諸方言中都可以經常碰到这种語音現象,如北京的“帮”[paŋ]、“潘”[p'an],上海話的“旁”[b'aŋ],英語的 pen[p'æn] (鋼筆),俄語的 писать[pisa:t] (寫),баба[babu] (婆子) 中的声母[p][p'] [b][b'] 就 [ɸ][β] 较为少见,不过在福州話中也能听到[β] 个音,如批把[pɪβa]。[ʋ] 看起来很生疏,其实小孩打嘟囔就是这种声音。(徐)

**110 唇齿音** 下唇和上齿接触以节制气流而發出的音,叫做唇齿音,又叫輕唇音。摩擦音[f][v]、塞擦音[pf][pf'] [bv][bv']、鼻音[m]、元音[v]都是这种音。[f][v] 两个音在日常的言談中見不鮮,如“文法”[vənfa],而[v][pf][pf'] [m] 等在方言或外語中才能碰到。上海話中的“飯”[ve]、英語的 very[veɪ]、祁門話中的“飯”[m] (前面的) 是不带音的,作声母,后面的那个[m] 带音,作韵母,英語的 camphor [kæmfə] 中的 v 和 m 就是。[pf'] 在西安、兰州話中是一种很普遍的語音現象,北京話合口韵前的声母 ts' ts', 在西安、兰州等地读念为[pf][pf'],例如“追”[pfuei]、“出”[pf'u] 的 [pf'] 等都屬于此。

唇齿音一般都是下唇和上齿接触所發出的音,不也有下齿和上唇接触而發出声音来的,但这种情况少见。(徐)

**111 卷舌音** 舌尖向上翘起,向后略卷,和前额接触,以节制气流而發出的音,叫做卷舌音,又称为舌尖后音或舌尖前额音。有人称它为翘舌音。閉塞音[t][t'] [d][d']、摩擦音[s][z]、塞擦音[ts][ts'] [dz][dz']、鼻音[ŋ]、边音[l]、閃音[r] 等都卷舌音。[t][t'] 在西安話中常見,凡是在北京話中口韵前的[ts][ts'], 在西安話中都念成[t][t'],例如“超”二字在北京話中念[tsou]和[ts'au],在西安念为[tou]和[t'au]。在威宁苗語中有[dz][dz'] 等,如[dzəy] (少)、[dz'ie] (牲口) 的声母就是。

汉语中的元音[er]——即国际音标中的[ɐ]——是一种卷舌音。(徐)

**112 卷舌元音** 这是汉语中特有的一个元音,在国际音标中用[ɐ]或[ə][ɤ][ɯ][ɤ]来标写。在發[ɐ]这个音的时候,舌位和發央元音[ə]相似,但略为向前一些,把舌尖翘起,抵住前额,形成一种特殊的音色,即[ɐ]。北京、重庆、南京、杭州、昆明等地都有这个音。北京話中的“二”“尔”“耳”“兒”等都是卷舌元音。

[ɐ] 可附在一个詞的后面,形成“兒化韵”,但各地都有不同的特色。北京話中的兒化韵,可以影响前面主要元音的音色,例如“花兒”就不是簡單地把[xua] 这个音节加上[ɐ] 这个卷舌元音,而是念成[xuəɐ],它前面的[a] 变成为[ɤ]。但在杭州話就是[xua] 音节加上[ɐ] 这个音的。(徐)

**113 語音的弱化作用** 語音的弱化作用可以分为元音的弱化和輔音的弱化。元音的弱化是在不重讀的音綴(音节)中或在不重讀时,由于肌肉的松弛或音量的微弱,紧的元音(如[i][u]等)变为松的元音(如[ɪ][ʊ]等)或者清晰的元音(如前元音[i][e]和后元音[u][o]等)变为含糊的元音(如央元音[ə][ɐ]等)的現象。例如北京話的“棉花”[mien xua],快讀就成为[mien xuə]、“打扮”[ta pan]快讀就成为[ta pən];俄語的 хорошо (好) [xara'ʂo]讀成[xərə'ʂo], истина (真理) ['istina]讀成['istmə];这都是元音弱化的現象。另外,許多語言中的一些短詞、虛詞、前置詞等,当它在一个短語或一句中不重讀时,其中所包含的主要元音往往产生弱化的現象,例如北京話的“了、的、着”,俄語的 на, об, для, не, 英語的 at, of, to, be 等。輔音的弱化,普通都是根据气流的强弱指清音变濁音(如两元音之間的清輔音被同化为濁輔音等)或送气音变不送气音(如中古汉语的濁塞音变成現代湘語的濁塞音)的現象。但是,有的时候,輔音的弱化也可指閉塞音变为摩擦音的情形,其实,这也是依据气流的强弱来对“弱化”下定义的。因为,同摩擦音来比較,閉塞音的开口度較小,所以它的气流出来时較强;又因閉塞音是一發即逝的,發音的时间短促,气流是冲口而出的,不象摩擦音的气流是慢慢地消耗在口腔器官收斂的摩擦上,所以我們可以說閉塞音变摩擦音也是一种弱化現象。例如古代汉语(根据《切韵》)的双唇閉塞音[p] (如“方”“分”的声母),

[p'] (如“芳、峰”的声母), [b'] (如“房”“父”的声母), 到北京話里則变为唇齿摩擦音[f]; 古印欧語的 \*p \*t \*k, 到了日耳曼語里則变成 f θ x (或 h), 这些都算輔音的弱化現象。(廿)

#### 114 語音的替代作用

在遇到从外国語中借来的詞里所包含的音素或音节构造是本国語言中所沒有的时候, 或由于其他原因不依照外国語的本来語音而發音的时候, 可以用本国語言的語音系統中相似的或接近的音素或音节构造去替代它, 这种語音变化的現象叫做音的替代作用。比方: 漢語中沒有[r]这个音素, 遇到外来詞中有[r]时, 我們就用[l]去代替它, 因此如 Riga, Roma, Paris 等, 就譯成“里加”、“羅馬”、“巴黎”; 漢語中沒有[-st-]这个音节构造, 遇到外来詞中有这个音节构造时, 我們就在[s]的后面加一个元音[i], 因为[sɪ]这个音节是漢語中所具有的 (如“斯”、“思”等), 因此 Сталин[stalin], Страханов[staxahof]等就譯成“斯大林”[sɪ ta lin]、“斯达汉諾夫”[sɪ ta xan nuo fu]。当我们初学一种外国語时, 遇到有些音素是本国語言中所沒有的, 我們往往用自己語言中的接近音素去代替, 这种代替是不合理的, 这与上面所說的用接近的音素去翻譯外来借詞的情况不一样。用本国語言語音系統中接近的音素去代替外来詞中的音素, 那是合理的, 因为这样才能使外来詞配合本国語言的語音系統; 至于學習外語时 (只要有意地想把外国語学好), 我們不應該用本国語言中語音系統里的音素去代替外語中的音素 (例如对于俄語的 ш [ʃ] 或英語的 sh [ʃ], 我国北方人往往用 [ʃ], 南方人往往用 [ʃ] 去代替它), 因为这样就会使發音不正确。我們應該學習本国語言中沒有的那些外国語言中的音素, 研究它的發音部位和發音方法, 从而掌握那些音。(廿)

#### 115 系詞

联系句子中的主語部分和謂語部分的虛詞称为系詞。比方說, “魯迅是我国的偉大作家”, “人民的力量是强大的”之中的“是”就是系詞。在这些句子里, “魯迅”和“人民的力量”是句子的主語部分, “我国的偉大作家”和“强大的”是謂語部分, “是”把“魯迅”和“我国的偉大作家”联系起来, 把“人民的力量”和“强大的”联系起来, 但它本身却既不属于主語部分, 又不属于謂語部分, 所以是系詞。系詞存在于許多語言的名句和形容句里, 却不存在于動句里, 各語言所具有的系詞來路可能不相同, 有的語言是拿“同動詞”來作系詞用的, 比方, 英語的 verb to be (例如 am, are, is, was, were) 本身是動詞的形式, 有人称、数、时制的变化, 却用来联系句子的主語部分和謂語部分。I am a student (我是一个学生), I was a student (我曾經是一个学生), You are my

friend (你是我的朋友), That is true (那是对的), 等, 其中所用的系詞是同動詞, 随着人称、数和时制不同而有所变化。有的語言是拿指示詞或代詞來作系詞用的, 例如漢語的“是”就是指示詞 (是=这个) 被用作系詞的。这些語言成分之所以是系詞, 因為們都是用来联系句子的主語部分和謂語部分的。語言的名句或形容句可以不用系詞。例如, 漢語的句既可以用系詞, 也可以在某种場合下不用系詞, 我可以說“今天是星期天”, 也可以說“今天星期天”。語的名句也可以不用系詞, 例如 Эта—книга (这是書) 就是不用系詞的名句。正因为系詞不是句子的主語部分的一份子, 也不是謂語部分的一份子, 它可以不用而不損害句子意义的表达, 也正因其如此, 它是虛詞。(高)

#### 116 連詞

連詞又称連接詞。它是詞类的一种。連詞是用来連接同等的句子成分或子与句子的虛詞。比方說, “广大的中国人民和丰富中国物产都是世界上所少有的”。这里的“和”就是个連詞, 因为它把同样作为句子成分的主語“广大的中国人民”同“丰富的中国物产”連接起来。又如, “老身体不好, 然而他却是積極的”。这里的“然而”也是个連詞, 因为它把“老身体不好”这个句子同“他却是積極的”这个句子連接起来。我們說連詞的作用在連接同等的句子成分, 這句話就意味着把不是同等句子成分連接起来, 就不是連詞, 虽然它也可能起連的作用。有的語法学家把系詞也說成連詞, 其实, 系詞固然也起連接作用, 它把主語和謂語連接起来, 但它是把同等的句子成分連接起来, 主語和謂語是不同質的句子成分。連詞可以分为两大类: 1) 并列連詞 2) 从屬連詞。連接句子中的同等成分和連接同等句子的連詞称为并列連詞, 例如“我發过言并做过报告”之中的“并”, 就是連接同等句子成分的并列連詞; “他到了我, 而我也看到了他”之中的“而”, 就是連接“他到了我”和“我也看到了他”这两个同等的句子的并列連詞。連接不同等的主从句的連詞称为从屬連詞, 的时候, 从屬連詞也可以連接不同等的句子成分。比方說, “老林不想去, 因为他还没有搞通思想”之中的“因为”, 就是一个从屬連詞, 因为它把主句“老林不去”同从句“他还没有搞通思想”連接起来。又如, 俄語 как тополь киевских высот, она стройна (她身材長, 象基輔附近高地上的鑽天楊似的), 这里的 как 是連接句子成分 тополь киевских высот 和 стройна 之間的从屬关系的从屬連詞。并列連詞又可以分为合連詞 (例如“我們要在最短的時間內在工业方面赶上英国和美国”之中的“和”); 對抗連詞 (例如“你說得很好, 但是你却能說不能行”之中的“但是”) 和選擇



(例如“主語或謂語都是句子成分”之中的“或”)。从連詞又可以依照其所表示的意义分为原因連詞(例如“因为時間已經晚了,我們明天再談吧”之中的“因”);目的連詞(例如“为了大家都幸福,我們要努力建社会主义”之中的“为了”);条件連詞(例如“如果你改造思想,你就不容易过社会主义这一关”之中的“如果”);讓步連詞(例如“虽然你不提出批評,他也已知道他自己的缺点了”之中的“虽然”);結果連詞(例如“你不好好的干,所以你得不到表揚”之中的“所以”)。(高)

**117 副詞** 副詞是詞类的一种。具有一定的形式特征而表示行为、性質和状态的某种特征,称为副詞。副詞在句子中起着状語的作用,它用来說明動詞、形容詞或其他副詞所表明的行为、性狀或状态的某种特征的,因此往往附加于動詞、形容詞或其他副詞,其中以附加于動詞的为最常見。正因如此,拉丁語法学家称副詞为 *adverbium* (*ad* = “附于”, *verbium* = “動詞”)。比方說,汉語“快来”之中的“快”就是說明“来”的行为的一种特征的,所以是个副詞;英語 *specially red* 之中的 *specially* (特別地)說明 *red* (紅) 的性質的一种特征的,所以是副詞;汉語“非常快地来”之中的“非常”是說明“快”的状态的一种特征的,俄語 *он читает очень быстро* (他讀得很快) 之中的 *очень* (很) 是說明 *быстро* (快) 的状态的一种特征的,所以它們也都具有副詞的作用。副詞的种类多。根据副詞在句子中作状語的情形,可以把副詞分为行为方法状語副詞(例如“門輕輕地开了”之中的“輕輕”);方位状語副詞(例如“我到这里来”之中的“这里”);時間状語副詞(例如“昨天我參觀了十三陵水庫”之中的“昨天”);程度状語副詞(例如“这很好”之中的“很”);等等。(高)

**118 后置詞** 后置詞是放在一个实詞后面而具有前置詞作用的虛詞。比方說,拉丁語 *in illis* (与此) 的 *cum* 放在代詞 *illis* 之前,称为前置詞;拉丁語 *nobiscum* (与名人) 的 *cum* 放在名詞 *nobis* 后,称为后置詞;这两个 *cum* 所指的意義和語法作用是相同的。有的語言学家認為汉語“在桌上”、“在家”、“在車中”、“在脚下”之类的“上”、“里”、“中”、“下”类的虛詞是后置詞,因為它們是放在实詞“桌子”、“家”、“車”、“脚”等的后面而起其他語言放在实詞前面的前置詞所起的同样的作用,即作为表示事物間的各种关系,或表示事物同行为、状态以及性質的关系。(高)

**119 前置詞** 前置詞是詞类的一种,它是放在名詞前面,用来表示事物間的各种关系,或者表示事物同行为、状态以及性質的关系的一种虛詞。比方說,俄語的 *я положил тетрадь на стол* (我已

經把筆記本放在桌子上),其中的 *на* 表示行为及于事物的下方,并且是放在名詞 *стол* 的前面的,因此,称为前置詞。前置詞所表示的事物間的各种关系,大体說起来,有这些种类:表示事物之間的时间关系的,例如汉語“我到春天一定要来”之中的“到”就是放在实詞“春天”之前,表示时间关系的前置詞;表示事物之間的空間关系的,例如汉語“我在北京看到他”之中的“在”就是放在实詞之前,表示空間关系的前置詞;表示目的关系的,例如汉語“为了思想改造,我参加了农业劳动”之中的“为了”就是放在实詞之前,表示目的关系的前置詞;表示原因关系的,例如汉語“因为他的緣故,几乎使我生了一场病”之中的“因为”就是放在实詞前面,表示原因关系的前置詞;等等。应当指出,在某些語言里,往往有一些既可以用作前置詞又可以用作从屬連詞的虛詞,例如英語的 *for*, 汉語的“为了”、“因为”,等等。因为从屬連詞一般是用來联系主句和从句的,前置詞是用来表示事物(名詞所指明的)同行为、状态或性質的关系的,在这种情形之下,放在从句前面的(例如汉語“为了他参加农业劳动,我們进行了許多說服工作”之中的“为了”),就具有从屬連詞的作用,放在名詞性的詞語前面的(例如汉語“为了思想改造,我要进行自我批判”之中的“为了”),就具有前置詞的作用。(高)

**120 句子** 在交际場合里,用来表达一个思想的言語單位,称为句子。一般的情形,句子由两个部分组成:作为被表述的对象的主語部分和作为表述的謂語部分。例如,“这个政策是正确的”之中的“这个政策”是主語部分,它是句子中被表述的对象;“正确的”是謂語部分,它是句子中用来表述主語的言語成分。但是,有的时候,句子也可能只包含其中的一个部分,即謂語,例如拉丁語的 *pluit* (下雨),其中並沒有主語,却是一个句子。句子可能只包含一个命題,这样的句子,語言学家称之为“單句”,例如,“今天星期五”;它也可能包含更多的命題,語言学家就称之为“复合句”,例如,“如果他不改造思想,就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

根据謂語的性質,句子可以分为名句或者名詞謂語句,形容句或者形容詞謂語句,動句或者動詞謂語句。以名詞或具有名詞功能的詞作为謂語中的主导詞的,称为名句或者名詞謂語句,例如,“今天国庆”;以形容詞或者具有形容詞功能的詞作为謂語中的主导詞的,称为形容句或者形容詞謂語句,例如“共产党真伟大”;以動詞或者具有動詞功能的詞作为謂語中的主导詞的,称为動句或者動詞謂語句,例如“美帝侵略中东”。

根据句子的功用,可以把句子分为不同的句型,例如陈述句、詢問句、疑惑句、祈使句、感嘆句,等等。

一般的情形,句子都表达一个完整的思想,但有的

时候,也有表面上看来只表达一个概念的句子,例如,“雷一般的掌声”,語言学家称这种句子为概念句,同一般的思想句区别开来。

概念句可能是独詞句,即只有一个詞的句子,例如,“好!”也可能是詞組句,即是由一个詞組构成的句子,例如,“好得很!”不过,无论独詞句或者詞組句,这种概念句也都表达說話的人所要表达的完整的思想。在这种情形下,概念事实上是判断的代表,例如,“好得很!”事实上是“这好得很”的代表。(高)

### 121 动句

按照句子的作用或者它的意义核心的不同,我們把句子分为主句、形容句和动句。动句又称叙述句,因为它的目的在于叙述一个人或事物有什么动作、思想、行为、变化,或者叙述一个人或物同什么动作、思想、行为发生什么关系。在这种句子中,謂語是一个動詞性的詞或者一个動詞性的詞組,来表现动作、思想、行为和变化,所以这种句子又称動詞謂語句。有的句子在動詞性的詞語后面还有别的成分,它是動詞性詞組的一个部分,我們称之为宾語,它跟在句子中的動詞性的詞的后面,指出同这动作、思想、行为有关的人或事物。一个动句可能有两种宾語,一是直接宾語,一是間接宾語。例如,“他送給我两本書”。“書”是直接宾語,“我”是間接宾語。

一个动句可以沒有主語,因为它所要叙述的是發生了什么事情或者發生事情的經過,所以它可以是一个絕对的动句,例如:“下雨”,“上車”,“有一本書”。(路)

### 122 倒装句

我們在說話或者写文章时,为了达到某种修辞的目的,或者适应某种客观情况,使对方了解得更清楚,就有意識地把句子成分的一般次序顛倒过来,而成分之間的关系沒有改变,这就是倒装句。

就漢語來說,一般情况是主語在前,謂語在后。例如,“这件衣服很好看。”要是強調“好看”,就改为:“很好看,这件衣服。”一般的結構次序是顛倒了,但主謂关系并沒有改变,倒装后的句子成分仍可恢复为原来的結構形式,如果不能恢复时就不是倒装句。

句子成分除了主語謂語的倒装外,状語和中心詞也可以倒装。例如:“他喊起来,大声地,用力地。”

复句中的分句也可以倒装。例如:“我一定去鍛鍊,虽然外边下着大雪。”

判断一个句子是否倒装,應該区别:在語言習慣上已經固定的結構形式,虽可用另一結構形式表达,但这并非倒装。例如,用“把”、“对”等介詞把宾語提前,这是一种固定的句子結構,不能認為是后置宾語的倒装。其次,在实际語言中不存在的格式不能認為倒装;也不能把一般句子結構用增减詞句的办法了解为另一种句

子的倒装。(路)

### 123 遞系句

遞系句在漢語中較常見,它的特點是在一个句子中有两个動詞,两个動詞中間夾着一个代表人或事物的詞語(名詞或者代詞),它作前一个動詞的宾語,同时又作后一个動詞的主語。

遞系句中各个成分中間連結得很紧,中間不能有停頓,不能用标点隔开。

遞系句是近似于“主謂結構作宾語”和“動詞作足語”之間的一种結構形式。这样看来,遞系句就有两种:一种是近于主謂結構作宾語的遞系句,一种是近于動詞作补足語的遞系句。虽然相似,却不相同,所以能相混。

举例来看:

1) 主謂結構作宾語。“我記得他这样說過。”“記得”要求整个的主謂結構作宾語,來說明所記得那件事。記得的是“他这样說過”,不是“他”;所以“这样說過”的整个主謂結構是動詞“記得”的宾語。

2) 近于主謂結構作宾語的遞系式。“我看見一人走了出去。”“看見”的是“一个人”,“一个人”可說是“看見”的宾語;但是“看見”的不單是一个人的動作,而是这个人的整个動作“走了出去”。也可認為“一人走了出去”的整个主謂結構是“看見”的宾語。在这里,“走了出去”是說“一个人”的,它們中間有主謂关系存在。

3) 動詞作补足語。“我想找一本書看看。”“找”是“一本書”,所以“一本書”是“我”的宾語,“看看”“找一本書”的补足語。中間沒有主謂关系存在。

4) 近于動詞作补足語的遞系句。“你叫他來”“叫”的是“他”,叫他做什么,是叫他“來”,所以“他”“叫”的宾語,“來”很象“叫他”的补足語;然而“來”是明“他”的,它們中間有主謂关系存在。可是叫的只一个人,不能是一件事,尽管“他來”可構成主謂結構,可是不能認為这主謂結構是“叫”的宾語。

从以上2、4两例看来,两个動詞中間的名詞同一个動詞中間有主謂結構关系,可是并不一定是或說不是拿整个的主謂結構作前一動詞的宾語,而是中間的这个名詞作宾語。(路)

### 124 言語

平时我們往往并不严格地区別“言語”和“語言”这两个術語,混用的时候很多。事实上,言語和語言是不同的。言語指說的过程,也指所說的話。它是語言的存在形式。或說,言語是在一定条件下对于語言手段的使用,而語則是言語所利用的一般手段的总和,比如漢語是一語言,它存在于說漢語的人們的言語当中。言語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就是語言,而語言是全民的交际工具



言語中还有另外的东西，它包括个人在使用語言上的特点，比如發音上的，对个别詞的意义的理解上的特点；也包括一定的文学上的音响效果（这是社会共同的），等等。所以应当把言語和語言分別开来。語言学研究的是語言，不是言語。另一方面，也不能把言語和語言对立起来。有的資產階級語言學家，如德·索緒爾，就認為語言是社會的，而言語則是個人的；又說：言語的事實總是先於語言的。”我們認為，無論語言或言語，就本質說：都是社會的，不過言語中有個人的成分；事實上兩者都同實際語音相聯系，才可能起交流的作用；語言存在於言語之中，言語必須包含語言，兩者同時存在，無所謂先後。（石）

## 125 訓詁

我國古代把語言文字之學通稱為“小學”。小學分文字、音韻和訓詁三個部分，分別研究字形、字音和字義。訓詁是研究字義的學問。訓詁是在東周時候興起的，到了漢代就有較大的發展。

訓詁的專著大體上有兩類。一類是專為某部經典著作而寫的，比如《毛詩注疏》就是為解釋《詩經》而寫的專著。《春秋》是一部史書，記事很簡單，後來有人寫了《左傳》，把這一段歷史作了比較詳細的敘述，古人把《左傳》也看做是訓詁之作，認為它是訓詁《春秋》的。另一類是廣泛搜集字匯，加以編排，一一解釋，這實際是一種字典，比如漢代的《爾雅》《方言》《釋名》等；清代釋古漢語虛字的《經傳釋詞》《助字辨略》等也是這一類專著。

“訓”和“詁”有不同的含義。一般用比較通俗的話去解釋某個字義的，叫“訓”，比如《穀梁傳》：“人言為信。”《爾雅》：“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而用當代的話去解釋字的古義的，或者用普遍通行的話去解釋方言字義的，叫“詁”，比如《爾雅》：“不聿為筆。”“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方言》：“舟，自關而西謂之舫，自關而東或謂之舟，或謂之航。”

訓詁的研究給我們留下非常豐富的關於漢語語義變化的資料。這不但對於後代人閱讀古書有好处，對於漢語詞匯發展的研究也是很可貴的。但是因為古人研究往往是以方塊漢字而不是以漢語的詞為對象來進行的，而且缺少可靠的理論指導，所以我們要善於批判地運用古人的這些成果。（石）

## 126 音節文字

音節文字是表音文字的一種，這種文字的每一個符號代表一個音節，一個字有幾個音節就寫幾個符號。

純粹的音節文字很少，日文的假名是典型的音節文字。例如日語的“畑”ハタケ（田地），三個字母表三個音節[xa ta k'eɪ]。這種文字對於音節比較少的語言是合適的，但是對於音節比較多，或是有詞形變化的語

言就不合適了。

古代的許多表意文字往往雜有表音節的成分。例如巴比倫的楔形文字，就用几百個符號代表几百個音節。巴比倫文的“國家”一詞有三個音節，用楔形文字寫時，先寫一個表示意義的符號，再寫三個表示音節的符號。

現在的漢字中也有許多表音節的成分，例如“梧桐”中的“吾”“同”都是表音節的表音成分。（賈）

## 127 表音文字

表音文字是文字的一種。這種文字利用一套字母，每個字母代表一定的讀音，然後將字母組合成各式各樣的字，代表各式各樣的詞，人們看着字就能念出音來。

表音文字有兩種，一種是音節文字，一種是音素文字。音節文字的每個字母代表一個音節，日文假名就是表音節的，例如：サ(sa)、シ(xi)、ス(su)。音節文字適用於音節數目較少的語言，如果音節數目較多，或是有比較複雜的詞形變化，就不宜於用音節文字。

音素文字的字母代表音素，它適用於絕大多數的語言。俄文、英文、法文、德文等都是音素文字。

有一種音素文字比較特別，可以叫做輔音文字，它的字母只代表輔音，至於元音不用字母表示，而是用其他的符號表示，加在輔音字母上面。使用這種文字的語言往往輔音多，元音很少，僅僅用元音的變化表示語法意義的不同。阿拉伯文就是一種輔音文字。

表音文字利用有限的字母，根據一定的規則，組成語言中所有的詞，因此掌握起來比較容易，掃除一個文盲只需要很短的時間。表音文字是最科學的文字，還沒有使用表音文字的語言，早晚要改用表音文字，這是文字發展的必然趨勢。我們使用的漢字不是表音文字，黨和政府正在積極進行工作，準備在不太久的將來，把方塊漢字改為表音文字。（賈）

## 128 圖畫文字

文字起源於圖畫。但是圖畫不能一下子變成文字，而是經過了一個過渡階段，在這個階段人們就用描繪具體事物（或事件）的圖畫來幫助記憶，進行交際。這種圖畫已經帶有文字的性質，我們叫做圖畫文字，也有人叫做文字畫。

下面舉大科達人的圖畫文字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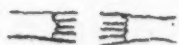
(1800年)

表示1800年在大科達流行過天花：



(1813年)

表示1813年流行過百日咳：



(1840年)

1840年大科達人和外族和好。在甲骨文里也能找到我國古代的一些圖畫文字的遺迹，例如



初民或是落後的部落，可以用圖畫文字登記戶口。

财产,传达命令,记载历史(当然很简单)。

图画文字不同于一般的图画,它不是作为艺术品供人欣赏的,而是帮助人们记忆或进行交际的手段。但是它又不是真正的文字,因为它不代表语言,不代表词,没有一定的读音、画法,不表概念;它只能把画画人的意思大体记录下来。尽管这样,人类知道了用图画来补语言的不足,帮助交际,的确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这个途径是正确的,图画文字再向前一步就成了真正的文字。(賈)

129 注音字母 “国語”注音字母,简称注音字母,是用来给方块汉字注音的一套音标。它是按照普通话的声韵系统制定的,1918年由当时的教育部颁布推行。注音字母一共四十个,其中二十四个表声母,十六个表韵母,但是在表声母的字母中,有两个( $\pi$ ,  $r$ )标方言才用得着,有一个( $\pi$ )只

用于韵尾,所以有些人介绍注音字母只说三十七个。注音字母的字体是按古体的汉字改造而成的。

这套字母自从颁布推行以来,已经四十年了。几年来在学校里、在社会上流传很广,对于帮助人们学习、帮助统一汉字的读音起了不少的作用。但是注音字母有着比较大的缺点。第一,它不全是音素字母,有一部分( $\pi$   $\gamma$   $\alpha$   $\gamma$   $\pi$   $\gamma$   $\pi$   $\gamma$ )表的是音素的联合,这就不便于作语音上的分析,也不能作为国内各民族统一文字时的共同基础,音译外国人名、地名和科学术语也不方便。第二,标音不够精确,例如: $\gamma = \alpha \gamma$ ,可是 $\gamma \pi \alpha \gamma = \alpha \gamma$ , $\pi = \alpha \pi$ ,可是 $\pi \gamma \pi \alpha \gamma = \alpha \gamma$ 。第三,不容易写,而且不便于连写。由于这些缺点,所以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了新的拼音方案,用来代替注音字母(賈)

## 比喻义和比喻

潘 承

比喻义是词义的范畴,它研究一个词的意义怎样丰富起来,研究多义词的各个意义之间的关系是否基本义和借喻的关系;比喻是修辞的范畴,它研究怎样把一个事理具体形象、通俗浅显地表达出来,使人得到深刻的印象。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比如“傀儡”,它的基本义是“木头人”,比喻义是“任人摆布的事物”,用基本义的如“一场傀儡戏”,用比喻义的如“李承晚傀儡政府”,这两个意义是并存的,同时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人们已经不觉得“李承晚傀儡政府”中的“傀儡”是个比喻。同样,“他是这群小孩的头脑”,“他父亲在旧社会得罪了上司,把饭碗给打了”,其中的“头脑”、“饭碗”都不是比喻,而是用了词的比喻义。

词的比喻义和修辞的比喻的不同点表现在:1) 词的比喻义是固定的,在一定时期内不会变化;修辞的比喻是临时的,只用在这一篇或某几篇文章内。2) 词的比喻义是一看就清楚的,不需要凭借上下文;修辞的比喻(借喻)要依靠一定的语言环境才能表达清楚。3) 词的比喻义是社会公认的,约定俗成的;修辞的比喻是个人选择的,暂时使用的。因此,运用比喻义不容易表现作家个人的风格,而运用比喻却最鲜明地表现出作家的思想水平、生活经历和艺术修养。

当然,词的比喻义和修辞的比喻并不是毫无关系的。首先,它们都用了“比”这种手段,因此都能获得不同程度的生动活泼的效果。其次,更重要的,比喻义的

产生是由于长期使用这个比喻的结果。一个比喻,由于比得深刻巧妙,生动有力,就能迅速为大众所接受运用;大家都这样用,于是就约定俗成,从个人的偶发的使用,变成社会的永久的使用,于是这个偶然的比喻就固定在这个词的意义中,成为这个词的比喻义。“傀儡”“头脑”“包袱”等就都是这样。但这只能说明词的比喻和词的比喻义两者有联系,而不能说明两者是相同或相等的,当一个比喻已经固定在词的意义以后,显然已经有了质的变化,不能再称之为比喻了。

同样,成语、谚语、典故的比喻义也算不得修辞的比喻。可是唐啓运同志在《毛主席的比喻》一文(见《国語文》1959年4月号)中,把这两者混淆起来了,说:“拿流传广泛的谚语、成语、典故来作比喻,是毛主席比喻的形象性的另外一个特点。”举的例子“锦上添花”“雪中送炭”“下里巴人”“树倒猢猻散”“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等等。

其实,成语、谚语等有只用基本义的,如“推陈出新”“喜闻乐见”等;也有既用基本义又用比喻义的,如“狂风暴雨”“看菜吃饭”等;又有只用比喻义的,如“牛弹琴”“画蛇添足”等。唐啓运同志举的例子正是一类。有些人以为只有用比喻义的才算得成语,这未免有些机械,但这至少可以说明成语的较大部分是比喻义的。成语、谚语等之所以生动活泼,言简意赅,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靠了这种比喻义。



## 法国語言学家馬·柯恩教授来我国作学术訪問

法国著名語言学家馬·柯恩教授 (Marcel Cohen), 应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的邀請, 于1959年4月17日和他的夫人一道乘飞机到达北京, 来我国进行学术訪問, 已于5月23日离京回国。

在北京期間, 馬·柯恩教授进行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在語言研究所作了题为《語言学方法和科学思想發展史》的报告; 在北京大学作了《怎么样成为一个語言学家》的学术講演, 并举行了座談会; 在对外文化协会和作家协会也都作了报告。此外, 还訪問了郭沫若同志、少数民族語言研究所、文字改革委员会、教育工会、北京外国語学院, 参观了国棉三厂、景泰藍工厂、北京圖書館、故宫博物院、兒童医院。

5月3日——5月19日, 在南京、上海、杭州、广州、汉口等地进行訪問, 并在上海举行了座談会, 作了学术报告。

5月19日, 馬·柯恩教授由汉口回到北京。在回国前短短的两天里, 他又作了两次学术报告, 参加了一次座談会。值得提一提的是, 馬·柯恩教授不仅是語言学專家, 而且对文学也頗有研究。5月21日晚, 他在作家协会作了题为《关于法国作家約翰·理莎尔·布洛克》的报告。在报告結束的时候, 教授以七十五岁的高龄, 大声朗讀了布洛克所写的歌颂十月革命的詩篇, 精力充沛, 热情洋溢, 充分体现出对十月革命的热爱, 对新中国的热爱。

馬·柯恩教授是法国馬克思主义語言学家。在他的研究活动中, 总是以活的語言为主, 对各种語言現象进行观察、分析, 然后总结出一般理論来。他善于理論联系实际, 無論在旅行中、戏院里、集会上, 或是在听广播的时候, 他都非常注意, 随时收集資料, 从語言学的角度加以研究。例如, 当他在高等学校念書的时候, 就从高等理工学生中搜集材料, 写成了論文《高等理工学校的語言》; 当在阿比西尼亞(即埃塞俄比亞)旅行的时候, 曾对当地語言进行全面的考察, 根据这些材料, 后来写成了一系列有关阿比西尼亞語的著作; 在参軍时期, 他又注意到了軍隊中的俚語, 写成了《論俚語》; 他还注意到自己孩子的話, 發表了几篇关于兒童語言的研究报告。

在法国劳动大学任教期間, 他深入地研究了馬克思主义理論, 并探討了这种理論对于語言学研究的影响。在語言学的研究中, 以辯証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同时, 也注意到了語言的内部結構和它的社会功能。这以后, 还發表了不少这方面的著作, 如:《語言学与社会》、《語言学与辯証唯物主义》、《語言及其結構和發展》等。从1935年开始, 他主持法共《人道报》的語言学專欄, 現在他虽已退休了, 但仍然在指导馬克思主义語言学研究小組的工作。

馬·柯恩教授是一位卓越的現代語言学家, 他的研究領域是很廣泛的。远在大学讀書的时候, 就在他的老师梅耶 (A. Meillet) 的指导与劝告下, 决定了作一个“閃語學者”的方向。

馬·柯恩教授是閃含語系(參看契科巴瓦《語言学概論》第一編, 下冊, 204—207頁)的研究專家, 是比較語言學者。他對閃語系語言和含語系語言进行了比較研究; 不仅广泛調查研究了閃語系語言, 而且也調查研究了含語系語言, 并認識到閃語和含語是同屬一系的。發表的著作有:《閃語動詞》、《閃含語系詞匯和語音的比較研究》等。

同时, 他又是一位方言學家。早年, 調查研究过許多种語言, 其中, 对埃塞俄比亞語作过專門的研究, 造詣很深。这方面的著作也不少, 如:《阿尔及尔犹太人的阿拉伯口語》、《阿比西尼亞官話的動詞和形容詞》、《埃塞俄比亞南部語言研究》、《阿比西尼亞官話概論》、《埃塞俄比亞南部語言新探》等。

后来, 他同梅耶共同主編《世界語言》綜合手冊, 这使他接触到世界很多种語言, 涉及到語言学各个部門, 扩大了他的研究範圍。

二次大战以后, 他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祖國的語言——現代法語上, 进行了專門的研究, 發表了許多論文, 并著有《法蘭西語言漫談》一書。

近几年来, 馬·柯恩教授以馬克思主义为指导, 多致力于一般語言理論的探討。曾著有《語言學專業》、《語言学与社会》、《語言学与辯証唯物主义》、《文字的偉大發明及其發展》(1958年巴黎出版)等。这些著作都表現出了他在研究語言、文字方面的巨大成就。(龔千炎)

## 安徽师范学院中文系语言学教研組工作簡况

安徽师范学院中文系语言学教研組,本学期以来在本系开设了“语言学理論基础”“現代汉语及实习”,为外语系、蕪湖市夜大学中文系开设了“現代汉语及实习”,为語文專修科的函授生开设了“現代汉语”等課程,此外还做了或正在做着下列四个方面的工作:

1)教材建設 在批判資產階級語言學說和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基礎上,根据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理論、黨和毛主席關於語言問題的指示和黨的教育方針,採用在黨的領導下師生“三結合”的方法,擬訂了新的教學計劃和教學大綱,根据大綱編寫了《現代汉语講義(初稿)》,約四十萬字。正在着手編寫的講義有《語言學理論基础》(7月底可以完稿)和《古汉语講義》(1960年7月底可以完稿)。除此以外,全組的青年教師正在集體編寫紅專大學用的《現代汉语講義》(1959年12月底可以完稿)。

2)科學研究 教研組預定在今年年底以前陸續完成的科學研究題目有:《試論解放前黨對語言科學的領導》、《從諺語民歌看全民修辭》、《病句研究》、《在高等學校推廣普通話的一些經驗》、《皖南方言詞匯和普通話詞匯的比較》、《毛主席的語言藝術》……等。

3)推廣普通話 推廣普通話是教研組的一項經常性的工作,教研組除了有教師擔任全院應屆畢業班的“語音基礎知識”課(教學汉语拼音字母和普通話語音)的教學以外,還有教師擔任了蕪湖專署教育局舉辦的“蕪湖人學習普通話研究小組”(研究如何教蕪湖人辨正方音和掌握蕪湖方音與北京語音的對應關係)的教學工作。同時,教研組也還有教師擔任了蕪湖人民廣播電台和安徽師範學院函授部聯合舉辦的“普通話語音教學廣播講座”的廣播教學工作。

為了迎接暑假,將在全院範圍內掀起的學習汉语拼音字母和學習普通話的高潮,院黨委決定在今年5月——7月舉辦一屆普通話語音師資訓練班,在非畢業班的学生中,培養103名可以擔任普通話語音教學工作的教師,這個訓練班的全部教學和輔導工作,也是由語言學教研組的教師擔任的。

4)方言調查 在安徽省方言調查指導組和院黨委的領導下,教研組完成了蕪湖市、巢縣、宣城等22個點的方言普查工作,寫出了上述22個點的方音跟北京語音的主要對應關係。同時,教研組還跟蕪湖專署教育局、安慶市文教局分別用“三結合”的方法合編了《蕪湖人學習普通話手冊》、《安慶人學習普通話手冊》。為了適應學習普通話的安徽人辨正方音的需要,教研組正在編寫《安徽方言辨正教材》。

(楊長礼)

中國語文

月刊

1959年6月号

总第84期

1959年6月22日出版

編輯者 中國語文編輯委員會  
北京西城端王府夾道7号

出版者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景山東街45号

印刷者 北京京華印書局  
北京虎坊橋

總發行處 北京市郵局

訂購處 全國各地郵電局

代訂  
另售處 全國各地新華書店

每冊定價人民幣0.24元(訂閱刊費預付,按季整訂)

1—19,310冊 代號2—44